

新世紀叢書之二

亞細亞 的 火燄

佛哥爾·欣歐著
烈陽譯

國民圖書公司版

亞
細
亞
的
烽
火

前編
亞細亞的烽火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行



營口日新街六七號

譯者 烈 陽

長春市北大街十三號

發行人 劉 鍾 泉

長春市北大街十三號

發行所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十三號

總 經 售 國民圖書公司

電話 ② 四四七〇八
四四七〇八

二十世紀的中葉，日本將在亞細亞的平原上，遮擊歐羅巴而制霸世界。

——大隈伯爵（一九一五）

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翁做甚麼！
却不是來將虎鬚！

——阮小五（水滸傳）

序

原著者佛希爾，欣歐氏 *Frank Snow* 是美國辣爾特每日新聞社遠東地區的特派首席記者，他的著作——特別是關於中國時局問題的著作，在紐約出版的很多。他精通遠東各國歷史的宿命問題，而對於中國與日本的時局，他認識得最爲精微，在這部「亞細亞的烽火」里，對於這一次中國英勇的抗戰，他的表現，他的批判，他的解說，既精采而又客觀，既大膽而無謬誤，處處都使我們感到驚異。

這一部著作，是自七七溝橋事變起始，著者以極深遠的筆法，把日寇的侵略，中國的英勇抗戰，軍政治，軍事，經濟三方面透澈地描寫了下來，可以譽稱這部著作是自從亞細亞洲燃燒起神聖的抗戰烽火之後，第一部具體而又客觀的歷史的記敘詩。

「八一五」的日本降伏，是亞細亞抗戰烽火熄滅了的日子，中國是勝利了，正如著者在本書里的預言：

「勝利的將要敗北；敗北的將得利最後的決定勝利。」（請參看本文）

自然，著者個人的傾向是偏於某一方的，因此，著者在許多地方，用個人情感在讚揚着，這在我們，不必大驚小怪，因爲我們想從這部作品里知道的是：自七七事變起，中國抗戰的內部與外部（國際）的一切具體的報告與記敘，我們讀這一部作品，應該把重點注意到這里。

十四年了，東北的文化界與祖國的隔斷，被隔斷得太悠久，被麻醉，壓抑得太夠受的了。在光復的今日，我們應該認識祖國是怎樣地在內部與外部的一切困難情況下，不斷地——英勇的和日寇血戰。所以譯者把這一部不凡的著作譯過來了，值得聲明的是，本書在重慶或延安，還沒有中譯本出版。我是由日譯本（日譯者爲昇曙夢氏，

曾被日軍部認為是反帝主義者，被捕入獄。譯過來的。而日譯本是偽滿警務局高等特務科當作「特務資料」，在秘密里僅印刷了二三百冊，頒佈在各偽滿軍警的特務科，我偶然得到了一冊。

本書之出版，賴友人李曉與國民書店主人劉鐵風君助力不少，特此致謝。

譯者 三五，二，五

亞細亞的烽火

前編目錄

第一章 北平，再見吧！……………一

一、逃 亡……………一

二、宋哲元將軍……………六

三、七·七事變……………二二

四、北方戰線……………一八

第二章 上海戰線……………二六

一、敵 軍……………一七

二、中國軍的防衛……………三三

三、上海的血戰……………三八

四、比神還偉大的力量……………四六

第三章 日本的目的「撲滅中國共產黨」……………五四

一、殺人教育	五五
二、朋 友	六〇
三、孤島上海	六七
四、偉大的戰果	七一
五、一個外國人	七九
六、中國工業合作社	八三

第四章 南方戰線

一、複雜的政界	九一
二、蔣委員長	一〇一
三、政治的遺產戰	一〇六
四、紛失的軍隊	一一一
五、人民軍隊	一一七
六、戰時的香港	一二七

第五章 偉大的「龍」……………一三四

一、日光與炸彈……………一三五

二、自由中國的基礎……………一四二

三、貧乏的生產手段……………一四八

四、中國軍的主力……………一五五

五、日人裏的中國同盟者……………一六五

(一) 逃 亡

爲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中國

——田中追想錄

日本軍占領北平後，很多的人們焦慮地都想逃出北平去，雖然已經沒有逃出的方法了。北平——這一個古舊的鞦韆的城壁，在過去曾給人們以極大的安全感，在現在却變成了冰冷的鐵檻。最後的時候已經來了，人們都像等待宣判的獄囚一樣。

侵入的日本軍，向改組後變爲傀儡的公安局提出對於那些民族主義者，過激主義者，以及其他各種參加抗日運動的愛國者拘禁的名簿。公安局却在極秘里忠告這些愛國者，快一點逃出北平。北平的城門，是在日本軍嚴重的警戒下，加以二星期內也沒有一輛開往天津的火車。所以這些逃亡者，在白天頻頻地變換住所，在夜間，他們鳩首討論逃去這「死街」的手段。報紙都完全禁止發行了。人們都把傳聞的消息當作真實。

一位有名的中國某大學教授到我的家里來訪問。他問我能否向英國大使館要求設法能保護那些抗日的智識階級的安全。這是因爲他以為：英國大使館向宋哲元將軍要求了「北平和平開城」，宋將軍已經接受這要求，那麼，這件事也許能夠辦得到的吧？燕京大學的一位學生（我曾擔任過教授）來問我：「美國海軍依照九國條約，將要開到北平駐屯，這事是實在的麼？」北京大學出身的一位學生發瘋似的跑進來說：「若不能走出這個死街，就不能去參加游擊部隊了。」他向我打聽，能否使用英、美當局的軍用載貨車，把抗日學生都護送到西山。……這一類的樂觀的見解，教授們也完全一致。他們相信日本蹂躪了九國條約，英美兩國會絕對地對日本斷絕國交。及至我告訴

了他們，在美國兩國對於中國，不會有什麼有效的援助，外國商人在戰爭中仍會繼續供給武器，他們才吃驚地睜大眼睛。我覺到在未來的時候，對於數百萬的中國人，非改授政治教育不可了。

可是，對於曾經使我安住四年以上的北平，對於曾經不斷地以好意與禮儀相待我的北平的友人們，爲了感謝他們，我只盡了一小部份能盡的力量。我是和一個瑞典的「辦住」在一塊，住宅很大，空著的屋子也很多。不久，却被「這些政治的避難者」住滿了。東北大學的總長住在大門傍的一個很便利的屋子里。每屋有一位巡警到這「里來好意地報告日本軍的活動狀況以及各種消息。另外六個人也都潛藏在這個住宅的角隅，等候逃亡的機會來到，就極秘密地逃出去了。只是我極厭惡日軍的走狗們嗅到這裏而來搜查，日本軍侵入之前，北平的住宅完全滿員。現在却到處都有空屋，到那都有朋友向說願意以極便宜的房費——甚至有的不要房錢讓給居住，因爲日本軍把好房子漸漸都占領了，只有讓外國人居住的方法，才對對抗日本占領住宅的惟一防禦政策。並且，人們爭先恐後的破壞潛匿，線收音機，因爲日本軍以爲誰有無線收音機，誰就是共產黨員。最難堪的該是學生們了，因爲他們不能再繼續求學，他們又必須把他們的書籍完全燒毀。有的人來到我家裏，「一直等到北平光復那天。」希望允許他在我的家裏潛匿。

經過一禮拜左右，學生們不再到我這裏來了。有的被日本軍捉去。最多的是從北平城壁的某一段越城而去，那一段城壁，是巡警親切的告訴學生們的。這樣，一群學生們更越過萬壽山離宮，到西山去了，他們在西山組織了游擊戰最初的農民部隊。一九三〇年八月，日本軍增加了兵力準備收拾這一種障礙物，轟炸了西山的丘陵地區，現在仍然在繼續爆炸。

一天午後，夏雨在落着。一位姓吳的中國青年來了，他那剛光的頭上，滴落着汗珠與汗珠，臉上帶着笑容。吳君拿着我的老友——東北軍士官張有賢（譯音：Cheng Yu-heng）的名片，吳君告訴我：張君現在在市場外指揮游擊部隊。在幾天之前占領西城城壁附近一個軍事監獄，解除看守的中國人的武裝，奪去小鎗與彈藥，而這軍事監

獄」的囚犯（大部都是政治犯）都完全編進他們的游擊隊里，這些政治犯，實在運氣好，他們都在日本軍開到前線了——連看守也在內。

可是，吳君的來訪，還有一種目的。就是他們游擊部隊一部，在懷着相同目的而來的日本軍開到的幾小時前，把妙香山附近的西陵某一陣寢襲攔了，因此，這一部隊在九四〇年，在北平近郊都被槍殺了。那有名的游擊隊指揮者 Otero Janv 指揮下的一部隊。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想把陵寢埋葬的寶石，珍珠，鑽石，黃金等價值極高的東西去換游擊部隊新編成的軍火與糧食。吳君問我美國是否買這些東西，我嚴重地告訴他怕是不能吧。他立刻失望了。最後他還問我是否有辦法。

這些政治的避難者，不只是我，連別的外國人也不能不供給他們以避難的地方。這是日本軍的代價人平岡特務主任，和我們之間已經演出很熱鬧的現狀：「隱匿抗日份子」，幫助出賣「抗日軍獲物」——這樣，會不會使大使受到害呢？另一方面，採取聲明固然是我的工作，可是關於這一類事情，在寫與採訪上，不沒有實地的地方呢？我的心中也不能肯定了。

我終於想出擴充他們的辦法。那是在幾天之前，某一游擊部隊從西山僧院架走了意大利人的修道和尚與司祭，向北平日本軍當局「求」還金，並照游擊隊的企劃，一方是使日本軍在外國人眼前丟臉，一方是「了」了蘇道和尚的需要金錢，關於這件事，我問吳君，我的猜想是對了。吳君說這是他們部隊作的，「個意大利僧人，」在安置在妙香山附近。

「這樣作，中國決不會得到外國人的同情。」我說：「假如你們游擊隊不使人當作土匪看的話，那麼還是趕快就把那兩個和尚放了吧。」

「可是，那一個和尚為了幫助日本軍，把自己的傳道工作拋棄了呢！」吳君辯護事情的理由。說：

「他們請日本軍士官客，並且把我們的動靜告訴日本軍，日本軍便把我們游擊部隊根據地的村莊燒毀了。意大利承認滿洲偽國，又參加防共協定，他們和日本都是法西斯同盟國家。」

我會受過洗禮，並且是加持利教徒，在這樣理論里所潛在的中國人的思維，我却充分的瞭解——自然。這是由於我長期住在中國所致。我用一點鐘的功夫，和他說明這件事情對他們有利，但公開在外國，便完全不利，兩互相比較，相差很大。結果，他終於理解了，對我說：「可以釋放那兩個人，不過關於出賣寶石的事，還希望你幫忙。」這樣，他告辭了。

我給予他的忠告，是否有決定的力量，那我在最初還不知道，不過在其後，那兩個僧人是被釋放出來，健康並去受到損失，據我所知道的，那一個游擊部隊在以後並不會再演出像這樣的過錯。反之，他們極力去獲得政治的指導權，那一地帶的全體，都和外國僧人，宣教師保持着友誼關係。

數日之後，我等待吳言的再訪。某一位教授夫人用電話招我去吃飯。我去了，一同吃飯談話，經過半點鐘久吧，一位剪髮長髮地披着，戴着墨眼鏡的中國太太進來了。這位太太跑着非常親密，及至拿下眼鏡，笑着說：

「你不認識我麼？」

我才明白。她並不是我在北平就能會見的人。同時又是日本軍必須捕捉的人。——前中國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周恩來先生的夫人，中國共產黨婦人勞動部長，鄧穎超女士。她在我會見的中國女性中，政治的頭腦，最敏銳的女性。

「我以爲你在陝西呢！」

她說她在五月前，爲了養病來到西山，在一年前，我在保安會見了她，那時她的面色蒼白，身體衰弱，在保安沐浴着日光，和「西遷」時候更加重了的肺結核作戰。現在會見了她，在比較之，她完全把健康恢復了。在西山絕

庫的寺院里，充分的採取飲食和休養，在乾燥的北國，經過了春天，她完全恢復了。在日本軍不會近寺院附近，她完全不知已發生戰爭。她化裝作農婦，越過日本軍戰線潛入北平，已經遇見過很多次生命的危險了。

「決沒想到你住在這裏呀！」我說。

「當然出於你意料之外，現在我想早一點回西北去，你能不能和我一塊去天津？」她說。

這一條通海的鐵道，現在僅才恢復交通，可是以前二小時便開到天津，現在就得十二小時，同時，一天只開一趟車，日本軍對旅客的檢查太周密了。特別在天津車站，只要他們認為某人是政治思想人物，就捉了去。不知有幾十個幾百個學生們被拉出車站，以後不再看見他們從拘留所里走出來。在這樣情形下，像鄧穎超這種人，在旅行上一定是禍多福少的，不過，日本軍還不敢拘禁外國人（在天津租界還未隔斷前）。

我對她說：「可以一塊兒去，不過，爲了安全起見，你裝作我的家中的阿媽女僕。」

我也計劃去上海。北平的電報通信各機關，現在都在日本軍手里，一切的當地新聞，如果不受日本軍的檢閱便不能發出去。北平雖然是新聞的中心地方，現在完全和死一樣了，我曾接受到我的報社命令我去上海的遲延電報，上海正發生了戰爭。另一方面，我必須探訪到西北去了。現在行踪迷離的我的夫人，——妮姆。露爾絲，滿不滿足我所得到的新聞材料，爲了要親自接觸中國紅軍的實況，在四月前到延安去了，以後三月內沒得到她一封信。雖然她語說：「沒有信便是最好的信。」可是這句話在我實在沒有用處。我決心到陝西去探訪她。雖然陝西距北平，行程是一千哩。

另一方是爲了吳君盜墓的事情。吳君在那天的第二天到我家來的時候，我告訴他要離開北平。出賣的事應快一點辦，他說他在三天內便可以拿出二三種樣品和目錄。我爲此事，冒着生命的危險到一位美國商人家里去過。可是，妙峯山的游擊部隊，受到日本軍的攻擊，吳君沒有按照預定的日期到我這裏來，等到第五天，我不能再等待了。

，我把這件清朝傳來的珍寶奉託付一位美國人，讓他好好地代為交涉辦理。

第二天，鄧女士在前門停車場，以阿嬌的姿態出現。頭髮很奇怪的改成中國女傭的樣子。我看見她安全地進了車里去，在她的後邊撲撲着無數的腳與軀殼及臂膀。她的身形被擁擠到裏邊去，漸漸看不見了。在許多的人群里，我以為她不會聽見什麼意外。旅客們一經擠過火車里，一直到天津為止，中間，簡直沒有轉身的餘地，雖然如此，旅客並不把這事放在心里，只要是北平的逃亡者，都會把這樣的火車看作世界里的最終的一列，自從北平發生變化以來，沒有人想把出發日期延遲到明天。

我很容易地發現最後一輛車的最後身降梯上，還有容身的餘地，於是我飛跳上去，我找到一塊能容身的地方，那是手搖腳踏機上，我坐在那兒，陽光發熱地照耀在頭上與不付穿襪子的腳上，整整經過了整天。

和無數鎗眼的北平城壁作別，並沒有什麼可遺憾的，外國人深愛的北平時代已經過去。而我也因為在北平沒有什麼可作的事，把精神都消耗在北平的最後歷史里發生的混亂的事物的研究中。

以下便是那許多混亂的事實目的二三個片斷。

(二) 宋哲元將軍

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論語：陽貨篇

什麼是北平的新情勢呢？

北平並沒有什麼生命，只是在一種奇異地馳繞着城壁的迷路中，堆積着幾世紀的陸離的光彩與勝利收獲之關，

有百萬以上的；們任濟的中世紀的遺產。（作成一個美麗的都市，是需要好幾個世紀的長期間盤踞的強盜的。）北平是隱匿的清朝遺老與軍閥，學者與不在的地主，僧人與古董商與言語很洗練的洋車夫的街。北平是貴族的設計，貴族的建設的街。北平是藝術的寶庫，名門與顯赫，在山珍海錯前講究外交的計謀，比品性更媚，比露骨的惡更為罪惡的地方。北平又是溫和的春天，淡雅的秋日以及積雪壓枝，日光照耀在凍結的湖上的街。北平又是永久的妥協與輕聲淺笑，多閑與家族愛，貧家與悲劇，以及毫不關心於污穢的街，同時，北平又是不易捉摸的街，學生們從大夢里醒起，揭起民族鬥爭的大旗，蒙古風從戈壁沙漠激烈的吹來，古老的人生砂塵，覆優雅的寺院與黃金色的皇宮的屋頂的街。

一九三四年，日本軍占領熱河後，北平又變成「圍境」了。常把北平叫着故鄉的人們，對於這個無防守的街，曾經長期間的危難，都不曾受到毀滅，不覺的會驚訝起來。每天早晨起來看看，塔樓上還是中國兵在駐守，這不能使我們吃驚。普通人們傳說，這大約由於日本軍也很愛着北平，瞭解北平美術品與價值，而想毫不損壞它便完全占領，還難推測，也有幾成是事實，可是，實際並不會像日本軍想的那樣容易，他們曾經碰到預料不到的強大的抗戰，在相當的光榮下，這朝街才陷落到日本軍手里。

那是由於在最後支掌北平局面是富有氣骨的宋哲元將軍的手腕所致。宋將軍是軍人，愛國者，他的政治思想完全和北平的封建的裝飾品一樣。他很自信，他的自信比那些被他那不變的殷勤與尊敬所招待的日本人也高過幾分。他並不是進步的支配者，（可是不論是誰，在他那種環境下，也不得不這樣）可是，他絕不是愛國的人物，也不是無思考的就先向誰下手的人，他只受過軍人的訓練，雖然不適當擔任中國最困難的這個時期的外交，可是他的政治的手腕使用得很巧妙。——日本軍部的陰謀家最初想操縱他，利用他，可是和現在，以及其後二年間他的動向一經比較，無異地，日本軍部的幻想是毀滅了。

在這里，把話往前提一下，宋哲元將軍是在一九三三年得到名聲與權力，他所率領的第二十九軍，在日本軍占領熱河後將準備進攻北平的時候，二十九軍在長城喜峯口，用白兵戰一舉殲滅了日本軍的一個部隊，於是他的聲名，一躍而轟動全國。在他和日本軍抗戰之際，他並不會得到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援，事後，中日政府之間，成立了塘沽停戰協定，華北的戰鬥便結束了，不過，這平靜是一時的，其後日本軍部便要求中央軍完全從河北撤退，要求當時支配北平與華北各省的蔣介石主席的軍事委員會撤退。

蔣介石採取妥協政策，對於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他允許了，便任命宋哲元將軍爲委員長，原來宋哲元的軍隊原先是馮玉祥的一部國民軍，曾經參加好幾次地方的對蔣委員會長的戰爭，並不受中央軍的指揮，另一方面，七肥原賢二少將（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很喜歡宋哲元並且日本軍知道宋哲元，處理這地區的政務會能使日軍感到滿足，同時日軍相信宋哲元是野心的政治家，這樣，便把宋哲元推奉到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地位上了。

日本軍部確是把他們所選擇的人物看得太理想了，而在宋哲元這一方面，無論怎樣，宋將軍決不會仿模培特亞德（一七四一——一八〇一）。一位美國將軍，在美國進行獨立戰爭之際，這個人作英軍的內應，可是日本軍部却期待宋將軍在日本援助下脫離南京中央政府宣言獨立，去當華北五省政府的主席。在這一次，如果宋哲元能像日本所期待的那樣作下去的話，也許日本不遺用一兵一卒進行戰爭，便直接達到目的。

宋哲元在就任委員長之後，土肥原少將便使宋哲元將軍受到在他的一生間最重大的恐嚇。

土肥原密秘里訪問宋哲元，要求宋哲元立即宣誓華北自治，如果宋哲元答應這要求的話，便可以立時支給一萬萬元現金當作新政府的財政，對於宋將軍的軍隊，會給予以再武裝訓練的機會。這在宋哲元將軍確是一種誘惑，因爲宋哲元並沒有錢，而自己進出中央政府的將來的希望，根本就不會實現，並且，如果自己拒絕，土肥原的要求，若日本軍攻擊來了的話，他確信中央政府並不能來援助，按照許多的事例來說，也許自此以後他的軍隊完全瓦解。

在幾天中，宋哲元都彷彿在難以措置的難境里，土肥原却又爲了加強他那「要求」的力量起見，利用冀東地帶的「胡匪」（事實，這些胡匪受着日本軍的金錢補助），土肥原一方否認塘沽停戰協定（北平，天津，長城一帶，按照協定，是非武裝地帶，中日軍部不許進駐。）一方聲稱爲「恢復秩序」，使日本軍若干部隊進駐冀東地區，自然還分明是對宋哲元表示，如果拒絕土肥原的要求，那麼待攔的日本軍會馬上開始行動的。

這期間，南京中央政府的指令，仍然曖昧，模稜，如果宋哲元對日抗戰的話，畢竟能否給予支援，還弄不清楚。到了九月九日（一九三五），土肥原個人的（以後判明的）最後的哀的美敦書的期限，完全出於意外，北平突然發生了學生示威大運動，拒絕「華北自治」，北平公安局受蔣介石第三憲兵隊（當時還在北平）的指導彈壓這示威運動，參加運動者，有數十名受傷及拘禁，宋哲元充分認識這突然的事情的價值，便利用這事實，和土肥原談判必須等到民衆的情感平靜後。

其後又有一件事，宋哲元突然稱病。在天津的宋哲元的幕僚，探知日本華北派遣軍對於土肥原的計劃，非惟不關心，並且反對。南京中央政府知道這事後，勇氣大振，立刻照會東京日本政府，日本政府當時並不會決心用戰爭去解決，只用恐嚇政策以期達到目的。可是對於北平民衆抗日情感的爆發，日本政府也吃驚不小，深恐波及中國全國，發生排斥日貨運動，於是對土肥原大加斥叱。這樣土肥原的「華北自治運動」的企劃，完全破壞了。事後我會見過土肥原，他說：「這件事已經結束，可是有點像報紙上一段秘話似的。」

可是，不久以後，土肥原進行設立「冀東」傀儡政府的時候，滿洲的關東軍，曾經很盡力支持，總算面子上好看。冀東政府——確是一個錯誤的存在——名爲「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冀東地區二十三縣，都受半日本人的股女併傀儡主席支配，在這一地區成立偽政府後，不僅增加日本的戰略的價值，並且被利用爲麻醉劑以及各種商品的運輸基地。由日本密輸來的數百萬的鴉片，海洛音，都在這一帶卸到陸上，日本軍的特務機關指揮，保護這些密輸

品，由日本與朝鮮的密輸商人往關內搬運。

北平戰略的地位，由於此外各種日本軍的策動更行減低了，北平的實像若不親自去看，是不會明白的，它已變成一個軍事與政治的骨董，不僅是冀東，由山海關到北平——這個曾經被規定為禁制之街的北平——的北寧鐵路——完全都在日本軍的支配手里。

他們在有戰略價值的鐵路各站與華北最大的港市——天津——的堅固的兵營以及北平大使館區域內，配佈七千名軍隊，在名義上，他們說這是按照一九一〇年義和團條約列強各國應享有的權利——從北平到天津海濱的一帶，都有配佈少數兵力的權力。可是日本在這一帶駐屯的兵力，比列強各國駐屯兵力的全部還高過數倍，並且目的極不屬於正軌。他們不絕地說是「演習」，自由地馳騁在田地裏，並且對於阻止密輸業的中關稅官吏，以及看見密輸業拿着一大堆貨物走進車里，要求拿出車票的中國鐵道站員，官吏等不斷的威嚇與襲擊。

宋哲元對於日本軍這些非法，完全沒有制止的實力。而對於日本軍之對自己的軍隊不斷的加以侮辱，也不得不忍耐。他自己說自由指揮的僅不過是第二十九軍，在這六萬兵力中，只不過配佈一萬人在河北省北部，他不依靠南京政府的援助，而南京中央政府里的人們，由蔣委員長往下數，沒有一人能信任宋哲元的，西安事變前，中央政府對於河北問題而不會訴之以武力，便是一個證明。

總之，宋哲元在這期間，不論華北發生什麼問題，都是代替南京政府去負責，他知道他自己不過是一時被使用的緩衝工具。可是他絕對不把自己所思維的外洩於人，因此，日本軍對他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意，相信一定會把他拉到自己的手里來，可是在宋哲元這一方，不久他也理解了，如果日本軍攻擊他的話，一定會向中國國民全體攻擊的。

這完全是我有生以來最初碰見的巧妙的政治手腕。在某一時時候宋哲元向南京政府接近，在某一時時候，又和日本

政府討好，一方保持兩方面的均衡的關係，一方把時間努力延長，日本政府要求使蔣介石的特別憲兵隊撤退，解散華北的藍衣社，宋哲元接受允許了。——關於這件事，我想自己心里是喜歡牠的。日本要求政務委員會甲，應該聘請日本顧問，他先允許了。他很嚴肅地聽取日本顧問的忠告，可是却不實行。北平的文化人痛論社會改良的必要，他便在幾週內，餉斃了鴉片煙君子數百人，連蔣介石也輸他一籌。他支持新生活，這也許是孔子的教養在他那封建的精神里刺激的作用。

在形式上，對於急進派，宋哲元是毫不留情地壓，可是據我所知道，在南京必須拉進監獄里幕後的急進主義者，有很多在北平住著，而宋哲元的部下人們，有人還愛著某種程度的抗日組織與排日書籍的出版。我曾看見他的部下兵士，在北平城壁上讀着抗日書籍，「北京報」是宋哲元出錢辦的報紙，對西安的「叛軍」却表示同情，同時主筆先生，在很慎重的態度下，對於共產黨的共同戰線表示贊成。

並且更爲奇妙的是在北平，存在着全國最強大的抗日學生團體，他們完全支持宋將軍。從事實來說，一般人們的抗日意識的評判，已經由評判宋哲元而轉到評判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了。日本一片認爲這是聖北脫離中央的象徵，一方認爲這是對日本軍的真正的脅威。

雖是極短的幾月間，在這種顛倒的情勢下，華北地域便釀成了對內政自由批評的言論。——比南京政府所管轄的任何地方都自由而大膽。

宋將軍會打沛克，更會劍術。常常招我我們玩球。他的顏面表情像佛像似的毫無感動，山東由農民出身的人物，時常穿着粗大的卷煙和他的面部對照成極不調合的樣子，他更好引用孔子的論語。

他決不任用陰險的壞蛋好的偽善者，他的身邊，有二三個富於愛國心而精神煥發的青年，他對於北平施政上，確有一部分改善，這許是他受到身邊的智識階級顧問們的影響所致。可是他身邊的青年們却都對他的對日，欺瞞

以策表示焦急。和他提到「人民戰線」問題，他懇切地教給對方以奉的軍機，或勸對方走進軍險里，或者勸對方自己到魔窟里去把妓女組織起來。他以爲獨身的男性易於發生政治的急進思想，而這些青年們焦急的原因便是由於遲於結婚所致。

每逢難於解決的大事，他就稱病謝客，他使用這種方法，並不是閉門享福。他又常常藉着「掃墓」名義離開北平——自然他有離開北平的作用。最後在長期的「掃墓」休養中，使日本軍確信爲了要得到在華北自己所願得到的地方是必須創造出像蕪溝橋那樣的事變。

曾被國民黨的英雄——汪精衛，評定爲狡猾的「反動主義」者的宋哲元，使日本軍在激憤之下，用百萬兵力與二百億的戰費才獲得。假如汪精衛代替宋將軍而坐鎮北平的話，恐怕像日後所證明的事實一樣，（註）日本戰領華北，簡直只需要那些兵力與戰費的百分之二十，便可達到目的了吧。

（譯者註：這句話是指汪逆離開重慶，背叛中央政府與國民黨，甘願爲日本利用，組織偽南京政府事。）

（三）七·七事變

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中國格言

中國人以陰曆去計算月日的時候，使用着特別的美麗名詞。及至改用陽曆，對於月日，往往很聰明的省略，只使用數字，在「國恥日」「事變日」，高唱排斥日貨的時候，他們使用數字而省略月日，這很容易使我們發生錯覺，以爲是球比賽時候的計算勝敗。例如「五，四」（五月四日慘案）「九，一八」（九月十八日東北事變）「雙

十」（十月十日國慶日）之類的數法很多。特別自「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以後這一類事情陸續不絕，所以「七，七」事變是這部原稿里不能省略的地方。

宋哲元的「掃墓歸里」^①，能與英國的遜爾·捷巴倫氏的「釣魚旅行」媲美，這兩者都因為地方上的危機達到極點無以措置而採取的暫避的手段，宋哲元爲了避開日本軍對於政治與經濟以及軍事的進步要求，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回到他的故鄉山東去了。在日本軍的要求中，還有許多特別的事情，例如日本軍在測量完北平的戰略的鐵路交叉點——溝橋之後，便強硬要求割讓約一千英畝的土地去修建飛行場與強固的兵營。正像德國駐紐約的領事，向紐約市長強硬地要求把夫拉斯布修讓給德國一樣。真是隣人很合理的要求呀。明白這原因，就知道宋哲元突然歸里掃墓的孝心所在了。

蘆溝橋在北平西南，距北平十五哩，是永定河東岸的車站，和北寧鐵路聯絡最遠距離的往復線的西部，同時又是京漢鐵路的聯絡。一年前（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軍便無法無理的占領了東部的豐台站，如果再占領蘆溝橋，便等於把通達北平的南部鐵路關口的支點完全握在手里，蘆溝橋東方數百碼，便是永定河的鐵橋，再其次便是古都宛平，我會和朋友們有好幾次去鑑賞這那曾被馬可索羅讚美過的大理石橋。

日本軍特務機關，曾經數次和中國地方當局折衝蘆溝橋與宛平附近的土地問題，宋哲元雖然正面不能拒絕，可是在側面却努力保持着這個最後的防衛線。

然而日本軍在這一帶接二連三地實行「演習」，却使宋將軍防不勝防。日本說這是列強在中國應享有的特權，在中國內地可以建設軍事基地，同時日本分明是在企圖破壞這個特權，演習中頻頻地發生的不吉利的事情。在七月七日夜間，日本軍要求進入宛平搜查，很堂皇地，他們說這是和平的合理要求。

宛平縣長並不客氣，他拒絕了這樣的和平要求。於是北平的人們在夜半被炮聲驚擾了。日本軍用白砲攻擊宛平

，中國軍的防禦部隊（人數很少）也開始射擊。

第二天早晨，我用望遠鏡眺望，日軍已占領溝橋了，正向宛平與馬克索羅橋上用沙袋堆成防線的中國軍，散亂地攻擊。其後在這幾天內，兩軍相隔僅幾碼，互相對峙，我會無事看過兩軍的戰線。我以為只要日軍撤退的話，這件糾紛就能很容易地解決。

在當時與事後，日軍並不會證明他們兵士中有一個人被中國軍拉去，在和新聞記者團會見的席上，我們要求日軍詳細說明日軍兵士失蹤事情的時候，他們並不高興與拿出失蹤證據來回答，他們只說是有有一個兵士失蹤，藉此發動武力。至於是不是特務機關主動的這件事情呢？東京日本政府是否事先已經知道？或者最高統帥部指令而作出來的呢？最初我還不詳細，其後在這事情的交涉上，看日本政府是徹底地想要利用這件事的樣子，就明白事情是那一方指令的了。其後在國際聯盟的報告上，攻擊日本的決議文中，就有指出日本是始終地先下手挑戰的詳細記錄。

關東軍立即向冀東與天津派遣增援軍隊，到七月中旬，兵力已達二萬人以上。中國這一方呢，不論在華北，在南京，在東京，或者在全世界的各首都，用最大的努力進行一縷和平的交涉。日本提出半打以上的要求，中央政府允許了，日本又換了新的要求，日本不希望和華北自治當局進行協定交涉，日本只是希望占領華北全土，日本的交涉，不是外交，而是一貫地使用武力去解決，日本更使用外交的交涉形式去隱蔽自己在華北的軍事準備與武力解決的手段。在當時，或在事後，只要一看就能完全瞭解。

戰爭呢？和平呢？屈伏呢？鬭爭呢？只有決定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政策上，中央政府在「夏之首都——」結續召開了特別會議，蔣委員長已經感到各方面都一致向自己要求決定抗戰，連他最信任也最有天才的將軍們，也說如再讓步，對國內也有危險。同時最緊急的反派，也通電給他，只要決定抗戰，不惜全力去支持，另一方沒有人警告說如果屈伏，全國國民對中央的信仰也會動搖起來。到了七月十日，蔣委員長已不能再沉默了。在這天他的宣

言，是中國的蓋斯布爾克演說（美國南、戰爭之際，林肯大總統在蓋布爾克演說過。）也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宣言。在宣言的同時，決定對日施以英雄的痛擊。

「無論中國爲如何脆弱的國家，處於今日國家交涉的基礎上最小限度的條件是應存在的。」蔣委員長把這最小的限度分作四點：

- 1 解決案必須不侵害領土主權。
- 2 中央政府確立的翼察政務委員會，不承認予以非法的變更。
- 3 宋哲元將軍以及在華北的官吏，不遭受日本的干涉與排斥。
- 4 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屯的地方，不能讓給日軍。

委員長說：「在現在，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最後的關頭』這句話里所含有的犧牲之大，我們已走到這個關頭上了，所以我們必須堅決的抗戰，不然的話，企圖一時的躊躇與苟安，那我們就等於永遠的滅亡……現在，爲了爭取最後的勝利，只有把國家一切都投進戰爭里……」

在這演說之後，中國方面還希望有一種和平的可能，所以還曾經忍耐到相當程度。例如第二十九軍一小部隊所駐守的北平——天津之間的一個小市——廊坊事件，便是一例。在一個夜間里，日本士官率領兵士乘汽車到這里來，向中國兵營要求借用軍用電話，中國軍要求他們必須在兵營外解除武裝，日本軍却不接受這要求，竟侵進兵營里占領了電話室。

實際上，中國軍的隊長，已經嚴命部下，只要對方不先射擊就不許這方先開鎗，所以日本軍侵進兵營里之後，隊長却像對客人似的讓日本達到他們的目的，可是日軍所掛的電話，却是向天津司令部要求派來甲車部隊與幾架轟炸機（這是日軍自己說明的），裝甲部隊等立刻就開到，向車站用炮火轟擊，最後占領了車站，在受到攻擊之

前，中國軍始終沒有先開火。所以中國軍受到很大的損害，退出了廊坊，在北平這一方面呢，却仍然進行交涉。

幾天之後，杉山陸相（大臣）發表：在東京目下正集合八個師團（約十六萬人）與二百架飛行機派遣到華北去。到七月二十五日，華北派遣日軍司令部才向掃墓歸回北平的宋哲元將軍，交出最後通告。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宋哲元以及二十九軍完全由北平附近無條件撤退。這通牒是最後一次。宋哲元向南京政府通電拒絕這要求。並且要求政府承認自己軍隊的抗戰。到第二天接到回電之前，宋哲元發表了很簡單地在努力避免戰爭的聲明書，聲明書的結論是這樣：

「日軍繼續派遣到華北與再三的作着挑戰行爲，結果使中國軍不得不在力量的限度內，擔任防衛國家的任務。除此以外，沒有辦法。」

這是如何勇敢的聲明呀！實際宋哲元完全不能維持他的地位，因為在北京的軍隊只一萬人，又沒有戰車與飛行機，只不過有一小部的普通砲火而已。同時，以前又不曾許可他們去建設堅固的防衛建設。他們只擔任維持秩序的任務，所以軍隊都分散地在北平的灰色城壁外的村落與南營北營駐屯。日本軍把天津——北平之間的鐵道把握在手里，中國軍却只有銅鑼鄉間的土道才能集合起來。日本更向南京政府威嚇，如果中央派遣援軍到北平來，將把「交涉」停止，所以南方的中央兵力不曾具體地到華北援助。

在受着絕望的包圍之下，宋哲元將軍還希望有最後的一剎那能發生意外的和解。但他已決心抵抗了，即使這個偉大的都市失陷，也要給中國國民以振作的刺激，他不願他的第二十九軍，背叛國民的信任與期待。城內發下戒嚴令了。不曾逃出的日本非戰鬥員與外國人，一齊都撤退到大使館區域里。城門閉鎖，街道上堆起沙袋，命令南苑駐屯軍隊——這是殘餘下的最後防禦線——命令：

「如受攻擊，即應勇敢抵抗！」

日軍在二十九日開始攻擊，從這天晚上到第二天晚上，使用三個飛行中隊與重砲，一齊轟擊兩營。中國軍約有二千餘人，在英雄館——也是絕望的抗戰——下，三分之一都壯烈的戰死了。因為中國軍的防禦線，只不過是臨時緊急作成的塹壕與沙袋堆成的壘壁，日軍的砲彈與炸彈，急雨似的落到津里，繼續地轟擊由二十四小時之後，日軍步兵隊，在戰車後遂開始進攻而來，並且隔斷往北平退却的道路，剩下的中國軍只有潰散，這是中國軍英雄的抗戰第一個淒切的場面。

第二天，我和路透社的伊米遜 走出永定門，去觀察在這次抗戰，最初被鮮血渲染的南苑，在南道路上，還有不會被日軍占領的地方。在這地方，有許多在南苑戰傷與傷重死亡的中國軍人。有一位青年，大腿和膝蓋都被鎗彈打通。我們問他，他說是大學學生，在幾星期前，從東北過來，來的人都是東北大學與中學的熱血青年，一共百人以上，經過再三向宋將軍懇求的結果，宋哲元特為他們編成特別訓練聯隊。在這聯隊里，學生出身的士官候補生共三百人以上，其間還有幾個共產黨員。在這次南苑戰役中，他們約有二百人左右都英雄的戰歿。他們這一次的陣亡，給中國全國以極大的刺激，使全國抗戰的精神在以後越來越強烈燃燒起來。這足以證明東北青年與華北青年愛國的精誠。

在南道上，另外還有三個年青的中國將校陣亡，只有在中國——在這次戰役上連陣亡的將校們的屍身也很難於我得到。

南苑整個被砲火毀壞了。到處都有在撤退中被殺死的屍體。日軍的飛機，以極低的距離在路上偵探，碰見人馬就反覆的掃射。在某一地方，日軍有一部隊在埋伏着。一隊縱列走來的中國軍，完全犧牲在機關鎗的掃射下。連軍馬，人夫，也都死在一塊田地上，好幾個中國農民的死骸陳在那里，很新的白砲六架，被毀壞遺棄了。路上零亂地遺散着能裝一貨車那樣多的未炸開的手榴彈與鎗彈。

沒有人來救助受傷的軍人，一切人們都不關心他們，這完全是中國人必須受到的待遇——以後沒有組織的民眾，在戰爭中的軍隊是很不幸的。北平固然有許多醫院，可是中國軍隊和醫院並沒有組織，聯絡與訓練。其後幾月內，在每次中國軍抗戰的戰場上，我都曾遇見過和這樣相彷彿的事情。在這天，只有一個瘦小的戴青呢國帽，穿著長長地藍色僧衣的老年人，在南門碰見的時候，發狂似的跑到我身前，向我打聽往南苑去的道。他從保定和在保定由天主教組織的野戰衛生隊員一塊兒才到北平。大約他們是按照原教旨主義（基督教的一派，信聖經的天主創造論，排斥進化論）來拯救傷亡的中國軍人。我告訴他去南苑的道路，他就飛似的跑去了，以後不會再會見過他。

以後日軍向華南，東西進攻了，北平與天津一時比較地恢復了靜謐，可是華北的中國軍的犧牲決不是毫無代價的，由於華北中國軍的英勇抗戰，鞏固了全國國民的抵抗精神，南京中央政府已經不再退步了。那曾被中央駐在華北的官吏認為「決不能與日軍爭戰。」的第二十九軍，用他本身的英勇地行動，已經證明是中央政府預料不到的了。在其後幾月內，第二十九軍在和優勢的日軍血戰之下，幾乎完全英雄的戰歿。宋哲元將軍和部下指揮官們變成了亡命之客。

其後，中央軍軍隊，實現蔣委員長所希望的出現在華北了。更由八月十三日起始，戰火延及上海，爲着決定二十世紀太平洋的運命，戰爭是更行進展了。

（四） 北方戰線

日本唯一的政策，是必須先攻破中國，使中國屈伏。

火車將開到天津的時候，因為我腰里並不會帶鎗，便和車里二三日日本兵談起話來，我用英語與中國話訊問他們「爲什麼和中國戰爭呢？」爲了要得到可靠的答案，我用一盒「駱駝」（煙卷）當作資本。送給他們。於是一切都明白了。日本人自己頂討厭日本的「煙草專賣制度」，只要有好煙卷給他們，他們的盲目的愛國心便會壽終正寢。如果中國能運來許多的美國製煙卷的話，也許就能把日本完全收買過來的吧。

「我們日本人是和平的，中國人却常起戰爭。」一個紅臉的露着牙的青年軍人說。

「中國兵把通州的我國人都殺死了。」另一個兵說。

「我們是爲把中國從共產主義里拯救出來才來的，德意志和意大利了解日本的立場，英美却不了解。」第三個兵說。

一個一看就知道是農民出身的青年兵士，說：「我是爲獻身給天皇陛下而被召集的。」他承認說：「我不大知道戰爭的原因是什麼。」

「可是，蔣介石總是危害我國人，所以我們和他作戰，並不是和中國人民作戰。」

由東北來的一位老遠征兵，用很流俐的中國話去罵那二三兵士翻譯，他自己說：「我們走爲敬訓一下中國人來的。因爲中國人真有點大膽過火。」

他們的回答和日本公式發表的完全一樣都是論理的。同時他們的回答很認真。老兵說：「外國人不會理解中國人的頑固，閣下若是信任中國人，那可了不得啦！」並且他從他在東北和東北抗日軍游擊隊作戰的經驗中，舉出一個例子，他說：「有的中國人好像已經屈服了，可是一有機會就又撲過來。」

火車開到天津，已經近晚了。我等候鄧穎超女史，當經過車站日軍步哨兵旁邊的時候，哨兵對於我並不怎樣，只是眼光有點討厭。鄧穎超一點也不慌張，微笑的對着日本哨兵走近，哨兵簡單地訊問她幾句，又在木板上檢查她

的柳條包，然後大聲地說：「行啦！」

等到我走過車站前空場的時候，我看見日軍拉着很多一排年青的中國女，往停在空場旁邊的軍用汽車那邊走，因為這些青年男女，雖然穿着鄉下人的衣服，可是和柔軟白晰的手對照一下，很使日軍疑惑他們是青年智識階級，當我越過帶刺的鐵條網，走進那時還很安全的英國租界的時候，我確實感到呼吸異於平日，這還是英國向不曾爲了自己的利益開始去作性命的買賣的時候——其後日軍向英當局要求交出抗日的中國人的時候，英當局却答應這要求了。

在英法租界街上，集結着五十萬左右的避難民，他們等待乘船到「自由」的華南去。船票都被人們大價買去，在有效的日期內，用最大的代價賣給別人。外國人可以乘坐頭等船室，還能攜帶一兩個僕人住在三等艙。由於朋友的介紹，把鄧穎超介紹給一個外國紳士當作阿媽帶到青島，在青島再買火車票由陸地往西北走。

「如果不裝作外國人的女僕就能逃走高飛的話，那我們中國人那里也都走通的吧。」送她的時候，她笑了。

「可是，薄儀却是裝進洗衣箱里從北平跑掉的呀！」

（註：廢帝溥儀從北平跑出，是被土匪原裝進洗衣箱里，秘密帶到天津的。）

其後再和鄧穎超見面的時候，是在漢口，她仍然是一個婢女，可是，她却是西北聯合婦人團體的議長代表，民衆的婢女了。

十天之後，我也買到船票，我的朋友捷姆斯·巴拉姆君也決定和我一同走，他剛寫完「中國第一幕」(First Act in China)爲了觀察中國紅軍要到西北去，他和我的妻一樣，都是自己要去看看在中國太陽之下的新的產物——紅軍的內幕與名聲畢竟怎樣。我們在天津，和J·A·紀特夫妻，英國詩人威利姆·易卜生氏一同喝着德國啤酒，消磨最後一夜的時間。不知是紀特君或是易卜生君，給日本人起了一個新鮮地騰動人口的綽號：——「日匪

「。在中國的日本人比在歐洲的日本人更特別，和這種情形等得實在一樣。那真是可記的一夜啊。

我們乘坐英國的中國沿岸航路 S·S·海口號輪船，由天津到山東。輪船由於貨物過多，連船橋上也睡着船。甲板上是黑髮黃臉的中國人，船員如果來往，也必須從人羣裏分開道。

我們在青島上岸，青島雖還沒有被日本艦隊封鎖，入口已有三分之二前往中國內部去了，市街非常的蕭條。在中國內戰時代保持首鼠兩顧態度的沈鴻烈提督，現在是支配青島的特別市長。日本想用金錢與險謀代替軍火來占領這一個美麗的地方。可是不久，日軍的希望就等於煙霧了。

那時，山東省全體的態度是很曖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日本占領當時被德國用作殖民地的姜寨——膠州。其後又占領德國資金所建修的膠濟鐵路。可是在華盛頓會議席上，由於締結九條約，日本不得不讓一步而把這兩個「戰勝品」讓給中國。雖是如此，但日本對於膠濟鐵路有很大的利益，並在青島有三億元的投資，而在山東省內又有一萬六千日本人居住，因此，日本總把山東視為日本的勢力與範圍內的地方。不斷地向山東省官吏贈送賄金，期待山東和華北一樣被日軍占領。

青島市政受南京中央政府支配，沈市長是蔣委員長長任命的。可是除青島之外，山東省完全都操持在掌握軍事大權的韓復榘手里，成爲一半是自治的樣子。當我和捷姆斯·巴拉姆到濟南，住在舊德國旅館，我們和別的外國爭論韓將軍能否作日軍的傀儡的時候，以爲「能够」的人占了多數。山東省那兒也不會被日軍攻擊，特別警衛隊很周密的保護日本人財產，日本飛機只來過濟南一次，這許多事實使別人不能不懷疑。並且飛到濟南的日本飛機，並不會拋下炸彈，拋下的是對韓將軍採取的「中立」態度表示惡感的信。韓將軍雖然曾通電中央政府表示自己的忠，並且把這封信公佈了，但他總不能避免受人懷疑。

按照我的意見，無論怎樣韓將軍不能背叛中央。中央漸漸漸漸到山東來。韓將軍帶下的軍隊——約五萬，

都受從前責任帶來的士官所指揮。可是這位老軍閥，大約希望戰爭不波及到山東省，同時他大約知道，如果不然的話，自己部下的軍隊就必須去作防衛的犧牲，所以他很慎重，決不輕易作出刺激的行動。他自己和部下都和日本有聯絡。這正像×××的官吏一樣，只要贈送賄賂，就易於買收。若在外國，他這樣行爲，一定會被人罵爲賣國奴。在山國却不這樣，韓將軍只不過藉此保護自己的政治壽命。以後他解到軍法會議，審議後被鎗斃了。理由是他有賣國行爲，實際是他想把自己的軍隊，從和日本軍的陣地戰的慘禍里解救出來而得到的結果。

到九月中旬，在華北戰線上，日軍僅不過是和裝備不足，不足不任的中國軍——河北，山西，山東地方的雜牌軍作戰。中國軍在戰爭初期，確受到很大的損失，可是沒有一個司令官會向日軍投降的。××××的意思好像是把地方的雜牌軍當作一時的緩衝工具，在背後才是中央指揮的新銳中央軍，並且漸漸地增加實力。在中國歷史上常常有這樣事情：——賣國的人並不是那些被萬人毀罵的「軍閥」，而是自稱爲「讀書人」的紳士階級，像王克敏，梁鴻志，以及國民黨的鬍兒汪精衛一類的人們。

日軍以天津，北平爲根據地，沿着三條華北鐵路的幹線，扇形地向前進攻，戰線擴張到華北與內蒙古。一部日軍西進，沿平綏線經過歷史有名的南口鎮向察哈爾，綏遠前進，目地是在占領鐵路的終點，戈壁沙漠關口的包頭。一部日軍沿京漢鐵路向那由上海溯江（揚子江）六百里，中國內地第一大城市——漢口——進攻。另一部日軍沿津浦鐵路進攻山東與徐州，想在徐州和由上海向內地進攻的南方戰線的日軍聯絡。

中國軍既無飛機與戰車，更又缺乏砲兵，同時又不曾受過和機械化軍隊爭戰的經驗，所以日軍以毫不留情的速度，向山西壓迫過來。日軍現在優秀的攻擊軍火的重壓下，把華北平原上的中國軍與長期陣地戰的戰果完全摧毀。在中國這方面却没有充足的戰術，有許多的中國兵，不會看見敵兵的影子就陣亡了。日軍的攻擊是用飛機轟炸——砲擊——戰車——完全是機械化的攻擊，機械化的衝破。先用飛機偵探，轟炸中國第一線的防禦陣地，繼而

砲兵隊便開始砲擊，把殘餘的防禦陣地轟毀，然後用戰車隊殺開進擊路，飛機便進攻第二條防禦陣地，到這時候，日軍步兵才出現了，往往不費一粒鎗彈，突進中國軍的防禦壘壕。接着飛機與砲兵向第三條防禦陣地進攻。

我們被褐色的大陽晒着，隴海線往西安行進，不久，共軍爲了阻碍那一黃色的大集團的日軍的進擊，把黃河的堤防破壞了，兩岸的平原，變成澤國。當我們經過河南省北部平原的時候，看見許多軍用列車急往前線馳進，這和北方的日軍戰線後方的軍事力比較一下，實在是一個很差別的對照，我曾看見在日軍後方數千輛美國製汽車，載重車，戰車，載着數千加倫的高級揮發油。在天津，我曾看見從東北陸續開來滿載着火油的汽車，大砲，軍需品，糧秣，軍官乘坐的汽車和火車，不知竟有多少輛。在這邊所看見的却是：營養不足的消瘦青年兵，坐在露天的貨車上，用樹枝堆成貧弱的防空幕，以備敵機的轟炸。在最後一輛車，僅僅裝着步鎗與機關鎗。我覺得中國軍在不曾機械化之前，是必須先增加砲兵隊。

我和巴拉姆君都一同相信這些灰色的軍隊，是不會看見日軍戰線後方所積蓄的那些優秀的軍火。

但是，侵界的日本軍到了山西，他們的機械化裝備便不靈活了，因爲山西的山嶽地帶，被中國軍利用爲最自然的防禦與障礙，日軍到這里才嘗受到困難的打擊。裝備優秀的中央軍X師參加防守，砲兵隊與飛機也有若時常出現了，在這里，日軍必須用全力和南京政府結成統一戰線的八路軍的敏捷，巧妙的戰術相對抗。並且在這里，在共產黨影響下，和軍隊協力抗戰的「民衆武裝組織」也出現了。

從古都北平到達西安的時候，我覺到我的妻在「紅星」之下的冒險觀察的事情，有點和好萊塢的電影故事相似。她畢竟參加游擊戰沒有？她在紅軍中的議論，是否有過失敗的時候？她畢竟是否已經作了空襲下的犧牲？雖然還不明白。但我總覺到有些可能性。當我到了西安的迎賓館，我立刻就去訪問八路軍的西安聯絡所。打聽妻的消息與

週賓館的周經理告訴我：「你沒會見尊夫人嗎？她在半點鐘前離開道里到青島去了。」

我吃了一驚，只爲了晚到一小時，就弄到爲養分飛的地步。可是公安局的人知道這件事之後，立刻去調查妮姆露爾絲的行踪，結果在這天晚上，在瀋陽找到她。她已做了延安戰時飲食的犧牲——患了亞米巴痢疾。她必須在醫院里靜養二月。爲此，第二天，把捷嫻·巴拉雅介紹給紅軍之後，我陪著妻回青島。

（註：妮姆，露爾絲女士曾寫過「紅色的中國」：In Side Red China一書，一九三九年在紐約出版）

在徐州換車的時候，又碰見一件意外的事情，在滿是難民的車站里，我遇見兩位從華北來的朋友。他們說徐州已受到猛烈的轟炸。——八十五架日本飛機轟炸隴海鐵路與津浦鐵路。於是當我到徐州時候，便上距離不遠的街上去調查損害狀況，有一列被轟炸的火車倒在那里，那是前天晚的特別急行車，乘客死亡很多，尼姆正搭乘這輛火車，如果不曾從瀋陽被我叫回來的話，那麼……。

在這里，我和一位從德州前線回來的士官談話。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根據到軍營來的農民的報告。說是日軍到處掠劫食物，在鄉村碰見雞，豬，決不留情。若只是這樣，農民們也只有認爲無可奈何。可是到後來因爲沒有雞與豬了，便從耕地上把水牛拉去。他們沒有宰殺的功夫，便把水牛吊在架上，下邊燒起烈火來，用刀去宰割那曾被中國農民視爲伴偶的水牛身上的肉，一邊就火燒着吃。水牛的悲鳴，聲達數里外，日軍的食慾却不因此大減。

農民們原來都留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及至看見這光景，他們絕望了。他們相信日軍是惡魔，這樣，他們一同逃到中國軍戰線來。「日本鬼不是人。」那些農民到處都這樣說。

二天之後，我們又到青島了。青島仍然被不吉祥的靜寂包圍着。有一天天氣很好，我和妻到海岸游泳去了。其實在這夏天季節，以前會有無數的避暑客人的足跡印在海岸的砂上，現在却毫無人跡，接連在這三天里，除我和妻

之外，沒有碰見第二個人，別墅都關着門。市民只剩下半，街道處在靜寂中像等待什麼似的。每天在海岸上，我們彷彿看見日軍的上陸部隊從海波的背後經過來似的。

日本人的工場高貴機械，中國在這期間里還不把它搬向內地，我很覺得奇怪，我要求沈鴻烈市長說明原因，市長却含糊其詞。後來有一天，市長的秘書告訴我，舊東北軍一大隊已紅圍青島了，不管日軍是否向青島進攻，現在就準備把日本人紡織工廠一齊炸毀。最初我還懷疑，後來果然實行了。在我到上海後，知道中國軍在撤退之前，把日本工廠完全燒毀，日本損失約在二萬萬元左右，可以說是日本在中國的財產中受損失最大的一舉。當然，中國不會把一部分機械搬向內地自己使用，有點太失算，可是中國軍司令部命令破壞敵國的根據地，確已很進步了。可以說以前曾經盛加討論尙未實踐的「清野政策」最初一次的實踐。

我買到船票，在船長的船橋上掛着吊床的一塊地方。離開了妻，向「東洋有史以來，最劇烈的戰爭」的上海去實地觀察。

(一) 敵 軍

戰爭是創造之父，文明之母。

——日本陸軍省

這一次是：一個還不曾吃過敗戰的國家和一個近世紀以來就不曾得到過戰爭的勝利的國家的戰爭。

在日本歷史上，只有一回，元朝的忽必烈王的大軍規模很大地曾經在日本上陸，由於不測的颶風而致船頭顛覆不幸的被擊退了。自此以後就不會有外國軍侵入日本。而在近世紀，在每次日本對外國開戰之際，每次都得到勝利，因此，日本的國民都相信日本不敗。反之，中國自從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以來，每次和外國開戰之際，每次都屈伏了，敗北的心理在國民之間是牢不可拔的。

現代式的日本海陸軍的建軍，還不足七十年。在一八〇七年以前，日本在中國大陸並沒有一點勢力。中國却是經過二五〇〇年光榮的發展形成了亞細亞的歷史，不論在那一次的戰爭，雖是像熊一樣的鈍重，在結局上，勝利終於中國的。——這是中國國民的信仰。因此，日本的不敗的自信，在確信「明日的勝利」的中國的靜穩態度之前，是要覆滅的了。

一八九二年——正是第一次日本對中國（清朝）戰爭的前年，日本的軍費預算僅不過一千二百萬元，這數目在现在的日本，一天之內便會消耗完了，日本用輸進來的步鎗大砲得到第一次中國戰爭的勝利，其後十年間，本國僅能製造輕便的軍火，可是老練的東鄉提督，却操縱從歐洲買到的軍艦擊破俄羅斯海軍，以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爲止，日本以這第二次的軍事勝利爲基礎，急速使軍需工業發展。對德宣戰占領青島的時候，日本已是第三次的勝

利了。

在明治維新之前——即日本在未打開封建制度之前，僅許可侍衛，武士攜帶武器。

明治維新以後，打破封建的身分制度，軍隊國家，從民眾間可以徵集補充兵，實行徵兵制度。軍事教練也普及起來。不過日本軍隊遵照舊有些保持着封建的特質，這種特質還被誇讚爲武士的傳統精神，實際上極力輸進外國最優秀的技術，由德國軍部招請德國軍人到東京，使其擔任教練兵士，講習戰略與戰術，以及軍火製造技術。日本軍部一切都模倣德國，而最近曇花一現的拿其斯德國的軍事前半期的「輝煌」戰果——那一種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的野心，不但是日本士官們的理想，還是日本軍部的金科玉律。

日本軍部從建軍以來就把握着獨立的權力，打破封建的身分制度之後，由長州與薩摩的武士們受到改編而變成了海陸兩軍。他們只對天皇負擔責任，在理論與事實上，也惟有天皇詔命令他們。在二十三年里，海陸軍得到了三回勝利，對於日本近代的發展，資本與產業的增進，以及使日本成爲帝國，一躍而爲世界列強之一，都是日本海陸兩軍的力量。可是在其後，這個武士國家的軍部權力，便受到政黨們依照日本憲法所規定的法則，對軍部攻擊了。

具有選舉權的人民與獨裁的軍部發生的反抗作用，在華盛頓九國條約，日本固持「爲了保障日本帝國在遠東的安全，日本海軍必須擴大」的已見後更形尖銳了。由於人民的強大壓力，自然便使軍事費不得不立即削減，縮小軍備計劃，而軍部與官僚中貴族階級的政治勢力，也自然減小了。軍事費削減到每年不足二億，常備兵力縮小到二十五萬人，數千以上的士官受着嫌忌而退出軍籍，徵兵制度大行變更，召集兵入營期間，不足二年便算完畢。

在日本人民大眾之間，爲了要求改革國內，發生了反軍部，反帝國主義運動，向殘暴的軍部挑戰，企圖使軍部在憲法的權力之下服從。一九三〇年，日本內閣排斥了軍部的強烈反對，進行交涉倫敦條約，並且日本一個外交文官，竟代表天皇在這條約上簽字了。海陸軍部受到極大的權力上的侮辱，按照這樣情形來看，使人相信日本是在掃

藩封建的一切特權，將要產生民主主義的國家了。

可是到一九三一年，情形一變，海陸軍士官們增加起來，加以社會的與經濟的複雜作用，使東北鬧出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官僚內部的失意分子支援的，陸軍軍部急進的青年士官們所企劃的，他們企圖藉着侵略東北，一方阻礙國的民族運動，一方恢復軍部在日本政府的軍事的支配權。由於中國軍的「不抵抗」，使日軍到處都不費一兵一彈的占領了東北，這種意外的成功，使日本軍部的權力又提高起來，其後更又破壞國際義務，驅使日本國民往戰爭上走，軍部在國內的地位與勢力很快的鞏固了，一步一步把以前的民主政治的政策基礎完全破壞，使日本國民「不斷的膨脹」起來，這樣，軍部在理論上應該和天皇一樣都站在「政治之上」，實際不然，軍部却變成日本最高的政黨，將軍們都成了國民政治的領袖。

軍部政治是日本社會里內在的社會經濟矛盾的一面鏡子。在理論與原則上，日本軍隊完全由天皇統率，那麼，軍的內部就不應互相反對了。實際却不然，日本軍部內黨派很多，每個黨都抱有軍事與政治以及經濟的野心，互相對立，常常發生暴動。例如陸軍青年將校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鎗殺了三個內閣閣員（註1）強迫要求改造內閣的暴動等等，都是軍部的黨與黨之間的競爭。對於這種暴動的解決方法，照例是互相妥協，或者重新分配政治地位，或者由日本國內軍部保有的利益重新分配。由於軍部大臣必須是現役將官，暴動的計劃完全由上部發動而滲透整個的軍部。

（註 二·二六事件。日本軍隊一部青年將校譁變，占領東京一部，射死岡田首相，渡邊教育總監。）

獨占日本金融的資本家——財閥，他們一方和軍部密切的協力，同時又和軍部敵視，可見都完全捲進軍部政治的漩渦里去了。在世界上只有日本一國的經濟發展與戰爭的關係最密切。日本工業的基礎，是由第一次和中國（清朝）戰爭建設的。其後的發展，也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膨脹一致。由於俄日戰爭一役，日本得到勝利，使日本軍需工

業，造船業，交通，鑛山事業迅速的發展起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又獲得許多的利益，中國變成日本的負債國。由於日本向來未嘗到軍事失敗，所以和感到「戰爭的幻滅」的外國資本家不同。在日本的頭腦里，認為戰爭便是致富之道。

在東三省，日本軍部大量地投資。並且接受許多產業與「偽滿」的國營企業。凡是能得到這種企業的地位的將校們，一夜便可暴富。特別是在憲兵隊與特務機關服務的人，那一定會保證他立即致富，因為，這些機關支配着軍部的投資與企業，日本將校們的年薪還不致美金二千元，可是「外撈」太多，很少有人從憲兵隊與特務機關退職的。

關東軍的梅津，小磯，板垣，土肥原之類的傢伙，在九一八事變後，我會會見過，那時他們都是徒手空拳只想獻身給國家的清純，潔白的人物。現在却又都是私產很多的富貴將軍了，幾年前曾經宣誓忠誠的替關東軍或華北派遣軍服務的一群青年將校，不久突然都變成財政家，經濟家，鑛業家，政治家，或者「中國通」，真是百花擾亂，燦爛一時。以前沒有人求他們幫忙，可是今日，許多的日本銀行，公司，企業等等，若沒有他們「金口」的幫助，就完全不能支撐下去。

在占領東北四省後，在抱有獨自的政治目的的軍部內朋黨的支撐下，要求國內改造的呼聲，由不平的下級將校口中吐出了。在這種呼聲下，產生了「防共協定」，國內改造運動，成爲從日本掃除「危險思想」的最簡便的觀念武器。果然在不久，發佈了許多宣傳小冊子，那是軍部教給民衆以極廣泛的智識——政治，經濟，藝術，科學，哲學，以及家庭生活的宣傳工具。

於是在這樣傾向之下，日本軍部和世界惟一的日本獨占資本，金融資本，國家資本結合在一起，更複雜起來了。露出國粹主義的某一種型式的傾向。

日本軍人必須讀的軍部發行的圖書，完全是攻擊腐敗的政治家，資本家，議會政治，外國的帝國主義，中國

的民族運動的東西，攻擊國除猶太人（註）。在「軍部社會主義」「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的美名之下，高唱「軍部全體主義」。可是每月只領三塊錢津貼的日本徵集兵士們，由於他們是樸素的農民子弟，在軍部這樣的煽動之下，雖然他們麻醉在「日本在東洋，負擔着神聖的使命，而這使命應由兵士們去實踐」的理想里，但不可諱言的是在他們的心里存在着某種反抗的作用。

（註：日本國內，並無猶太人，軍部的反猶太運動，實在滑稽。但在東北四省，日軍大量虐殺白系俄羅斯猶太人，預方百計掠奪他們的財產與金錢，這却是事實。）

每年的軍費預算，繼續地增加，到一九三六年，議會屈伏在軍部威壓下承認了軍部提出的中國事變的「軍備充實計劃」，僅以國防費而言，便達到全國歲入以上的數目。這些經費，大部分都消耗在軍需產業上——軍部想使日本海陸軍能匹敵歐美的新機械化勢力——可是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本還不會像意大利那樣自給自足，例如日本工場，當時一年間僅能製造三千輛戰車與四千輛大汽車，只是日本人認為「奇蹟」的是：當時還能從美國，歐洲各國輸進許多完整的軍火——特別是飛機。日本所有的最快的飛機都是德國，美國，法國所製造的。一九三七年六月，日本所有的飛行機，全部還不到二千架。純粹日本自己製造的轟炸機還不會出現。

可是在四年間的戰爭行程中，日本確已把全國經濟，重新編成，國內外的資源，完全使用了。——了建設強大的近代軍需工業。要求歐羅巴與亞美利加各國的技術援助，並且也獲得了援助。因為日本必須得到美國的工業技術與機械技術的設計圖本，更需要得製成純良鋼鐵，合金以及其使用的製造工程秘密。按照歐美許多專門家的見解——這種援助與戰爭資源的輸給日本，特別是鐵，煉鐵礦石，飛機使用的汽油（我國輸給日本的汽油，占百分之九十九），如果在開戰初的幾月內，或者在第二年，完全禁止的話，如果英法兩國也一齊把「戰爭援助」的輸向禁止的話，那麼，日本的機械到現在雖然不致完全不能操作，最低也要完全麻痺停頓了。

當然，日本在開戰當時，保有相當的豫備兵，比中國軍還優秀。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參謀本部很容易便增加約七十五萬常備兵與受過訓練的約達二百萬的豫備兵力，在日本國民戰爭的人的資源上，具有戰爭能力，達到年齡的將達一千一百萬人。如果列強還繼續補給日本的戰時經濟的話，日本最高司令部便可以使女子參加軍需工業，使中國與朝鮮去經營產米與「維持治安」，在戰爭達到最高潮與最危險的時候，便能使六百萬乃至七百萬的日本男子完全持鎗去參戰。

在裝備這一方面，最初侵進中國的日軍是比中國軍第一線兵力優秀，一師團的軍人保有六一五架機關鎗及三七米厘砲，七〇米厘榴彈砲，七〇米厘野戰砲各二十四台，百五米厘榴彈砲十二台，高射砲四台。在開戰當時，二十個師團都已經這樣裝備告竣，一九三七年末，這些師團，半數以上侵進中國。每個師團，當然附帶着戰車部隊，大汽車部隊，可是當時還不曾出現機械化部隊。

這樣的裝備，使日軍具有絕對的自信與不敗的心理，日本瓦全戰線向中國軍攻擊的原因便在於這一點。同時由裝備上又決定了戰略。日軍想藉着物力的優秀，一鼓作氣把中國軍抗戰的士氣摧毀，夢想着速戰速決。甚至於想在「三月內」完全決定中國的運命。

總之，日軍是想在中國本土，用迅速包圍中國軍的主力的戰略去獲得「決定戰」的勝利。

日本想實踐這樣的戰略，除了外國有一部分的干涉之外，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危險，就是如果日本錐狀的深入中國內地，中國軍把主力散開，日軍不能達到殲滅中國軍主力，這樣，日本雖然在戰線上是勝利了，可是在政治的決戰上，——即戰爭的最後決戰，怕會要失敗的吧。這種危險，詳細地說便是，戰爭若是「長期化」，中國具有二種戰略的財產——兵力數目的廣大與戰線的廣濶，這樣，中國軍使侵來的日軍不能把軍事的勝利利用與轉換在政治與經濟上，日本就不能制霸世界，非隱受最大失敗不可了。

我以為日本不該完全沒有想到這問題（註），只是日本對於中國軍的能力（兵力的數目之大與土地之廣，）估價太小罷了。

（註）日本林大將會警牛圖臣——關於這種危險。並且曾經表示自己懷疑「速戰速決」的勝利。——
三八年，在「キング」雜誌發表過）

這畢竟日本太自大了呢？或者把中國軍的弱點從形式上看得太重了呢？

（二）中國軍的防衛

從地圖上看，日本本土不及中國遠甚，注意到這一點的話，還有誰懷疑中國不能戰勝呢？

——蔣介石

這幾句話是在開戰後，蔣委員長對我說的。這句話是他指導全中國抗戰的基礎信念。其後，陳誠將軍對我說明那是「以空間去換時間的戰略。」中國的言語常多曖昧，關於這句話，與其說是戰略，無寧說是理論。

中國軍者和一九三七年的日軍實力比較，毫不成比例。可是當時的中國軍已是民國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了。若是日本軍是一八九五年的日軍，那麼日軍毫無勝利希望，甚至日本打敗俄羅斯的強大兵力，也能被這時的中國軍擊滅的，在這極短的歷史中，中國軍確已有很快的發展，決不能估價太小。

中國遲於日本四年間才向近代國家走進。頹廢的腐敗的清朝，在一九一一年才完全覆滅。可是新中國並不會從清朝接受到任何具有軍事價值的兵力，在清朝將臨滅亡那幾年，清朝聘請日本將官來任教官，創辦二三處陸軍軍官學校，初期受訓練的學生，都是現在中國擔任軍事指揮的老將軍。那時日本的政策是建設「汎亞細亞帝國」，所以

灣背訓練中國青年軍人，當時受訓練的學生們，在今日幾乎完全和日本帝國軍隊戰爭，蔣介石便是其中一位。他在清朝的軍官學校中，從日本教官受着最初的軍事訓練，以後又在東京士官學校數年。（並非畢業）

清朝滅亡後的十年間，中國軍隊完全分裂在守封建的軍閥手里，軍閥們把軍隊並不視為國家所有，而視為應該對自己盡忠誠備用的，民團建設真正的國民軍隊，其基礎始創自一九二四年，孫逸仙在廣東創辦黃埔軍官學校為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青年軍人們，都在黃埔受着國民軍將校的訓練，黃埔出身的軍官們，在其後都是擊破半數以上的舊軍閥的主力。黃埔軍官學校最初的校長是蔣介石，顧問是一批蘇聯將校，其代表是普列謝爾，蘇聯教官是孫逸仙在莫斯科和蘇聯協議後聘請到中國來的。由他們才開始創出政治的信令——鼓吹國大革命理念的軍隊。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在南京成立反共產黨的中國中央政府，蔣介石繼黃埔學校之後，在南京創設了南京軍官學校。共產黨也對抗的在他們那小小的蘇聯共和國創設了紅軍軍官學校。這兩個軍官學校和其他地方的軍官學校，造就出許多在這次戰爭中指揮中國軍的士官人物。

德國的軍事之優秀，不僅影響到日本，中國也受到影響。蔣委員長最初聘請德國軍事顧問——鮑爾上校，其後又聘請不少人，到一九三七年，德國的軍事顧問，已達百人以上，在他們的薰陶下，造就出蔣介石軍閥里接近代的少壯軍官，南京軍官學校之外，又設立砲兵戰、戰車戰，化學戰等等的專門學校。從技術的具地來看，這種訓練確很優秀，可惜的是到戰爭爆發，還不足十年的歷史。

中國的常備軍擁有一百八十萬，但裝備與訓練各個不同，蔣介石的部下軍隊，在黃埔與南京軍官學校出身的軍官指揮下，受着德國士官訓練的僅為三十萬人，蔣介石以此三十萬人為中國軍的中心，稱之為中央軍。中央軍之外約有八十餘師的雜牌的地方軍隊，訓練與裝備完全不一致。此外，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閉着軍與政治意見，宣言獨立自治的白崇禧與李宗仁，也擁有一百三十萬人的廣西軍隊。比蔣介石的嫡系軍隊毫無遜色。最後，有西北的共產黨

，他們具有卓越的士氣與熟練的戰術訓練，只是他們的裝備比諸地方的雜牌軍還不足。其餘雜牌的地方中國軍隊雖在中央指揮之下，但不與中央同化，裝備上，有的是中等程度，有的極爲貧弱。訓練上，也各個不同。中國軍隊雖然都承認蔣介石是總司令官，但仍然極偏拗的保持着地方的孤立性格，許多的地方，在參謀之間缺乏協力的聯絡。

中國軍的裝備也有重，輕機關鎗，自動小鎗，砲與白砲。若以受德國士官訓練的蔣介石部下的師團和日本軍的師團部比較的話，則重。輕砲，榴彈砲是一比四，機關鎗是一對三的比例。中央軍的砲兵極爲貧弱，雜牌軍僅不過有輕榴彈砲，白砲。普通一師的中國軍，所有的機關鎗不過百架左右。（註）

（註：這是以前中國軍隊的裝備。）

裝備最優秀的是第一集團軍，有數台對戰車砲，其餘的集團軍連戰車砲都沒有。戰車不足五十輛，戰車兵的訓練頗爲不足。

中國軍軍需品的補充與設備，極爲微弱，例如全國的兵工廠一月僅能製造出二百架機關鎗，三千枝步鎗，因之，一切軍火必須由外國輸進。砲彈與炸彈的製造也不能滿足。只有白砲（迫擊砲）能製造很多，中國軍的師團里，大多數都能使用白砲，並且很熟練，効力也很不小，白砲彈與步鎗子彈的製造，在常備兵這一方面，漸漸能足以使用。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購入軍火毫無標準，在整理上，便發生極複雜的問題。自動步鎗，機關鎗，大砲，祇有各國製造的東西。因此，適宜於某一種軍火使用的彈丸，在另一種武器上便不能使用。往往由於缺乏彈藥供給，新鎗變成無用的廢物。飛機也是一樣。操縱員毫無系統的從這一架飛機移往另一種飛機里，又常常換了一批教官，讓另一批教官來教練。政府的高等官吏，每次到外國去，每回都買來一批新飛機，正像買新的婦女裙子似的，這里那

里，到處都貴。許多具有決定的飛機堆積如山，其中也有意大利製造的關人劣貨。結果戰爭一起，曾經持有千架飛機的中國空軍，漸漸只餘下一百五十餘架還能使用。最不利的是中國缺乏修理飛機工廠，有許多架飛機，由於修理與設備之缺乏，往往因爲一點微小毛病便不能操縱起飛。

由於缺乏中央軍械的組織，由於裝備貧弱，由於戰爭基地運用不足，由於技術劣弱，在軍需品的消耗上，需要徹底的節約。因此，中國軍的戰術，規定爲在可能範圍內，避免極爲消耗軍需品的對峙戰，陣地戰，由此可知中國軍不能守據着重要地點與重要戰線，展開精銳軍火戰爭去殲滅日軍了。但不能因此便輕視了中國軍的「戰爭財產」——財產就是無限的「人」是無限的自然「空間」。只是僅具有這兩者也並不能勝利的把握，中國必須在國家總動員完成後，才「壓倒敵軍的戰力」。

因此，中國之戰爭目的，在初期實際並不在於獲得軍事上的勝利，而是在於使敵軍爲得到勝利所發生的犧牲歸於無效。換言之，即所需要下記三項大膽的戰略：

- 1 保持着主力裝備，將敵軍引進內地，使戰爭成爲長期戰。
- 2 在主力戰線上，延遲戰鬥的機會，在敵軍的側面與後面，迅速地發揮運動戰、策略戰、游擊戰的戰鬥。
- 3 由於抗戰的政治與軍事組織之提高，在國民全體一致抗戰下，消除敵軍在占領地區內建設的經濟自給根據地。

「民衆總動員」——這是一句在中國宣傳戰爭的著作里沒有一部不曾提到的話句。這句話在實現前記的戰略上，是基本的，絕對所必需的。中國人口共爲四萬萬，可是由於十年前，對於農民大衆的組織，訓練，指導，毫未曾顧及到，所以自從發生戰爭以後，連百分之一也不能動用。反之，人口數目較中國寡少的日本，却動用全國人口於戰爭上，由此得到一個相反的結論是，在戰爭初期，日本占有「人數」的優勢。如果日本把占領的廣大領土，

而歷完全成功了的話，那麼中國戰爭的第二種財產——空間——也會一樣地歸爲日本所有。

在華北數省，日軍集中主力於都市，鐵道，鐵路線，鐵路地點，不積極向內地擴大駐屯部隊，因此擁有龐大人口的村鎮，往往沒有日軍的影子，日軍是想在規模極大的攻擊完成後，再來收拾村落里的抗戰力，中國軍便趁着這機會潛行在各「間隙」與「島」一樣的村鎮里，組織訓練，武裝起百萬以上的農村大眾，使其爲中國軍主力的一翼。而中國內地的各村鎮，成爲最後決戰日本運命的游擊戰，運動戰的故鄉了。

「實際上，中國抗戰的問題是這一點——怎樣能使中國完全採用一九三〇——一九三六年間的中國共產軍所採用戰鬥方法？」

一位中國軍事顧問曾經這樣說過，並且主張中國應該大膽的採用這種戰術——「凡有的地點，應該迅速的把革命人民軍編成和消耗較省的陣地防禦連接，富於運動性的攻擊戰術，在可能範圍應廣濶的採用。人民大眾與軍事組織之間，在可能範圍內也應廣濶的協力。」

可是中國軍最高司令官在戰爭不會達到艱難的後期時候，還不相信這種戰術。依然以毫無勝利希望的劣弱軍力，從事防衛地點的防禦戰。那是因爲遊擊戰是共產黨指揮下發展的戰術，在中央軍這一方面，仍然認爲那是一種不合理的戰術。

在上海三月間的血戰下，由於消耗了很大的富有訓練的兵士與軍需品，中國抗戰的組織，殆於開戰之初便完全被摧毀了。在戰略上固然是失算，在政治上，却是應該這樣幹的。因爲上海血戰的收獲，使國民的自信強固起來。同時中央政府也許希望在上海共同租界的門口繼續展開戰爭，能引起外國與日本發生糾葛，因而干涉日本。這也具有相當理由的。當時蔣委員長也許這樣期待着？！另一方面，藉着上海血戰，在三月以前把遷移困難的工廠與熟練工移遷到內地。在內地村鎮迅速地組織民衆，準備爲來日擔任東部防務重任的游擊部隊建設後方根據地。所以在三月

聞的上海血戰，損害雖大，却也有相當的代價吧。

可是實際上，像後文所說的，事實並不那樣簡單。

(三) 上海的血戰

上海！中國領面上的一塊政治的腫瘍。

——蕭·伯納

在九月底，我們搭來的船從一隊正向陸地砲擊的日本軍艦傍通過，航進黃浦江口了。在天空上飛翔着數隊日本飛機，他們把「死」帶到關北，江灣。

這使我感覺到非常奇怪。彷彿這樣情形的一齣「劇」，我曾經看見了過。的是在五年前吧，在這相同的地方，曾一演出相同的戰鬥。

毫無可疑，這次的戰鬥可以說是一九三二年的血戰的第二次的表演。可是一九三二年那一場血戰，和前年舉行的歐林比克大會一樣，都被人們忘却在腦後了。在一九三七年，上海的市民有三分之一，已經忘却一九三二年的血戰。數千次的戰鬥，完成一個戰爭，可這一戰戰爭和一個戰爭一樣，很容易便失却它的意義。

然而，這樣的血戰，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戲曲，連希特勒的電擊戰也不能媲美。不論世界上那一個地方，決沒有像上海這個都市，已經二次處在數百萬人參加的殺人比賽的比賽場的地位的。正像從中立地帶的巴黎，眺望賽諾河畔的烏爾丹血戰。又好像蓋特斯布爾開戰役，在哈爾列姆地方，受哈丹的殘餘軍隊袖手傍觀。

誰都知道上海分為兩個，一個是約在一世紀前，由中國軍去的數千蓋里的法租界與共同租界，一個是中國管理

的城內與閘北，江灣，南市，浦東一帶。在上海一共三百萬的人口中，歐羅巴人共三十六萬，美國人共四千人，三百萬市民中，約有三分之二，都住在外國租界地裏。

日軍占領了蘇州河以北，楊樹浦與虹口共同租界大部分被日軍占領，和一九三二年一樣，日軍以這一帶當作與中國軍血戰的軍事基地。蘇州河以南與夫被日軍占領的共同租界，法租界的殘餘地帶，完全由英吉利，法蘭西，意大利，美利堅各國軍隊警護。在黃浦江上，美國與其他各國的軍艦停泊在一部尚爲非交戰區域的黃浦灘之前，眺望着在數十碼下流的日本海軍在努力想把勇敢地守護陣地達三月之久的中國軍擊退。

戰鬥完全圍繞這一個小小國際之間，可是，大部分的人們仍然在傍觀着。

有時鎗彈掠過頭上，有時落到租界里殺傷了市民，日軍隔着共同租界放射高射砲，高射砲彈的彈片，也常常掉進租界里。有一次彈片打壞了美國旗艦奧加斯達號上的一個水兵，又有一次，不知是日軍或是中國地下的炸彈，打中了一個百貨商店，傷亡了六百餘人。在開戰之初，中國軍的飛機，曾經投了一彈，落到市街里，殺傷了二千多名市民，據我所知道的，那一回是由二顆炸彈所製造出的一紀錄的殺傷。可是，國際都市的大上海，大半的市民仍然過着那種變態的生活。雖然上海在現在已經變爲日本與中國戰鬥的舞台。

以戰爭通信員來說，一九三二年第一次的上海戰役，在通信員看來却是一個最好的素材，這一次上海血戰，更不用說了。也惟有上海這一個地方最便利於通信目的。只要得到許可證書，自己也武裝起來的話，那麼，在午間可以到中國軍後線去，前線所發生的一切變化，都能看得到，由中國軍後線通過共同租界，可以到日軍戰線去觀察了，如果想再徹底地話，也能趕上中日會見新聞記者團，得到兩軍公報發表的戰況情報。最寫意的是可以回到中立地帶，執筆自己的戰線通訊，向本國報社發出，毫無傷自己的良心（也許有的會傷了胃腸），然後安穩地去睡覺。並且這一次戰爭，是惟一地能作立體的通信的戰爭，在這一次戰爭里，有許多飛機在空中飛舞，我們不能

隨上去，然而，他們所作的事情，我們也徹底的把握着了。

在近代的戰爭中，沒有像在這一回的戰爭里，讓通信員與攝影師得到絕對自由的。只是日軍自從往中國內地攻擊後，日軍的後線限制了這樣的自由。華軍戰線仍然毫不加以限制，華軍不願刺激外國人的情感，他們忘却自己軍隊處在不利的地位，暴露了實況，多少有點難堪，另一方面，中國軍人總以為歐羅巴人與美利堅人是中國的同盟國（至於原因則不明），決不會想到其中是有第五列隊的活動的。

有一天，在華軍接見新聞記者團的席上，一位從北平來的瑞典通信員向上海市長俞鴻鈞：「聞北將陷，華軍新戰線在那兒？」俞市長就指着地圖告訴他說：

「我軍新戰線，由北豐公園起到鐵路西。」

「那麼，明天我坐到北豐公園的公共汽車，到戰線去看看。」這個瑞典人在計劃着。

人們都能在樓頂，眺望着日本的急降下轟炸機，把炸彈拋在地平線那邊的華軍壘壕。靜安寺路的巴克旅館，是最安全的地方，旅館里的客人們一邊喝着咖啡，一邊從樓上食堂的大玻璃窗遠望，由此能看到日軍射出的砲彈命中

的地方。

在上海的外國觀戰武官們即得到無比的好機會，他們既能視察兩軍戰線，又能從軍壘上的觀望席看到日本海軍砲擊華軍陣地。至於這次戰鬥的結果，在最初他們已瞭然，他們從這次戰鬥中，得到許多驚人的殺戮方法上的教訓，他們也有改變了軍事力量的評判，相信中國在最能得到勝利的。

日本之攻擊上海，畢竟戰略是否錯誤，——關於這問題也有許多議論。如果日軍的目的在華北一帶想得到迅速的勝利的話，那麼日軍的戰略確已錯誤，因為日軍攻擊上海，日軍的軍力就得分為二方面，只是擴大了戰鬥範圍，使自己補強，努力於其後的機動性遲鈍起來，反之，却使中國政治統一，抗戰的決意更徹底了。所從攻陷的一部份

來看，攻擊上海，確是日本戰略的基本的錯誤。不過，在上海與揚子江下游一帶，集中一部分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過程中，和外國資本聯絡，常常發生豹變的中國支配階級的動搖，投機，妥協份子，許是日本並不會使這一些、中國政治勢力中的一部分屈伏，所以對華門戰之初，想削弱這一類份子之對南京中央政府的支配力量，同時打破他們以華北為犧牲進行和日本妥協的政治的地盤。這也許是日軍攻擊上海的原因。

我以為日本可以暫時把自己的上流利益與資產讓列強去保護，從上海撤退——這一個方法較為良好，因為若是這樣，能夠誘起列強站在政治的防衛的地位去監視中國。日本可以等到日軍用整個的力量收拾了華北之後，再威嚇地表示將再進軍攻進揚子江下游，同時在內部與外部双方的援助之下，使南京政 不 不接受停戰交涉。這樣，日本使用最小的兵力便可以得到最大的效果。

可是日本却不會這樣作。在八月初旬，南京政府的中央軍開到上海附近之後，使日軍認為那是不能輕視的一種挑戰。原來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性格上，認為無論如何要削減在政治上必須保持的妥協地盤，於是日軍上陸增加共同租界的防衛，而華軍的援軍沿閘北一帶和日軍對峙起來，自然，衝突是不能避免的了。

在上海戰鬥的最初幾天，華軍以誰也不會預料到的勇敢與巧妙的軍事，雖然處在黃浦江停泊的日本軍艦所放射的砲火壓迫之下，却一步一步壓迫着日軍，使日軍後退到共同租界，又從共同租界逃到蘇州河畔，在這一星期里，日本處在將被完全殲滅的危險里。救援的日軍，不能擊 接連中立租界的華軍右翼，受到極大妨礙，不得不使日軍的援軍，沿揚子江與吳淞，瀏河，亘三十哩的一帶戰線的北方上陸。

華軍的防衛設備，僅不過才建設的，雖然日軍在十二艘軍艦與幾乎不曾受到挑戰的日本空軍援護之下，登陸的援軍却費了一星期功夫，其後經過二月，日軍在軍艦與砲兵隊的三重砲擊之下，才使華軍右翼從閘北退後，日軍總算突破華軍戰線了。

宿命的感覺——是歐美所缺乏的，也是中國軍人偉大的地方。有一天，日軍不斷地轟炸，在我幾乎以為是永劫，可是中國軍呢？他們對於轟炸，對於死，他們完全明白，也完全不放在心里。那天我是和美國大使館附一部海軍武官視察華軍戰線，步行在蘇州河南方的華軍後線時候的事情，我們看見華軍的迫擊砲大隊，在樹林遮蔽下，砲擊北部的日軍，突然間，一隊日機飛來轟炸，附近我們趕快跑到已經破壞不堪的一所民宅附近去隱蔽，還沒有把身子伏下，炸彈一齊落下來，就落在方才我們站着的地方，我們振作起勇氣又移換一個地方躲避，炸彈又投下來了，方才那個民宅被炸彈轟飛，我們一連遇到好幾次這樣轟炸。日軍是始終轟炸着沒有目標的一條直線——也就是我們的背後，大約轟炸之後，就要用機關鎗射我們了，當我們已經跑得無路可走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一條小河，於是我們越過河堤，躲在小河傍。另一隊日機飛來了，從我們頭上飛過去。我們爬到河堤，伸頭去看，那隊飛機在不遠的堆墓地投下幾棵炸彈，然後向西方飛去。我們覺到生命沒有危險了，我們又爬上來，那時候我看見一個少年步哨兵，年齡約在十六歲，他從樹林里的墓地後邊站起來，把頭上鐵兜扶正了，修理他那被炸彈片打壞了的步鎗，然後又站在自己哨戒的地方。我們走到他前面，他很歡迎我們，和他談起話來，他說在前天夜里，和十七個戰友一塊在壩壩里的時候，一棵炸彈落下來，十六個戰友都死亡，只他自己健在。這一回日機的轟炸，四周並無一個戰友，一個上官，然而這一個少年兵，他那種冷靜與沉穩的樣子，實在值得我們欽服。

到十一月上旬，華軍死傷者已超十五萬人，都是防禦戰線上英勇地犧牲者，中央軍的精銳中，有的師部只餘下約十分之一的人數，從上海撤退之後，華軍準備建設第二個障地——由距上海八十哩的揚子江起經蘇州到杭州，用混凝土修建的防禦線。可是，當援軍還不曾開到之前，日軍在抗州灣登陸，以疾風之勢進攻內地，一舉進襲華軍一翼背後的松江，閩行，結果中國防禦軍不得不於九月九日總退却。日軍在閩北揭起自誇勝利的輕氣。不料由此鬧出一個笑話來，這笑話打破了人們的陰鬱。原來路透社一位女性記者，在大門城頭看見這一個輕氣球飄浮煙塵

誤，她誤以爲日軍使用了新秘密武器，所以她很興奮，立即打電給英國本社，說日軍使用「浮空炸彈」……華軍的掩護後退的殿軍，固守法租界南的南市一帶，在南市血戰一日。這一個上海大戰的「劇」，便到終結時候。

南市固守的中國防禦軍英勇地奮戰情形，人人都能看得到。南市是法租界與中國街附近的地方，寬濶達五十呎的蘇州河，在當中形成很自然的分隔。我們登上一家中國房子的露台，眼望便是小河。和我們在一塊的外國人，有五六個人是攝影師，他們拍取的戰爭電影，據我想，大約是最完整地，真實地，高出菲萊特攝影器里所拍取的戰爭電影幾千萬倍吧。其後我雖不曾看見他們所拍的照片，但我想，美利堅的觀衆們能從反射鏡上看到上海血戰的。

在河的右邊，我們看見日軍往前走了幾呎便停止了，砲火充滿空中，日軍在退却的戰車後面，到處尋找遮掩的地方。很仔細地活動着。相反的那一邊中國軍的機關鎗隊，在徐家匯運河一個支流的河岸左邊，從泥灘土的兩邊四角，向正面噴射出機關鎗彈。運河之前一排房子裏滿是華軍的狙擊兵，不知從後邊的那里響起砲聲，砲彈從頭上掠過。運河里有幾艘船隻，突然機關鎗一齊向船隻射擊過來，船上滿是愉快地吃着飯的中國軍，這樣，他們不得不潛藏在防彈的布袋下。

轟炸機出現了，把那一排房炸毀，數架飛機用急降下轟炸方法去攻毀華軍的砲臺，用高達二百呎的高度去轟炸運河沿岸一帶，凡是運河一帶都遭受了日機的轟炸，我們站着的露台，被炸彈的爆發力量弄得搖曳起來，當我看見日軍步兵往運河前破壞的牆壁後聚集，想越過運河攻擊華軍，我又看見迫擊砲彈打中重安地方，戴着鐵兜的中國軍有好幾個匍匐着後退。火線南一帶燃燒着，攻擊的日軍施用煙幕了，煙幕漸漸把戰場一切都包圍了。不久，一排日軍在運河數碼前方，用他們架設的船橋，匍匐地渡過運河，中國軍開始後退了。

我們去買膠片，回來的時候，在地球場附近遇見倫敦太晤士報社通信員馬克爾姆·馬吉——這個人在其後，只

然乘美國軍艦巴納號，在南京上流的揚子江中，巴納號被日機轟沉，他把當時情形詳細報告給本國的報紙，一躍而成名。他說他還不曾吃飯，但終於被我們拉走了，同時又遇見一個名叫謝安斯·加爾遜的人，也和我們一塊回去看戰線的變化。德線已經往東方移動，我們走進法國經營的發電廠去，運河就在右邊的水塔的走廊下。倫敦的特雷克拉夫每日新聞的特派員貝比羅克·特因斯君離開我們往運河旁邊的民家去了。

這個水塔是徐家匯運河一帶最高的地方，下邊的發電所也高達百呎，站在發電所屋頂，能夠俯瞰全線的戰鬥。我們在屋頂上走，才走幾下的迴廊，突然間從運河那邊掃射過來機關鎗彈，那是日軍發射的，彈丸集中在發電所，幸虧右邊有混凝土的牆壁，我們都躲到壁下，鎗彈都打在我們頭上的水塔上，及至鎗聲稍息，我們便跑下來，跑進發電所里，發電所里的轉動式發電機，滿是被鎗彈打碎的玻璃片與漆片。十分鐘後，我們又出去了，這回我們走到塔下的牆壁旁邊的木棚後邊，由木棚這邊能夠看見運河的那一邊，也能够拍攝像片，同時，如果再受到掃射，在這里也可以隱避。

在我的腳下，發現了紅色的斑點。

「喂喂！」我招呼馬克與加爾遜君：「這是什麼？油漆呢？血呢？」我記得在幾分鐘前，這里並沒有油漆痕跡。正在我們弄不清楚的時候，外邊有人喊叫，我們從牆壁往外看，是華軍成群的越過鐵條網跑進徐家匯租界西部。華軍已經完全處在包圍下，除了往法租界退却之外，那只有任從黃浦江江岸逼進的日軍殺戮了。軍械都放棄在路上，步鎗，刀，小鎗，手榴彈，彈藥，防毒面罩，鐵兜……樣樣都有。這些軍人差不多都很年青，其中還有年齡在才能加入童子軍的少年。法國駐軍司令官到這里來了，親切地和他們說話，讚美他們那英雄的抗戰，並且告訴他們決不把他們送給日軍，讓他們完全放心。

加爾遜不知，那里去了，他很小心，調觀，才看見他往水塔上走。我又拍完幾張像片之後，追他去了。

當我才登上水塔，便碰見好幾個法國人，他們失落地往下走。其中有一個人受了鎗傷。我退下來，在地上望着螺旋式的階梯，又有一個受着傷，一步一蹶地往下走。在他的身後是一堆人，其中，有加爾遜在內，他拉着X的身體往下走。方才在走廊那邊我看見的紅色斑點，那並不是油漆，那是X因斯君的血，他已經死亡了。

「方才我看見水塔頂上，脚步聲很亂，我覺得很奇怪，便上去一看，X因斯君倒在血泊里，另有二個人受了傷，他們和另外幾個外國人都害怕得神經麻痺了，都伏在水塔上一動也不敢動。」加爾遜對我說。

X因斯是被鎗彈打穿了頭部與鼠蹊部，把他們趕進發電所里那一陣機關鎗的掃射，分明是對準了水塔上的人們射擊的。攻擊的目標太好了，塔上的人們別說是跑，就是動一動身子也不容易。水塔離地百呎左右，完全像一塊薄薄地前餅，那些在塔上的人們，只有坐以待斃，等待着鎗彈打中他們。

那天是十一月十一日，上海的攻防戰即將告終。X因斯君的衣襟上還飾着歐洲大戰休戰紀念日的紅色罌粟。

(四) 比神還偉大的力量

我相信一種比神還偉大的某一種刀，鼓舞着我們將兵。

——杉山大將

在火力不能優於敵軍的最初的陣地戰上，中國把許多豫備軍都送到第一線上，我以為這是中國軍戰術上最大的誤謬。如果不這樣而換一種戰術的話——把當時很自信的敵軍，在他們沒有增強兵力之前，吸引到中國內地，等到華軍完全集中的時候，利用上海西部的高地，施行側面急襲，這樣作的話，大約能得絕對的勝利吧。

德國軍專顧問曾經勸告華軍採用這種戰術。主張從蘇州沿杭州路線作主力陣地。如果採用這種戰術的話，總

不致於把豫備軍消耗殆盡，陷於完全放棄反擊與作戰的難境里。即使富有訓練的兵士軍需器材有一部分犧牲，總能保持作戰與反擊上的聯絡的。

在中國軍參謀部，否定了這個戰術，也是具有相當理由的。其理由之一，便是把中國軍的價值看得太高，由於和紅軍在陣地戰上得到若干的勝利，華軍的高級將領們，當時以為華軍也能把日軍那樣猛擊固定陣地的軍隊擊退。及至南京失陷，他們這樣的幻想才從根本上動搖了。在漢口還不會陷落前，使他們不得不變換政策，爲了使戰爭繼續的延長，他們採用了許多中國紅軍（現在已站在與國民黨相同的軍事地位的紅軍）的軍事，經濟，政治的原則與政策。

日本一經攻破華軍右翼，直撲南京，使華軍不能構建強大陣地，去收容由上海撤退的軍隊。華軍的輸送完全陷於混亂中，參謀部的任務也紊亂起來，一時竟致失却指揮軍隊的統一所在，若在這時，華軍能瞭解情勢的變化，把首都南京放棄，撤退到北部西部已經準備的後線的話，那麼華軍的損失也許不至於太大，可是連蔣介石也對南京的城壁，信任太深。「撤退首都」的命令，盡力地逼延着。

一切具有軍事以及經濟的價值的物質與工廠，本來都有充分的破壞時間與餘裕，可是一點也不會準備破壞工作。蔣介石把「焦土」政策完全委任給最具有天才的戰畧家——白崇禧將軍，然而他並不是蔣主席最接近的少壯派人物，他所提出的意見和德國軍事顧問所提出的意見一樣都被否認。因此軍隊在退出南京前，僅僅炸毀了交通部以外，兵工廠以及其他重要工廠，發電所，鐵路與車輛，渡船，政府醫院，官廳一切建設，輸送機關，南京軍官學校和許多彈藥等等，極完整無缺地都被日軍占領。日軍獲得非惟使傀儡軍隊充分裝備的器材，並且還獲得了經過三個月運搬，才能完全搬走那樣多的「戰利品」。

到南京陷落，戰爭已經經過五個月了。可是首都南京的內部，却不努力於組織民衆。雖然民衆也撤退了五十萬之

上的數目，可是民衆的激憤，並不是政府所計劃的，民衆根本就沒有協力於軍隊的組織，例如從相當長遠的路程退却的軍隊，有的憔悴，疲憊，飢餓，可是經過途中時候，沒有用水與飯去歡迎，慰問的歡迎委員會。雖然如此，中國軍的軍紀，大半都很嚴正。掠奪商民之類的事，只有自誇常勝軍的日軍才敢公開地幹。政府對於南京市民的處置，由於沒有任何一種組織，簡直無術可施，幾個外國人却代替中國政府在南京市內設備了「國際難民區」去收容蒙難市民。日軍在十二月十二日殺到南京，華軍與公務員還有一部分才退出城內，往揚子江北岸退却。情形極爲混亂，數百人在渡江中，被日機關鎗掃射着，有的死在船里，有的溺斃在揚子江中。還有好幾百人在下關的路上被捕。殺戮之慘，難於形容，死屍疊疊地堆積高達四呎，還有許多人被日軍拉去，使他們去歡迎「日軍占領」，藉此宣傳「秩序恢復」。

可是，死的幻滅在等待着他們。

日軍在南京的大殺戮，世界各國大多都能知道。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主持其事的代表者是德國商人蕭·H·D·拉培氏，其後希特勒曾贈與他拿其斯最高勳章）某一委員提示給我的計算，日軍僅在南軍殺戮的人數共達四萬八千名，其中大半都是婦女與兒童。

日軍由上海攻擊到南京，其間被日軍殺戮的平民達三十萬人，其數目簡直能趕得上華軍在戰線上的死傷者。

從十歲起到七十歲的婦女，完全被日軍強姦，難民往往會被酒醉的日軍殺死，婦女往往看見自己的嬰兒被日軍砍下腦袋，而且已被那個兇手強姦，有一位婦女說過，一個日軍用把哭着的嬰兒寤斃。然後在平靜里強姦了她。指揮日軍去作這樣無耻的行動的日軍將校們，他們的住所變成皇宮，每夜都和新捕虜來的婦女共床，至於在青天白日下性交，強姦不是奇怪的事情。五萬以上在南京的日軍，在一月間所幹的強姦，殺戮，掠奪等勾當，在世界各國，完全都不能趕得上。

一萬二千家商店與住宅所貯藏的物品與傢俬，都被掠奪去，然後再放起一把火，市民的動產，完全被掠奪光了。日軍將校們又搶去汽車，大車，洋車，那是爲了把掠奪的物品搬到上海。連外國的外交官也被日軍圍進，殺戮了使用的僕役。總之，日軍兵士們一意的狂爲，將校們自己也一樣，這也許是日軍將校們對於自己部下的行動，認爲是正常的——換言之，就是認爲被征服了的中國人，已經沒有享受特別待遇的權利了。這使我想起杉山大將所說：

「一種比神更爲偉大的力量，鼓舞了我們兵士。」

實際日軍司令官也加進這個掠奪陣營里，因此，就必須承認部下兵士們也都具有這種掠奪的權利。日本大使館對於日軍這樣的胡爲，簡直無力干涉。連向軍部去借汽車作爲大使個人使用，也被軍部拒絕，他不得不向國際救濟委員會去設法弄一輛汽車來。

「美國，英國，德國大使公館住宅與許多外國人所有的財產，以及市內的樓房，完全被日軍掠奪了，日軍掠奪的主要物品是一切車輛，食糧，衣物，金錢，絨氈，以及各種貴重物品……普通的商店，最初被奪去一部物品，後其餘的就被日軍用大汽車滿載而歸，並且常常在將校們的指示之下，日軍集團的去作着組織的大規模的掠奪。」

——一位外國人客觀的寫着這樣的話。

國際難民區的避難民，一共二十五萬人，他們雖然都是非戰鬥員，可是難民區也很危險。組織難民區的外國人都相信，以爲日軍會能顧慮到外國的輿論，尊重這一個安全地帶。事實，日軍司令官却正式的不承認這種組織。許多的中國人都相信，在萬能的星條旗，英國旗，法國旗，紅十字會旗下，能够安全，可是日軍却從難民區里拉出去數千名男女，到這時候，他們才知道處在難民區里是坐以待斃。

每天每天，日軍都到這區域里來，好色的日軍專門把女人拉走，也有的年青姑娘從美國與英人所經營的傳道學校里被日軍拉去，迫使她們去作日本軍人的娼妓，以後就沒有消息了。有一天我得到難民區里一位傳道師的來信，

我才知道有一件很奇妙的愛國行爲，就是中國人妓女自願往日本軍營里去。最初傳道問她們：

「你們有沒有願意爲拯救一些無辜的少女，把自己犧牲在日軍那里的？」

她們和普通一樣都非常輕視日軍，可是她們在相當思想之後，她們都願意去，她們都到日軍軍營里去了。毫無可疑，她們這樣愛國愛同族的犧牲精神，已經把她們所失却了的人格完全恢復了。她們爲別人，犧牲了自己，據我事後所知道的，她們並沒有死亡，但也沒有受到「勳章」。

數千以上的男人，也被日軍從難民區里拉出去，表面說他們作工，出去之後，却都傷亡在凍排陳列的機關鎗的掃射中，有時好幾個人被當作試驗刀鋒砍斷了腦袋，等到這一些方法都玩厭了的時候，就把犧牲者綁在一塊，把火油澆在頭上，然後放火活活地燒死。又有時命令他們走進壘壕里，叫他們裝着中國軍在壘壕里的樣子，然後日軍將官命令兵士們去攻擊，占領這個「敵陣」，這樣就把無武裝的「防衛軍」一齊殺死，也有重傷的人匍匐地爬到傳道醫院門前的，那是眼睛，耳朵，鼻子都被燒掉，腦袋也有一半破砍去，僅僅一息尚存的中國人。

美國人的財產——主要的是醫院，學校，宗教機關，常被日軍再三再四地闖進與掠奪。並且有一個美國人被日軍威迫把食物與住宅讓給被日軍燒失了家屋的難民，侮辱與毆打也常臨到外國人身上，美國領事蕭·亞利遜氏，他的日語很流利，有一回他並沒有說出什麼刺激於人的話，却被一個日本將校打了嘴巴。在揚子江溯江船里的江上，美國軍艦巴納號被日機轟沉，並用機關鎗掃射。美國商船有二艘，甲板上翻着很大而又明顯的美國旗，也被日機攻擊，船員數名死亡。在華北與華南的美國人的財產與合於法則的權益，都受到日軍的攻擊與干涉，抗議的書書提到美國國務院的好幾百件。可是，內地的美國人仍然把戰爭資源與材料賣給日本，從日本得到極大的利益。

由軍事行動產生的損失 和長期間在南京舉行「戰勝式」所產生的損失比較一下，相差極懸殊，按照國際救濟委員會計算（註）損失共達二億四千六百萬美金，但其中的損失由軍事行動所產生的還不足百分之二，其餘的損

失完全由於日軍掠奪與放火所損失的。一億四千三百萬美金以上的動產，都被日軍搶去。（南京中央政府的財產也被沒收了，但數目並不在內。）

（註：國際經濟委員會委員雷斯·S·C斯米斯博士著：「南京地區的戰火」中曾詳加記載，該書於一九三八年六月，在南京出版。）

日軍進攻的途中所經過的農村，也一樣受到極大的損失。國際救濟委員會在一九三八年詳加調查的結果，南京附近四縣，以前人口共為百八萬，現在却只剩下一半，房產與家畜、農具，以及貯藏的穀物，被毀滅的收穫、損失共達四千一百萬美金，並且這一帶的農村，五分之二都罹於兵火，十二萬三千匹水牛，牝牛，驢和馬，被屠殺或者搶去，六十六萬零一千個農具都被破壞。釋與耙以及水車，被毀壞燒毀的約有數千，農具上的金屬，被毀為屑鐵，然後送往日本。在救濟勞動階級的委員，曾經作過戶口調查，雖然材料並不完全，但大體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個農村里的男子與四千三百八十名婦女是被日軍殺死了，被殺戮的女性中，百分之八十三是在四十五歲以上的。這樣的損失都是代表的，如果其他各地的調查也都得到很詳細結果的話，那麼，其他被日軍占領的數百縣的損失，以此標準來計算，綜合的時候則農村所受到的損失之大，便可想像了。救濟委員會在調查這四縣時候，僅不過經過百日左右，還不曾徹底。

在嚴厲統制下的日本各報紙，按例地都刊載着「皇軍是從壓迫下拯救了中國人的救助者，因此，皇軍到處都被中國人熱烈的歡迎。」也刊載着日軍給中國少女菓物的像片，可是實際情形却又不然，連居住在中國的日本人都都詳細知道。上海的日本人中，就有一小部分認為這是一種很大的恥辱。例如我有一夜訪問一位日本朋友——爲了不使他們受到日軍的質問，暫時姑隱其名。

「是的，這一切都是實在。這些事實比現在已經發表的任何消息都更厲害。」

當我問他二、三件日軍殘虐的消息是否實在的時候，他率直地都承認了，他的眼眶里也含著淚珠，我相信他的悲憤並不是虛偽的。

東京的各大報社發行號外，宣傳「戰爭已經終結」的時候，許多冷靜的日本人却瞭解了由於日軍在南京的搶奪的結果，戰鬥將要更加無期地延長下去了。日軍在揚子江下游地帶的殺戮與搶奪，雖然這也許是日本的軍事勝利，然而這却不是日本政治的目的，在最初，日本是想使中國自動地發生內部的分裂，可是却由於日軍的殘虐，中國一切地方的對立都消失了，而日本那種想使中國資產階級與日本合作的美夢也因此完全碎裂。最重要的是，在這地域集中的——也是日本想和中央政府訂立和平條約所不可缺少的——掌握中國支那權利的經濟與政治的一切勢力，都被日軍的作戰弄得分散到內地去了。

這可以說是日本的天才了。可是由此日本在征服中國的戰略上却構成了主要的弱點，同時也暴露出日本政治上的愚昧與遲。

日軍攻陷南京後，軍部在事前進行的和平交涉失敗了的時候，日軍只有擴大了征服的範圍，擴大到全中國，除此之外，實在無術可施了。最初日本是想併吞華北，所進行的戰爭是「殖民地戰」，現在却發展，大擴到制霸中國大陸的互爭存亡的戰爭上，因此，最初日本陸軍的計劃——爲了獲得在華北與內蒙建設攻擊蘇聯側面的基地，而計劃的殖民地戰，不得不擴大了計劃，並且日本海軍的「南進」政策，也被牽引到準備未來與歐美各國海軍決戰與併吞歐洲各國在遠東的領土上了。

日本陸軍在南京，用數週時間去宣傳「中國抗戰精神已經被卓軍摧毀。」努力使自己去相信自己的宣傳。「南京入城式」之類的軍事示威與宣傳等等，經過數週還在繼續地扮演着。如果在這期間，日軍把軍隊轉移到追擊作戰的話，也許會能給中國軍以致命的打擊的。就在這一息之間，中國軍又重新組織起來，在西部也建設新陣地，在

內地新建的根據地，開始徵兵計劃與施行軍事訓練了。

五月以後，中國軍獲得了抗戰中最初的大勝——就是有名的台兒莊一役，使日軍自信心很深的不能的精神，遭受了完全的傾覆的一役，——到這時候，中國的士氣已經恢復，戰術也完全改善了。

(一) 殺人教育

唯一的指導日本的精神的是天道

——平沼男爵

像沙蒙，亞諾爾所說的：「在平和的社會里，也會產生和戰爭時候相彷彿的殘忍事情。」不論其爲那一種人類，在日常生活上總會有一部分是殘忍的，同時，不論那一種人類，當捲進戰爭漩渦里的時候，會立即恢復了人類的野蠻性格——這一類的事實，我們是不吝於承認的。可是，在世界上不論是那兒，決沒有像日本軍隊那樣有組織的暴露出人類的墮落狀態，森林里的野獸按例都是在不飢餓時候與不會受到攻擊的時候，是不隨便殺傷對方的。它們好像對於無必要的殺傷，也感到毫無意義似的，變態的性慾者也終於不能完全失却了人性，穿着制服的人類的一切舉動與行爲，全部都是訓練人類的社會的反映，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這個理由。

如果把盎格羅沙格遜族的兒童棄置在食人種族里，如果他不被食人種族所殺害，等到他長大的時候，他也許會變成吃人的人類。逆過來說，對於食人種族的兒童施以相當的教育的話，那他會和普通人類的一樣。我在過去曾經會見過一位值得尊敬的紳士，當他住在巴里島一位荷蘭人家中時候，這位荷蘭人家中雇有一位巴夫亞人種——食人種族的僕役，他是從小就被從密林里帶出來的，現在在鼻子上還掛着很大的輪圈，他會說流利的荷蘭語，馬來語，法國語，英語，並且他善於管理農園，他的飲食却是蔬菜。此外我曾在呂宋北部會見一位在幼小時候和生在「婆羅洲」的野蠻人一塊兒被人帶到美國去展覽，他被一位傳道師救助，並且施以教育，現在他却是一位醫生，他的父親是易勾羅特族中狩首最巧的人物，現在這個種族的青年戰士們尙且在秘密里搜集人頭，可是他現在却不幹

那種野蠻勾當，他却在文明的人種中行醫。

歐美，很不易於把握着日軍的真相，因為在日本人中，到現在還和易勾羅特人種一樣併存着等首種族，日本的軍隊雖然都已具有現代的醫術與戰爭科學的智識，可是還保存着日本等首時代的傳統，雖然多少和易勾羅特人種有點分別，但在日本社會上，這種事實確實存在着。日本人的心是生存在崇拜種族的神祇與迷信，禁忌，物質的神祇的封建世界裏，日本人的手却操縱着現代的機械，這二種世界的矛盾，漸漸增加起來，等到完全崩潰的時候，則日本一定能發生大地震一樣的動搖與混亂。

人們以為日本的封建制度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時候，完全廢棄了。實際廢棄的僅是封建制度某種程度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形態，日本的獨霸資本與軍國主義的發展，以及其他各種重要的制度與精神仍然存在，明治維新並不是日本的真正革命，而是一種歪曲的革命，實際就是祭政國家的復活，因為他們使藩閥勢力殘留在海陸軍內，並且保護土地貴族階級，獨裁的貴族階級，新金階級被他們獨占了支配新生階級的支配大權。

許多腐舊的封建儀式與迷信，被他們保留，復活，或者改變，這些東西在輸進日本的科學所發見的真理傍邊，極矛盾地存在着，現在日本政治遺教給民眾「天皇是神」，好幾百萬人爲了要證明這種事實，想把其他各種信仰另一種神的民族撲滅，貴族階級是神賞給他們的，一切警察，海陸軍人以及天皇所有的一切代言人，不論是生存或者死亡的，都是神所命令的，因此就必須對於神，抱着最大的恐懼與尊敬，並且「天皇的意思」是毫無誤錯的。

對於民眾，政府教給他們「日本的神，是優於基督，莫罕莫德，達爾文，牛頓，羅斯福的。」並且加以很像合於法則似的解說。這種說法在日本人每個家庭里，至少也都相信是實在的。特別是日本女性——日本女性是日本社會里最低賤的產物，女性的父母可以隨便把她當作商業品去賣買——很忠摯地信仰日本人在幼年時代，就教給他們，如果爲天皇去死，則死後便成國民的神——英雄，這種人便能和過去時代的武神一樣供奉到神社里，現在の日

軍人都非常信仰這種迷信。這正像巴布亞人種，以吃人爲最大的光榮，以吃人便能得到第一等吃人種族的尊重與待遇。

日軍的精神訓練，和藩閥時代的藩閥所實踐的一樣，都立脚在封建的武士道規範內，教給他們嚴峻的忠誠與自我犧牲，而在同僚之間，又教給他們騎士道精神，假如日軍的騎士精神能和機關鎗聯合在一塊的話，那麼，日本軍人便沒有匹敵的了。即以今日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來說。除了瘋狂地殺人之外，就再沒有什麼了，在一百年前，只要是藩閥的部下，不論發生怎樣地衝突，便可以隨便砍掉民衆的腦袋，藉此試驗刀的鋒銳與否，如果在一擊之下，不能成功，那就非常難看了，現在的日軍在中國是玩着一樣的把戲，不論是那一種行爲，只要能把握到日本正確的傳統的根據，就能充分地瞭解。

和崇拜神祇一樣，他們崇拜戰爭上的野蠻行爲，例如小學校的學生們也都確信「帝國軍隊，所向無敵」——在教科書里有這樣一段插話，曝露出日本武士的殘忍，就是當豐臣秀吉征伐朝鮮的時候，軍隊照例地爲了誇揚勝利，拿回來三萬多個用鹽鹹着的朝鮮人的耳朵與鼻子（註）以此去「善導」京都（常時日本首都）民衆的思想——日本以爲恐怖流血是一種卑怯行爲，連兒童也都希望去表現自己的勇敢，所以在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時候，在日本軍隊與警察指揮之下，虐殺了約六〇〇〇各住在日本的朝鮮人，而擔任這種殺人與拷問工作的，是日本的十歲左右的少年們。

（註：湯姆·B·斯耶拉著「日本向世界挑戰」一書中，曾詳細記載，本書係一九三八年紐約出版。）

駐華美國大使內爾遜，蕭遜氏曾對我說過：「使我吃驚地並不是殘忍的行爲。（他承認一切軍隊都常常如此）而是養成那種毫無形響軍紀的殘忍的習性」。如果解釋這句話，就是，變態性是日本軍人的一部分軍紀，日本將校們對於新加補充的兵士，如果這些補充兵不幹出一點什麼殘忍地暴虐的行爲的話，那他們便不會滿意。在一九三一

年上海第一次戰役中，某一方的上海通經員曾經報告過這種消息：若干日本將校在江灣賽馬場，把一羣混含着婦女與兒童的中國人排成一排，然後向新補充來的兵士們下令去斬殺。由此可以證明我說的這些話都具有真實性。若是日本兵士斬殺不得法，那麼爲了使他能斬殺自如，爲了消滅他的小膽，就命令新兵再三地這樣幹，有許多外國人，在一九三七年，曾經親自看見在許多不同的地方，日軍將校們再三命令新兵們「演習」這種斬殺。

強姦婦女，也是日軍上級將官們獎勵的，在日本，女性是一種動產，數百萬日本處女，其代價有如市場上重量相等的牛肉那樣的貴，被賣給有錢的地主與商人，在他們認爲這是合於理法的，可以說這是日本強姦女性的一種形態。日本的禁慾主義者認爲禁慾是舉世所公認的一種美德，但他們不以爲通姦是冒瀆道德的事情，只有貧乏的農民，由於經濟上的障礙，他們不能這樣辦得到。

將官們不斷的煽惑着新召集入營的農氏子弟，說戰爭不只需要勇氣，並且是男兒發揮自己而目的手段。日本女性爲了順應男性的要求就必須犧牲自己的貞操，那麼自然對中國婦女是毫無所體諒的了。在日本，女性等於商品，買賣婦女是日本最大的一種產業，一九三一年日本在遠東創造「天國」（註）時候，政府曾經發過，日本的醫院每天有百二萬三千九百十四名公娼在治療中，（註）日本軍部對於這種虐待女性的事實，毫不關心，只努力向世界宣傳張學良在東北的罪惡，到一九三七年，僅東京市內一處，許可公認的妓館達五千六百三十家，數目之多，實足駭人，實在由於農村的破產達於極端所致。

（註：指爲滿洲國）

（註：日滿年鑑一九三八年版所載）

日軍不費分文奪去中國人的商品與產業，對於中國婦女，當然不能例外，強姦婦女之類的事情，和停止搶奪的理由一樣，在中國占領區變爲日本的獨占資本，由於要產生利潤，需要重新建設財產價值的時候，才能停止這一類

的殘忍行爲。

如果更徹底地研究日本的殘忍行爲與侵略戰的理由的話，那麼便又能發現是由於日本存在一種使日本人不斷煩惱着的一種劣等意識作用。

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於歷史的根據太深，這和拿其德意志的意識作用相似。同時，存在着一種以爲日本人是神，朝鮮人與中國人是應附屬於天皇治下，不論在個人與知的方面都劣於日本的潛在意識，日本人在追求着永久的存在，所以日軍對於非武裝的農氏，用鎗刺去刺殺，以爲這是一種使自己滿足的行爲。日本國內的日本人，是住在壓迫日本人的特務警察與站在自己以上階級的恐怖世界里，在中國內日電是住在將官與處在日軍威力下的敵國民族的恐怖里，爲了使自己精神一時寧靜，和消滅這種恐怖，所以他們常常來這一套殘忍地威嚇行動。

最後應該說明的是日本人，在心理這一方面，是極神經質的、焦燥的民族，自從明治維新以來，社會發生的矛盾現象尖銳起來，因此日本人常常處在緊張與重壓地情緒里，社會雖然發展到工業社會，封建的信仰遺殘留在行爲里，這使日本人的知性與肉體的自由不得不犧牲在這種封建地位信仰里，自然因此使日本人的心理，負擔過重了，只把住在中國的日本人的行動和住在日本國內的日本人生活外表——親切，美，穩重，以及富有引力的謙遜——比較一下，就會理解了，到一九三七年，這種重壓更爲加重，日本人感到四周都處在極稠密地壓迫情感里，即或沒有團體的支援，日本人是不能以個人的力去衝破這種情感，但一經幹出衝破這種情感地行爲時候，常常就會發生使人驚異地結果來。

日本人在暴動時候，比什麼都厲害，我曾在上海看見過一個日本流氓，把一位中國婦人的小腹踢傷，這位婦女雖然並沒有刺激了他。某一位外國報社的記者，曾告訴過和這相仿的一件事，一位英國巡警爲了英保護一位和一群日本人發生衝突，中國甲子，不料日本流氓即攻擊了他，一個日本人突然地面跳起來，直捕這位英國巡警的背後

，用牙使力的咬着巡警的背頸，其餘那些日本人大加喝采地囁叫起來。

除了日常生活的嚴重與個人的責任感強烈之外，加上農民出身的兵士們的偉大的愚昧（在國內，除了軍部宣傳的書籍之外，根本就不會再讀過什麼書籍。）再加上崇拜野蠻的信仰——由這里便瞭解了中國的「日禍」——倭患）是怎樣造成的了。如果美國人或法國人，也有這種信仰與環境的話，那也會產生出「美患」與「法患」來。

可是日本的支配階級，却不知道這種被壓迫的情感，一經像暴雨狂風反擊到自己這邊來的時候，那種破壞力之大，是怎樣使他們不能消受的。如果日本軍人對於權威——皇軍無敵的權威，失却了恐怖信仰的時候，那麼，日本一定會產生出世界有史以來最流血也最野蠻的內亂來的。日本將官們一經失却了約束部下兵士的權威的時候，那只有用「切腹」的形式自殺而已。若是日本的海陸軍一經吃了大敗仗，那麼，「皇軍無敵」的神話以及他們的支配階級與一切「神聖」的傳說，就得完全消滅下去。

我會和日本的急進主義者與革命家，以及二三個自由主義的貴族政治主義者，談論過這件事，他們也都承認這是實在的事實。我曾曾見過其中幾個很優秀的人物。以我的經驗來說，理解了日本的一切時候，雖然我們不能不惋惜日本的終幕，可是我對於日本人，仍然有一種愛情的情感，在本書里，我介紹二位異端而日本人——鹿地君與池田女士，他們相信清算的日期是比普通人們預想的日期更為迫近。

(二) 朋 友

日本已覺悟到必須決心捕滅蔣介石背後存在的共產黨的勢力

日本常常向世界各國闡揚：「日本在中國進行的「聖戰」，其目的在於確立中日友好關係。」我有時也感到這雖然是日本人的特別說法，可是也相當地認真。只是日本人只能唯唯承受欺騙自己與顛倒黑的說法，這一點我們不能理解出來。

我曾會見過哈利·E·雅魯提督，當時他是美國亞細亞艦隊司令官，他用極謙遜地說法，說日本人是有一種特別心計的，他在前幾天曾經訪問過華南日本軍總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

「松井大將好像是很善良的紳士，所以我問他「你平日喜歡作什麼消遣呢？」我知道他是由預備回到現役的人覺到他如里繪畫，種菊，或者訓練傳信鴿，那他一定很幸福，可是，你猜，他怎樣回答的呢？他昂然的挺起他那威嚴的五尺的身軀，立刻就說：「提督，我的消遣是促使日華真正地友好關係，已經很多年了。」雅魯提督說。

日本却在強姦，殺戮着他們的熱情的兄弟——我在前章里所舉的日軍殘忍行爲，那只是二三個實例，若以日軍在占領的中國土地內使幾百萬中國民衆的生活完全毀滅的情形來說，那只不過是細微地殘忍而已，當我拿着望遠鏡從上海市內大屋的屋子里向外眺望的時候，我確實瞭解了松井大將那種很怪的說法的實際了。

用望遠鏡眺望着上海北部，南部，與越過黃浦江的東部，不論是那一方面，這一個亞細亞洲最大的商港，只剩下殘骸了。在幾月以前，這里有二百萬人以上的人們在生活着，工作着，現在，在虹口，南市，浦東以及其他各區域，都完全處在廢墟里，只一部分法租界與共同租界——只有在這區域里，還有行人——還是原先完整的樣子，在這個外國人支配的「沙漠里的綠園」——上海的四周，那由人工造成的沙漠，不斷地在擴大着。

日軍在揚子江下游一帶，確已實踐了日本「傳統海賊」的破壞精神，在過去時代，日本的海賊曾經再三地在中國沿岸登陸，肆行掠奪與破壞。這一次也一樣，只是這一次是極有組織的，簡直是世界有史以來，第一次發現的具有商業組織的海賊掠奪。雖然時代是現代了，這一次却仍然是日本海賊的傳統的掠奪。同時却產生了一個奇妙的悲

動：這就是軍國主義的日本給予中國的荒廢與苦痛，激起了中國的反擊。

歐羅巴的帝國主義國家，雖然也曾侵進世界的邊疆——例如亞非利加，但同時也把這些地帶所不知道的新科學與技術以及社會的思想帶給他們，這是列強各國的文化征服力，可是帝國主義日本，什麼也不會帶到中國，若干方面，彷彿和西班牙一樣，不過，就是西班牙也很少破壞，常把文化輸進去，日本是半開化的民族，日本却想把自己進步的民族變為殖民，所以日本的軍國主義，連自己都不能創造一個新的國境，只是把自己幽閉在古老的國境里。

日本軍國主義，至今尚殘留着中世制度與比中國封建制度更為黑暗的封建制度，這一種軍國主義是比中國一切社會勢力更為遲於進步的日本社會一切勢力的代表。惟有把中國民族天賦的創造與發展完全滅絕，他們的使命才能成功，才能「增進日華的友好關係。」因之，他們就必須使用暴力，把中國的活動力——象徵中國最進步與最高希望的活動力——完全摧毀，如果不這樣而換一點方法，承認中國經濟，政治與社會運動進步的獨立權限的話，則日本不能征服中國，日本存在的半封建支配階級的生命，也要完全滅亡。

日本軍閥只能把使人墮落的麻醉劑，奴隸制度，榨取，死亡之類東西帶到中國，在資本這一方面，日本連使國內工業發展的資本都不足，日本並不會把資本帶到大陸，而只是從大陸去掠奪資本與勞動，在原料這方面，日本極為缺乏，毫無輸卅餘裕，製造品這一方面，則日本只能生產中國已經生產的與能够生產的製品，在科學與技術這一方面，日本只能承繼外國的發明，自己毫無發明能力，中國對於這一類智識，不希望從日本而希望由知識產生的本源地——歐美，直接吸收。在文化這一方面，許多地方，日本都是模倣中國與歐美的。

支那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一種嫉妬與一種極大的慾望，換言之，即為日本支那階級，希望把中國的一切抵抗完全破壞，能獲得中國所有的資源與勞動力。這種妄念便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原因，能充分瞭解到這一點，就能明白日本

是怎樣想和中國結爲兄弟之邦的意義了。

日軍的搶奪，分爲二個階段，二個時期，第一階段是掠奪現實的財產與戰場上得到的戰利品時期，其次是貨幣，貴金屬，運輸機關，家畜，政府財產，私有財產——搶奪者能夠簡單地便搶奪到手裏，並且能搬運走的掠奪時期，戰線移到中國西部的時候，後方的日軍却忙於把這些名實相符的搶奪品從上海運回國內，殘餘下的中國人的住宅，商店，倉庫，工場，以及家產。商品，日用品，不久也完全掠奪過去。

在日本眼裏，認爲上海一切都是中國抗日的象徵，因爲上海是中國製造事業，金融事業，運輸與貿易的中心地，中國的工業，四分之三都集中在上海與上海四周，外國貿易，約百分之六十都由黃浦江附近輸出或輸入，三百五十萬人口都住在大上海里，經過三個月間的砲擊與轟炸，其損害實在慘烈無比。

日軍搶奪的第二階，是日本宣傳家所倡說的「再建」，這比第一階段的搶奪更爲徹底。「再建」並不賠償搶奪的損失，却是使搶奪更爲亘久的一種組織方法。中國工業現在在「日華經濟提携」的口頭禪下，完全被軍部與獨占的資本家吸收過去，不會避難到外國租界里的中國富人，所有的財產，間接地都被沒收，也有直接地就霸占，其後，除了一部分在日軍威令下的中國上層智識階級之外——因爲日本認爲他們日軍不能缺乏的一種傀儡，其餘的都完全一落千丈地被日軍迫落到貧乏的大衆層里去。

中國所有的資源——勞動力，生產的機械，器具，天然資源，原料，公益事業……全部都變爲日本人所有，被日本人所用的東西。在日本軍部支持的日本的全體主義的帝國主義，和在「滿洲國」運用的手段一樣，上至工業所有權，農民課稅權，下迄及麻醉劑，賭博等等，這許多種類的企業，專賣，「暴利」事業，完全把這些都操縱在軍部的「特殊會社」手裏，這種組織極爲徹底，民衆所有的最後一個銅板，也都會被榨取過去。

這種組織的本質很單純，解釋起來是：日本使中國爲日本帝國——值爲日本帝國去工作，占領扣留中國全土與

民衆，以此去要求「禮還」的費用。這種目的如果完全成功，那麼，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才能實現。實則出於日本意料之外，中國却用炸彈與抗戰贈給日本，自然日本常常會「憤慨」起來。

日軍的戰略計劃含有三個目的，即爲破壞，占領中國工業中心地，獨霸中國沿海的貿易經濟。第一個目的純粹是軍事的，藉着軍力，使敵國——中國經濟，特別是工業經濟完全不能活動，換言之，此即爲在戰爭勝利的「正當」目的，第二個目的是爲了將來要得到賠償，把這一切都把握在自己手里，當作抵押品。在全體的戰爭上，敗北者非惟敗北而已，還得賠償戰勝國數倍以上所消耗的費用。第三個目的是政治的，在超國家團體的日本軍部手里，不僅要把握着支配中國民衆生活的獨裁權，並且還要把握着支配日本民衆的獨裁權，使這一個能把白種人從亞細亞大陸驅逐出去的强大的大陸基地有所保障。

這種企圖，在戰爭經過二年後，便開始互相矛盾起來。由於日軍不會詳細對於時間與空間的加以豫測，這種戰略的企圖便受到限制了。日軍知道若是一個民族隸屬在自己威力下，是必須破壞這個民族的購買力，日軍也知道只要一個民族具有相當軍火與抗戰的意志，便不能使這個民族，在遭受了極大的侮辱與殺戮之後，向這一方面拿出賠償。像荒木，松井，土肥原，板垣這一些人，他們很明白總力戰——連德國教授書上也沒有的總力戰的許多知識，也很明白財政，貨幣，信用，貿易，生產與消費的微妙關係。關於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類事實，容待於後文再爲解說。（註）

（註：請參看第十章第二節。）

總而言之，日軍向這個占地球四分之一以上的國家，帶來極大的損失，窮乏，死，這在中國人與外國商人以及列強各國（他們的損失也很重大。）之間，並不需感到驚惶，因爲這幾年來，日本在東北四省與華北進行的搶奪與擄取，已經使他們相信將來有一天會臨到自己身上的。許多中國資產階級，對於自己與祖先始創的貿易以及建設的

權益要發生怎樣的變化，都茫然不知所措。

他們也有的以爲當日本按照預定計劃處理中國之際，會需要他們協助的，他們更以爲日本的將軍們果實在希望「改善和外國人貿易的條件。」

凡是我曾會見過的歐美兩方的實業家，有許多人也這樣地想，這使我注意起來，和他們談論起來使我懷疑起他們是否是在盲目的世界裏活動着，幾月以後，當我到漢口去的時候，我完全確信那是事實了。有一天，一位朋友請我去講演——講題是關於日軍占領上海後對於外國權益的影響，在這里實業家們舉辦的午餐俱樂部席上，我覺得不能拒絕，雖然我極不喜歡講演，這次我接收這要求了。

在開講前，大家都在說笑話，有一位說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牧師看見一個醉鬼，牧師便責備他：

「你不知道酒是你的敵人麼？」

醉鬼回答道：「牧師先生，不是你教給我們應該愛你的仇敵麼？」

聽了這話，大家都笑了。現在日機每天都來轟炸漢口，死傷狼籍，在數哩外，日本海軍戰艦浮在江中，這與這個笑話多麼富有含義呢？不過我以為這笑話確會使疲憊的聽衆，神經爲之一換。

我講論着日本要破壞中國的計劃與必要，以及企圖獨占中國全部的資源與貿易。也說出由我哈爾濱到上海目所見及的日本經濟的發展足跡，並舉出許多事例與數字。

我的話才說完，隣席的一位——他是主辦這個午餐會里的人員之一——問我：

「日軍如果占領漢口以後，漢口市的外國人各種商業將怎樣呢？」他吐露他的意見。

他在揚子江一帶，經營植物油，雞卵商業——毫無可疑，現在這種商業都被日軍獨霸了。——已經二十多年。非常繁榮。是一位歐羅巴人。同時，他曾親自看見一九二七年「紅色的漢口」時代的一切，也看見中央恢復了漢口。

的情形。他以為中國除了「赤魔」之外，沒有第二個「魔物」存在。那時他確信「日本要掃除共產黨的勢力」，他和近衛公爵的意見也一樣，認為蔣介石是波爾什維基，他期待中國復活到國民黨以前的局面，在日本維持治安之下，外國實業家們可以自由地經營自己的貿易。

我對於他的意見，實在覺得吃驚，他以極大的自信說出他的意見，對於我所說的話，很明顯他是毫不相信。

「日軍攻到漢口，漢口商業一吐會很繁昌起來的，中國人一時也許很受損失，但不久就會好了起來。外國人的商業，當然會更繁榮了，日軍會解放揚子江和我們交易，但最主要的是恢復市內秩序，總之，日軍會使赤魔感到壽終正寢的。」他說。

這樣一位善良的外國商人，誠如他所預期的，日軍攻進漢口之後，他受到很相當的待遇，——這是說，日軍把由上海到漢口揚子江流域的外國人商業完全封鎖起來。我相信他現在還受着日軍的優待，雖然他連一個雞蛋，一粒植物油都不能自由地得到。——這兩種東西都被日軍獨占經營了。

曾看見許多外國資本家與商人，在戰爭的進展里，他們始終都被這種誤謬的看法所支配着，他們也知道日軍爲了破壞外國人的權益，在戰爭的進展過程中，是需要外國供給日本以火油，銑鉄，鋼鉄以及其他各種原料與商品的，這樣，他們就很容易被在很短的時日里得到極大的利益——自然這一些人最爲反對「禁輸」命令。例如英國最大公司——加迭因，馬加遜公司，由於占領南京的日軍向他們訂購巨額的鋼軌與建設材料，雖然中國的英國權益，被日軍破壞得更爲厲害，他們却非常樂觀，這種紳士們——雖然也有少數的人是例外，他們知道由前月的損益計算不能測量出下月的情形如何，因爲這其間，常發生意料以外的事情，我對於他們的判斷完全不能相信，但這並不是他們個人的責任，因爲他們被複雜的社會——處處領導人們往不幸的，殘酷的方向走去的複雜的社會所誤。

(三) 孤島上海

人民的政治組織與教育，毫未見及進步，這樣的缺陷在戰爭的進展中，更爲明顯了。

——民黨綱領。一九三七年

由於日本占領了上海與揚子江下游，中國所謂「現代」的工業，約七〇%陷於停頓，僅以上海而言，五千五百二十五處大小不同的工場與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一處家庭工場（註）完全被日軍毀壞與沒收。在廣東漢口失陷以前，日本已經把中國的發電所奪去約七〇%，現存的重工業，喪失了五〇%，中國的製紙業，橡皮工業，織物業，約九〇%都被破壞或沒收，其他方面的人造絲織物工場約三百家都不能工作，在上海五十四家人造絲織製工場中，被日本人占去五十家，中國重工業與輕工業，被日軍毀壞與掠奪的約八〇%。

（註：一九三九年，重慶中央政府經濟部發表。）

在戰前，帶着半殖民地性格的中國工業，毫無計劃地都集中在海岸與外國租界里以及租界四周。官營與半官營的工業也都建設在航行於黃浦江與揚子江的日本軍艦的射程內，對於專門家的忠告，完全不曾入耳。許多的軍需工業，都建設在虹口與楊樹浦——共同租界里日本「防衛區」一帶。這一帶如果發生什麼變化之際，就由日本陸戰隊警備。在國民黨的大官要人中，有幾位是大資本的投資家，一九三二年上海戰役，被日軍破壞的工場，完全由他們在原址重新建設起來，只是他們不曾想到會有第二次的上海血戰。其他很龐大的國內市場，有的被棄置不顧，有的資源尚未開發，實際來說中國的商人——買辦資本。是協助外國的帝國主義的，一方阻礙了中國工業的正當發展，以致形成爲日本以後進攻中國的殖民地經濟的根據地。

如果在戰爭之前，上海的中國工人能有具體的組織，或者受過準備未來的總動員的政治訓練的話，那麼中國工業便能得救，遷往內地去了，技術熟練的工人也會被吸收到中國戰線這一方面了，這樣，日本由租界內向中國進攻，就需要更大的代價了，可是像這樣的工人豫備組織，政府毫未顧及，反之，對於工人的組織與活動，政府竟感到恐怖——這種恐怖不弱於恐怖日本。

一九二七年，上海勞動階級組織的在六〇萬人以上，勞動協會占領了上海中法市街，左蔣介石不曾率領國民黨軍開到上海之前，就把張作霖的北方軍驅逐出去了。可是經過數週之後，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反共中央政府，勞動協會與民衆組織，完全被中央政府破壞壓下去。……（中間二十行，因某種關係，故省略——華譯者）：

勞動階級的人們，如果受到相當指導與組織的話，由七月七日起到上海陷落為止，在這期間內，一定能把鐵礦、碾磨器與器材、鐵軌等從上海搬往內地。因為上海的中國工場。大部份（雖然也有較大工場）都是輕性工業與機械，很容易搬往內地。這些機器在中國內地，在開發內地產業與培養抗戰基礎上，極為重要。因為內地缺乏生產手段與生產工具，如果把河川與運河的人夫與勞動者總動員的話，那麼揚子江下游四千萬農民里，有一部能組織起來，則這些貴重的器材與設備，都能安全地移往內地里去的。

日本在中國各大部市的投資，約三分之二（約十億圓）集中在上海，日本工場大部分都建設在虹口，楊樹浦租界區與毗連開北的租界外部，僅以日本人經營的紡織工場，就雇有約五萬以上的中國勞動階級，日本經營的工業，在事實上都是依靠中國勞動階級而活動的。這些勞動階級，如果有組織，受到訓練與武裝的話，則上海的日本工業基地，在七七事變一直到上海失陷的中間里，一定完全被破壞的，一方日本工場都被破壞，一方中國軍可以占領虹口與楊樹浦。

可是不幸的是，當中國軍被日軍從上海——日本侵略中國的經濟基地——壓退的時候，日本人經營的工場也遭健在，三十餘處日本的紡織工場，被破壞的僅不過兩處，受到最巨烈損失的，僅是租界內六個工場，這種損失，較諸日軍給上海的美國與英國投資（約十億美金）的損失尚為輕淺。（註）

（註：上海工部局報告書，第七卷二百二十號「工業狀況」一節中曾有詳載。）

在作戰計劃上，如果把勞動階級完全總動員的話，當然他們會向中央政府要求令讓一部政治的組織與若干的權力，關於這種事情，國民黨與委員長好像毫不讓步，當日軍未占領上海之前，有一部份中國產業家與資本家，由於想把工廠與技術工人移往內地，得到相當的約制，吳淞戰線的司令官楊虎將軍也曾制過這種企圖的人們。

共產黨員的組織與活動，很受國民黨的彈壓，及至日軍占領了上海之後，共產黨員才開始活動，而時間已經晚了，在上海華德路的監獄里，有許多政治犯被拘禁在這里，（由於日軍砲擊，有一部死在獄里）抗戰經過好幾個月了，照舊各方要求釋放他們，但僅據我所知道的，他們現在仍被拘禁在上海監獄里。

實際，在國民黨內部里，在上海是具有半殖民地的布爾喬亞性格的買辦利害關係的。因此，他們不破壞上海，他們始終半信半疑地亦相信外國的援助，他們不想把工廠移往內地或加以破壞。在抗戰最初二年間，中央最高司令部也很明白這樣的論理——「國軍爲了要長期抗戰，是必須把能够變爲日軍維持的根據地的一切完全予以破壞，只是黨與委員長由於負擔保護外國資本的義務，若是其他中國各都市被日軍占領，當然是日軍侵略中國土地的擴大與中國數萬同胞陷於死的運命里的象徵，然而政府却關心比這里重要的一保護外人財產」問題。

國民黨不能够擺脫日本帝國主義侵進中國心臟內部侵佔的路線。政府官吏對於被日軍佔占的神聖的外國在華的權益，只講使用空虛的言語去彌補，——當然，政府官吏自己也對此具有很大的利害關係。政府徹底地相信外國爲了防衛自己在中國的權利，會對日本軍反擊起來的，換言之，中國是想藉用外國去阻礙日軍進攻到內部各地。

在上海，我曾會見許多中央政府的官吏，其中只有一個——蔣委員長的内弟，中央銀行總裁宋子文，他明白中國喪失了這種生產都市之後，怎樣影響到中國的本身利害關係。

有一天，我問他：

「政府所有的一切經濟，都建設在上海內外，若是上海陷落了的話，那麼以後該怎樣呢？」

「你的意見以爲怎樣呢？我以為只有在內地組織新型的生產一條道，爲了這樣，我國國民全體是必須忍耐凡有的痛苦，也就由於除此之外只有危亡，所以我國國民一定能忍耐下去的。舉一例來參考，以前共產黨在江西省，條件非常不利，可是他們却以江西一省的力量，去和數百萬的中央軍血戰，終於打通了往西北去的道路，由此一例來說，中國全體國民，在唯一的目的下全體總動員的時候，我想那時什麼也就不成問題了。」他這樣說。

「是的，不過若是這樣，就等於中國產生一種很巨大的變革。」我說，我想到中國紅軍，激烈地抵抗中央軍，其基礎是建設在農民革命上：「那麼，中央政府能決心幹到那樣徹底的地步麼？」

宋子文苦笑着，躊躇起來說：「大約還不曾決定吧！不過，我們爲了抗戰，是必須把一切抗戰的力總動員的，這樣我們將要不擇手段的去幹。」

「上海就是很好的一個出發點，不幸却被占領了，如果上海民衆能有像江西省那樣的組織，那麼，許多的工業設備都能救移到內地去的。」

「政府的動員法既具有徵用工業與富的權力，若是民間的產業資本家不願自動的協力，那麼政府便可以強迫地接收他們的工場，組織民衆，向內地移動，在內地建設新的生產手段！」

「是的，是必須那樣作下去的。現在一切都在企劃中，唯有在上海，怕是來不及，其他各地還能很充分的辦得到，我們必須等待一些時候。」我的說法，他很贊成。

宋子文是中國第一位具有優秀的財政頭腦的人，他對於一切方面總動員的認識，極為充足，然而他並不是中央政府的閣僚，他自己具有獨到的思維，未必就和蔣介石一致。

上述各項原因：——中國完全喪失了最為進步的工業基地，上海的技術與熟練工人，完全離開中國抗戰的合作上，這是應該指摘出的中央政府的過失。中國軍司令部在撤退前後，那些不曾加以撤去與破壞的一切工業，運輸機關，完全被占領的日本軍利用了，不久，上海便變為日軍進攻揚子江上游的軍事基地。

在抗戰當初，中國受到這樣嚴重的損失與挫折，在其後怎樣完全克服了呢？關於這問題，容於後文里再為述及。只是在那時，有很多人，在上海大都市的灰燼里，在外國人地區與日軍占領區的「慈悲」下，被趕出的那些毫無組織的中國難民的混亂里，看出了中國的奇戰，已經到了「終幕」了。

(四) 「偉大的戰果」

日本的目的，只在於使中國大眾完全「繁榮」起來，之外，毫無目的。

——土肥原將軍

我曾有時彷徨在數十哩只幾餘下電線杆與煙筒的上海廢墟里，破斷的電線絲在廢墟里飄搖，下垂，許多的屍體在瓦礫堆里露出手足……一切都處在冬日之下死一樣的靜寂里。

對於閘北，虹口，我很仔細這兩處的地理，現在呢，那些可愛的境界標識，已經完全無蹤了，在這個廢墟之都里很容易迷失了應走的道路。

只有一個人，在這些壞碎的磚瓦里，建設里，機械里，還能分別方向，他是那時的上海工部局工場監督部長。

新塔爾人，名叫列都，亞雷。以前在我訪問上海的時候，和他一塊觀看過他所管轄的地區，我從那個地區里，得到了這個都市最完美的印象。現在我又帶亞雷君一塊來訪問這一所廣漠的民族工業的墓地來了，從這個已經變為廢墟的世界，我彷彿又看見以前那樣完整的工場仍然存在這裏。

我們看見許多悲慘已極的中國捕虜被日軍鎖着，被日軍牽引着，命令着，從廢墟里去採掘廢鐵，往往從損害較少的許多工場里，搬運出完整的機械設備，日軍把這些完全輸到日本，由陸軍特務機關賣給日本資本家們。

商店的東西，只要有，就完全被搶去，金屬之類的東西，不論是什麼，一定掠奪到最後一片，亞雷君家住在江灣，家中所有的東西，幾至掠奪得一掃而光。

當然，閘北一帶，還有很多工場完全存在，而共同租界里——虹口與揚樹浦一帶的中國人經營的大工場，大部分都未受到損失，只是這些工場早就被日軍占領，有的開始工作了，有的爲了蒐集廢鐵，將其破壞，日軍已經完全把蘇州河北部租界的支配權獲得到了。

這些破壞的機械，完全是已被搾取的勞工階級的血汗結晶，亞雷君說：「這些鐵才是真血，才是有組織的生命。」在他這種簡潔的批評之下，我覺到這些鐵是有呼吸的東西，也有血脈流通的東西。他又常常指着一些鐵片，說是「這是日本人還不會蒐集的沒有形的靈魂。」這時，我們彷彿看見爆發的炸彈破片又集合起來，炸毀了的工場又恢復了原狀。

「這是張其謙君的新式汽罐！」亞雷君說：「我命他把汽罐換爲新式的，還是不久以前的事，以前的汽罐實在危險可怕。請你想像一下一群可憐的工人們在危險的汽罐室里的危險情形。」

我們走到一堆破磚瓦與破壞的器具以及毀壞的車輛堆積的地方。

「這是楊新君的電氣機具工場。」亞雷君不會等到我問他，他就告訴說：「在幾月前，我告訴他應該使機械有

安全裝置，可是他到現在還不曾想裝置，雖然他們的工人，已經有兩個手指被機械斬斷了。

詳細是這樣——亞雷君知道這些數百萬破壞的工場一切歷史，也知道在這些工場活動的數千名工人的生史。他住在中國，比一切外國人都親切，對於一切都具有徹底的知識，他是租界的監督官吏，他的權力，比中國市政府大，虹口的中國工場才東們，對於他的存在，最初很為疑懼，不久，都被他的熱情所感化了，可是許多外國人工場主人，對於他改革工場企劃，都表示不滿，但他始終一貫自己的意志，為此救護了許多工人的生命。

因此，亞雷君詳盡明白上海的工業，並不是由美命，而是由互長期失却了的人類的努力，換算而建立的。在過去的數百萬餘的工作時間里，那些工人們是由粗乏的飲食中，把中國工業的富足建設起來的，然而現在，有的化為烟塵，有的變為日軍砲彈了。在這個廢墟里，亞雷君在過去十餘年里傾心貫注的亞細亞工業的進步與計劃，也完全到了終止點。

當我看見若干處流過工人們的最大的血汗的工場變為砂礫的時候，實在也不覺得能得到變態的榮譽的滿足。日本的工業是建設在日本婦女身上，上海的工業，是建設在少年工人身上——許多的工場主人，都是以買來的奴隸——年工人們的血淚成長了自己的工場的榮榮。

「這家毒氣工場。從孤兒院買來六十四個少年孤兒——在上海有幾家是私生兒經營的破爛工場，孤兒院與私生兒工場，全部都是奴隸勞動制度。這位姓楊的買來這些少年孤兒，都叫他們睡在機械上，不許他們出外一步，這些少年孤兒，每天工作十四小時，那某此少年孤兒身上榨取百分之百利益，他們的機械毫無安全裝置，我曾調查過，十六人少年孤兒的手指都被機械斬斷，只這一個工場，被機械斬斷手指的一同是三十八個人。」亞雷君和我步行的時候，對我說。

在戰爭中，這些少年們都被主人關閉在工場里，大多數是死亡，或者被日軍捕去變為日軍的少年奴隸。有一

天，好幾個少年徒弟憤慨地瘋起了——工場主人把徒弟們，（少年孤兒）閉鎖在閘北工場里，每天或隔一天來看看是否挨上砲彈，同時帶着一些食物來送給他的耆牲，這些徒弟們暴動起來，奪去了閘門的鎖匙，把主人押進甲面，少年們一闖而致——但可惜的只有這一件事實。

「如果消滅了這種制度，代之以另一種比較良善的制度的話，那倒也不壞，因為這種制度很易於消滅，日本的奴隸制度比這樣更為厲害，那才是純粹的奴隸普羅列塔利亞呢！」

普通的人們，大多都這樣的想，但這並不都是完全如此，某一個外國人——他的工場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他說：

「中國若能繼續保持現在的地位與制度，就很好了。」他相信這樣就能產生出「極壞的勞動力。」當然日本也一樣。

由於上海的血戰，勞動階級約有八十萬人被遺棄在街頭，在上海戰爭的幾個月里，約二百萬名中國人流浪在共同租界，法和租界里，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毫無財產，毫無出路，當上海血戰將告終幕之際，這些難民——男人，女人，兒童，在南市和法和租界的柵門外擁擠，彷彿。加基諾神父在這里設立了「中立區」，約三十萬不曾退出上海的中國難民，擁到這里暫求一時的安全。

我和亞雷君曾經看見，在安南與法國軍所堆積的砂袋的那一邊，許多的中國人羣，哀憐地乞求開門與水及糧食。中國救濟難民團體，有時也到法租界西方面來，把饑餓之類食物從柵欄往那邊的難民羣里拋去，有時中國少年團（在血戰中，有的犧牲了生命，協助中國軍）帶來水桶給他們飲水。在這些難民苦後的天空，早飄着極厚地烟塵，他們多半是絕望的，被烟塵活黑了面部，有的頭部與手足纏着繃帶，這情形，有如巴黎的民衆暴動。只是這里缺乏革命的情緒。而是一群逃亡，哀求人門救濟的非武裝，無組織，而又陷進戰火地獄里的羣衆。

上海戰爭的數月里，被戰火驅逐得流浪街頭的人們太多太多了，租界與難民區只能收容十萬左右的人們，可是難民總數在五十萬以上，他們汙浪在步道，街路，商店門口，窗台下，工場的廢墟里，枕着草束，用紙與破亂衣服當作被蓋。警察們對於這些流浪人羣毫不客氣地從街上往四方驅逐，一到夜間，他們又擁集在街上了，他們是想在豪華的店舖窗下得到溫暖與睡眠，街上不論是那里，只要有空地，到處都是這些羣衆的佇立，躺臥的悲慘風景。

我會實地的去觀察這樣的地方——這為我的報社羣訪一些材料。觀察的地方是小客棧，樓房，難民們在白天與夜間，是互相交替地睡覺，有的在階梯兩傍分爲二重，差不多都是女性，階梯與階梯之間的重道上，充滿了的都是人，想要通過就必須從人縫里擠着。院子里發着潮濕，刺骨的冷風在飄搖着，天氣特別寒冷，可是，房頂下也滿滿是人，一所三階——階的樓房，在平常只能收容四、五十個人，現在却擁擠着四五百人。

比較衛生一點的難民收容所，死亡者每天不下二百人左右，都是由於飢餓，罹患赤痢，虎列拉，發疽傷寒，普通傷寒而犧牲了的。我看見救世軍經營的規模較大難民收容所（一所學校，收容人數一萬七千名），每天搬運出六十個屍體，大多數都是女性。救世軍的工作很積極，只要能作得到的，就要作出來，他們創設了專門收容婦女的屋子，其他的收容所，臨產的婦女都住在大門口，走廊下，有的甚至在街道上生產嬰兒。

許多基督教徒，努力救濟他們，可是，許多的外國人對於這種光景，毫不動心，照舊地過着安適的生活，他們買東西，或者到公司里去，都是乘着汽車，他們只知道自己是有一切的事情，都有點誇張過度。「他們在俱樂部與「酒場」里一邊吃着上等大菜，一邊批評難民收容所對他們自己是一種脅迫。他們說：

「他們必須吃東西，那是一種習慣，他們大約不能再作什麼工作，但也算不了什麼呀。」

這些有階級的外國人，往往對於彷彿失於道路上的貓，犬，感一驚呼與憤慨。在中國民衆完全陷於飢饉里的富

裕上海里，上海發行的外國報紙，照舊還是刊登羅巴人讀者書信——曾經爲了培育金魚的方法問題，熱烈地爭論好幾天，一位讀者寫的信：他希望各家廠把殘飯備好，以賄餽飢餓的狗，又一個「老上海」的外國人，他乘車經過法租界，看見一匹崑崙口輪失却了主人的洋狗在街頭徘徊，他憤慨起來，他替這匹洋犬悲哀，爲此他徹夜不能安眠。他們對於飢饉的一兩匹洋犬特別關心（許多的洋狗，都由於在壟壘得到「肉」的滋養而肥胖起來。）可是他們對於數千萬陷於飢饉世界里的兒童——他們祇着貧乏的口輪，沒有住所飲食而又失却母親，和犬一樣徬徨在難境里，在這些外國人的眼里，並不覺得怎樣的不合情理。

對於這一切，我理解，我無須批判什麼，我只能報告出來。

大上海的「夜生活」又恢復了。蘇州河以南一帶，豪華的旅館，大飯店，酒場，寶淫窟等等，又特別繁興起來，在我的旅館附近，有三家豪華的跳舞場，停在門前的汽車竟延長到二條街。肥頭脹腦，穿着油緞的中國人，很安穩而又驕傲地被自家汽車運到所願去的地方，自然，這一類中國人不是在租界里發了「國難財」，便是他們的工場不會受到損失的廠主，或者乘機把地價，房租抬高二三倍，從他們的空倉庫里把難民驅逐到街頭上的地主們……一位愛國者曾經演說過，說是在這一帶拋下一個炸彈，把這一類人完全炸毀，爲了這原故，這一類人物一時曾經裹足不前，但經營這一類營業的經理們，很聰明地便雇用了保鏢，拿着手鎗，安置在附近一帶，更在街道上，配佈了外國巡捕，資產階級的中國人便又很安心地出入這一帶了。

我想起在華北戰線的某一位友人的來信，說——穿着棉衣的兵隊有的凍死，有的手指和步鎗，手榴彈凍結在一塊，有的由於沒有手套，把手凍掉下來，這使我非常地驚訝！這一般肥頭脹腦的傢伙，如果把這一夜間使用的舞票與小賞送給軍隊，那一定能把這些凍死的兵士們的手足與生命救助起來的，「上海」，是外國人支配的一個殖民地，它的特產，和香港一樣，都是現代世界最情慾的布爾喬亞。在這次中國的抗戰上，中國如果不想把一所在流氓

與保鏢的支配手裏的上海完全破壞，那麼，中國的抗戰是毫無意義的了。

在曾經戰鬥過的若干個地帶，數千以上的屍體還在曝露着，這使我感到憤慨了。比較起來，上海西部戰場空氣較為平靜，每回星期日，我和亞雷君便去訪問，在那里，我們看見兵士們向後方逃走，但由此，使我們相信在這創傷滿目的都市的另一方，是有一個安全地方之存在的。上海並不是中國的人們都能想到，使我們感到中華民族向另一方擴大的民族的力與地域的廣大，而每一個人都確實地相信着這一個神聖的「的沃土」還有甦生的希望。

租界西部——蘇州河南部一帶的田園，都被砲彈打翻了。日軍曾經亘一週間，向這一帶用集中的砲火射擊，所以這一帶的村莊，完全變為風景畫上的污點的存在了。那曾經被譽為富於異國情調的弧形的橋，現在已經變為炭化物了，在潰亂的兵士們的屍體羣里，還滲雜着最後守護自己的大地的青衣農夫的屍體。日軍還在搜集金錢與紀念品，被日軍徵用的中國人羣，到處都去發掘最後一片鐵屑——廚房器具，窗櫺，門上的拉手，鋤，車輪，釘子，螺絲之類的東西，雖然是小東西，也不輕易馬虎，大地上未曾炸裂的手榴彈，步鎗彈，砲彈都像各種在耕地里，這一些也一一地都被掘出來。還有到處被榴散彈打壞的鐵甲車，經過最近落下的豪雨，已經半埋在地里了，武裝的日軍嚴重地監視着中國人，命令他們從泥土里把它掘出來。

我曾經看見一個日本軍人，他從已經死亡的中國少年兵身上，偷出二張印着孫中山肖像的中國國幣。他很珍重地把這二張紙幣藏在木棉的軍衣兜里，並且按上別針。

「不過，偉大的日本戰友啊，你不要忘了在他的手邊，還有一張——雖然殘缺——他的愛人，——微笑的愛人的像片，你何妨拿起來看一看，他不會注意，也不會哭泣的。你可以用這二張紙幣去污辱他的愛人，你不必為他的

屍體祈求土壤。他的愛人的肉體已經和他的肉體之間，傾注了極爲濃厚的愛情，他只希望從他的成熟的肉體里去追求更爲清純的愛情。他只希望從死亡的污辱里把自己解放出來。你不要心軟，你不要那兩張——或一張紙幣還給他，那是他爲了救助你的母親，你的子女，他送給你的貧乏的報酬，你可以剝奪他的屍體，讓雨去淋打他，他一定會對你感謝的，你何妨使這一個可愛的屍體，在這一所美而無名的土地上，安穩穩地長眠！

大地到處都是急造的粗劣墓地，拳頭，手腕，腳，破碎的頭顱，到處都能看見。如果解剖學家看見這種光景，那他一定不能辨明砲火，反之，極爲高興地去從事他的研究工作。往上海輸送蔬菜的電車道上，許多的行人，毫不動心地從埋着屍體的堡壘走過去，不曾爆發的手榴彈散滿在農民走着的路邊。在傍邊的土地上，有一張兵士的胸幟，寫着「兵士，張修敏」的文字，只剩下這樣一塊露着胸臍的軍衣了，其餘的他的肉體，都已消化在田里的餓犬胃腸里了。

農民們背着米袋，裝着自己收穫的米穀到上海去販賣，有的野田里的砲彈忽然炸裂了，使他們喪失了生命，或者受到重創，有時在半路上被日軍捉着，把他們所有的錢完全掠去，一位老太婆耳上帶着的銀垂裝也被日軍強制地拉下去，以致使她的兩耳破裂，血流不止。及至走到租界境界，又必須交出一元美金的「輪出稅」。我們去問這些農民從那兒來，他們說從五六里附近的村莊里來的，其中也有爲了到上海來賣米，在途上受到很多地折騰和污辱，如過三天徒步才走來的。年青的男人與婦女很少，大多都是老年人與兒童們。一位老頭子帶着一位小姑娘和兩位男子，往另一條道上走去，他說他是回家，雖然他的家什麼都沒有了，而財產也都被掠殆盡。「還有地！還有泥土！這已經很可以的啦！」他愉快地說。

農民里，有的在戰場上躲在用蘆葦作的小篷里，守護着他們的土地，好像他們害怕他們的土地也要被人們偷走，有的躲避在屍體群中，照舊細心地去耕種這一個將變為廢墟的大地。

我和亞雷君曾經看見一家農民，焚着火圍集在以前是自己的房屋現在已變為廢墟的地方，他們用發紅的眼睛，靜靜地凝望着微弱地火影。——亞雷君拿出一些錢塞向他身旁的小姑娘手里，她接受了，問她是否駭怕？她搖着

說。「現在我們正在難過。可是不久，勝利還是我們的，敵人回去，快樂的日子會又來了。」她毫不思索的愉快的

(五) 一個外國人

勞動的人們是大地上的鹽，我們參加到他們的運命里，那是我們時代的具有價值的冒險。

——列·亞雷

我會見這位列·亞雷君是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地點是內蒙古。那是第一次的會見，決沒想到在這部作品里還能提到他，在上海還能遇見他。當時我只知道他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物而已。

只是我們兩個外國人，搭乘「特別救援列車」，往張家口以西被旱魃所苦的一帶——已經餓死三百萬人口的一帶去救助，視察。我們和另外一位中國政治家是搭乘在這一輛特別列車里，此外，這一系列車都是破舊的四等與無蓋貨車，在這輛車里，我忽然看見一個外國人，走出四等車，在門口那里呼吸新鮮空氣，我吃了一驚，於是我也走到那里，介紹我自己。——這個人便是列·亞雷。

昏暗並且飄着汗臭的人群里，他的姿態完全是一種不調合的存在。他那被日光灼熱的面部，襯着往後梳着的黃色的亂髮，身材雖算中等，只是他的手與足最沾着汗毛，他這種姿態，一如偉大的巨人腳踏在大地上毫不動搖的情形是一樣，但最使我注意的是他的頭部，他的頭部較大，並且顴骨好像是從石山切下來似的，剛硬無比。

我相着他在那窄小的四等車里，一定會感到苦悶的。我問他：「可否到我們車里來？」不料爲此引起那位中國政客的反對，這位政客以前受過英國人的侮辱。所以他對英國人有一種復讐的情感。但假如那時我能徹底理解亞雷君的爲人的話，那我一定會知道他坐在四等破車里，絲毫不會感到痛苦的，因爲四等車里有他的好伙伴，——中國乘客，那些伙伴較諸我們這輛特別列車里的乘客更會使他滿意。

「喂，喂！」他笑了：「你看這一帶的情景，好像我的故鄉新格蘭。」他的視線追逐着在廣漠的蒙古草原上展開的美麗風景。

這一件小事雖是象徵的，但他決不是一個由於受到一點侮辱，嘲弄，便大怒起來的人。對於那「在他眼里浮現的遙遠的地平線的印象」，他決不感到失望。他很易於接受廣漠的中國大地給予他的印象——並且已經接受很多。中國就是這樣，對於那些能够理解中國的外國人們，常常使他們的理感到充分的滿足。

我們在薩拉齊分別，我一個往異望蓋赤，到烈日蒸曬的災區視察，在這裡，我便看見餓死的人們了。我不過是一個美國報社的遠東記者來視察而已，那位英國人——西雷君，那時他供職於上海工部局，他把這一帶災區當作他的「安息日」，他向那些在夏天，被傷寒傳染的災民們，分配救濟糧穀，他看護那些瘦弱的災民子女，使他們恢復健康。

我是實地的視察了災區，回到北平，立刻把實況報告到本社，一位紐約的少年讀到這個報告，由美國直接郵給我一元美金，讓我把這錢送給將要餓斃的人們。只此一人而已。西雷君便不然了，他作了許多的事情，得到比我更

多的印象回到上海。——這是他具有人類與人生的目的，開始實踐時候的事情。第二次在上海相見的時候，他收容一位兩親由飢餓死亡了餘下的一位孤兒，他把這個孤兒起名叫阿蘭，使他進教會學校。

二年後，亞雷君由於協助揚子江堤防在大洪水後復原工程，他和上海工部局派派的蕭洛夫，希姆遜一塊去了。我也曾向本社詳細報告過好幾回，亞雷君還是亞雷君，不久，他又帶回飢餓的孤兒——阿蘭的弟弟，他把這個孤兒起名叫「米加爾」。在工部局里白種人職員里，認為亞雷君所做的事情，簡直是一種神話，他們連在夢也不會想到會和苦力似的孤兒共餐同寢。經過幾年以後，這一個農民的孤兒，長成爲很好的青年了，在中學校里，無論是功課，無論是運動，成績都高。同學一頭。以後進了上海聖約翰大學，阿蘭被選舉爲級長。這真是無名的農民孤兒與中國少年們的無上光榮。

亞雷君那種炯銳的兩眼，紅色的頭髮，應似的英國人特有的鼻子，常使中國的孩子們爲之絕倒，可是，他比一切的外國人，都愛中國少年們，並且扶育的數目也比一切外國人爲多，在工業合作社時代以前，他從上海到蒙古的路上，就已救助了數百名不幸的中國兒童。

他使自己的子女，和中國青年親近，使他們產生了愛中國愛中國青年的精神，他把那些孤兒當作自己的子女。現在中國把這些孤兒當作中國的子女了，他時常步往遙遠的大地與運河，和他的中國子女們一塊說中國話，學中國智識，他非常詳知中國農村與都市的生活，因此，他有着和他四週的中國人一樣的「思想」與「感覺」。

米加爾與阿蘭兩個人，都具有不能抑止的感受性與偉大的希望，而亞雷君也努力扶育他們，使他們胸中能養成對於人類的愛與同情。上海開戰之際，阿蘭準備進醫科大學，在中國，一萬人口里，只能有一個人能昇進大學，如果這一個人犧牲了昇進大學的機會，便等於犧牲很大的代價。可是這兩個青年，毫不躊躇馬上離開學校，自願當兵到內地去了。亞雷君爲了送別這兩個青年，招待我參加他們的晚餐會，這兩個少年由於血統同一，都很富於手足之

變，同時，對於亞雷吉，也當於父子之愛，亞雷吉在「祝融」的聲音里，把他們送走了。

沒有像亞雷吉那樣更憎恨戰爭的人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際，他還在學校里求學，其後，他步他的兄弟後塵，加入新格蘭軍隊里，他的哥哥戰歿了，他自己曾受過二次毒瓦斯，只受了重傷，不曾失却生命，戰爭結束了。英國皇太子曾經親自授與他勳章，可是他感到戰爭的浪費與無聊，抱着幻滅的悲哀從戰場回來，爲此，他到上海來，在工部局擔任工場監督官。

他並不僅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自信在某一種理想之下，是必須鬪爭的。於是，「自由中國」的思想從他的混亂的思想中，完全具體了，無論是怎樣盲目的摸索，他認爲必須幫助中國往自由世界裏走，同時他感到他必須爲自己運命重新開拓一條道，他感到中國民族是加速的往前走，以後將能貢獻世界以較大的價值，他的思考極爲具體，因此，他的信念建築在中國少年與從事一切生產事業的中國平民身上，——換言之，建設在外國人所認爲並不是類的苦力與農夫身上。

他從他的經驗裏，再三實證了對於中國的貧民子弟，如果能給予他們以二分之一的造就機會，那他們便會很偉大的成長起來那一種潛在力，因此，他的強烈的目的認——中國兒童們在將來，應有享受友情與人類的生活權利爲此就必須對一切束縛鬪爭。他不但把他自己的生命貢獻在這種鬪爭上，他還使他的子弟也把生命貢獻在這一種目的上。

這種罕見的人格，當然是由這種精神力量與現實的感覺聯合起來所創造的。但到底他受到什麼樣的影響以致能夠如此呢？我曾問過他。他是在不足一世紀之前，在新格蘭，由亞爾蘭與英格蘭開拓民接合產生的兒童，他的叔父很多，有二個在南北戰役之際，和北軍作戰，一位是內布拉斯加州首都黎雷加的建設之父，亞雷吉的牛父是地主，同時又是小學校長，非常努力於制定新格蘭進步的社會立法，他忠實於他的主義，他主張人生最後的二十年應該從事教

育以資與農業的工廠式的農場」。

爲了實踐自己的主張，老亞雷把自己的土地分讓給他的子女與其他，們，那些子女們在這里學習共同生活，他並不是頑固與盲的愛國者，他能不分種地讚美人類的勇氣與天稟，他的兒子有一位名叫雷·特·瑪尼浦。瑪尼浦是瑪利族的酋長，這位酋長善於使用紅衣兵戰術——和中國的游擊戰術相似的一種游擊戰術，英勇的與白人抗戰。

嚴寒的新格蘭邊疆的生活，使亞雷君的肉體和他的精神一樣的健康無比，他曾對我說過：「新格蘭是一個未開化的嚴寒之國——在菲里只有酷烈的寒——往往颯起把林叢剝舞起來的巨風，在叢林里野生的愛爾蘭人。一經把原野燃燒起來，那麼，驚逃的數百萬羣野與鹿列蒂，形成一條巨大的奔流壯觀無比，在那里，青少年時代我曾經有好幾回遇到危險。」

這個「爾蘭」對於社會戰爭的浪費與無聊，非常的憤慨，加之他在那未開化的土地上受過嚴格的訓練，——類如不能互助，就必須共同死滅的教訓，再加上戰爭對一切都不能予以圓滿解決的教訓，這些，都是使他努力於扶助在將來社會生存的互助的人類的原因。

在這一次戰爭里，他雖曾直接加到前線去，但他負擔着一種偉大的超的任務，使他不停地在活動着。

(六) 中國工業合作社

中國工業合作社是人類的再進，經的進步，薄弱的教化的一種表現。

——宋慶齡（孫中山夫人）

當亞雷君把他兩位義子送往內地的征戰去之後，我常常去訪問他，和他見面時候也多了起來；有時他出去從事某一種毫無趣味的工作而把我也拉了去，日軍那時已經奪去蘇州河以北的租界警察權限，但還許可亞雷君與一部少數的工部局行政官執行若干種職務，日軍殘虐無比的行爲，使他非常憤慨，他曾好幾次給日軍發送去警告書，可是沒有效用，日本流氓與日軍支援的暴徒，已經在蘇州河南部活動，殺戮了許多愛國的中國同胞，至於到處拋擲炸彈，已等於家常便飯，司空見慣了。一位姓劉的博士，由於拒絕去充日本的傀儡，距我的旅館門口數碼的街上，被暗殺了，無形中，這又等於脅威不協助日本的外國報社的主筆與記。

妻在北平，健康已經恢復，在上海每日都生暗殺與拋彈的時候里，她遙遙從北平到這里來。

亞雷君往往在每天作完了工作後，到費里里來，互相交換最近日軍瘋狂似的行動，那真是一種怕人的情報——某一外國報社，被暴徒從窗外拋進炸彈，某人在某一家庭門外，發現某某的首級。我們共同的信念却是：如果不把勞動力與資源完全總動員，如果不能發現建設工業基地的方針——在將來，必須廣泛採用的運動戰所必須的工業基地建設的方針，那麼，中國的運命是無望了。——我們常常討論這一個問題。

經過相當日期的討論，我們思想到：「中國與戰時工業應該建設在『主的基本上面』，這也是我的妻尼姆給我的知性的暗示。偶爾在某一天，在這一次戰爭過程中，工業合作社將能使中國誕生新型的社會——這一貫的思維在我們頭中出現了。我們想到工業合作社是迅速的再建，救濟難民的生產救濟，訓練勞動階級，戰鬥的總動員的一種手段，又是民主主義政治上的經濟基礎，在日本商品封鎖下與經濟的日日的游擊地區里的防衛手段。

這一個範圍很大的計劃，畢竟能否受到政府的支持？這也是可疑問的地方。不過，這倒是一種使我們周圍的陰鬱空氣爲之一換的希望，我們接續地開始具體地構想了，我們越討論，我們也越相信一定能夠實現。美國出身的技師漢士純，知道這消息，立刻參加進這一個「知」的歐。巴克。不久，銀行家徐新六君——位紳士，現代中國傑

出人才之一，對於社會的洞察力很敏捷——也加進。同時他很熱心支持，又一位英國領事館員也參加來了，他以「合作社」這一種簡單的名字，應該和崇教的神聖性同一尊敬。

亞雷君是這計劃里的重要人物，我們相信唯有他才能把這個計劃具體地組織與實現出來。我們相信這計劃會實現的，因為亞雷君自己具有充分的信念，於是我們亞雷君之心為心，而他也開始對於這種「運動」建立技術的計劃了。他把這種計劃看作一種十字軍運動，我們寫出來宣傳手冊，提倡中國內地應該建設三萬處小型的工業合作社（註）一九三八年春天，手冊出版了，都贈送給對於這種運動並不懷疑的人，並且又出版了英文版，中國版再版了好幾次。

（註：一九三八年，上海出版：「中國工業合作社」。）

一部中國人士，和外國人思維的方向一樣向前推進，我們組織了中國工業合作社委員會，推許徐新六為委員長，他擔任委員長一直到搭乘美國技師駕駛的旅行機，在廣東上空被日軍飛機擊破死亡為止。

中國優秀的技術家那時在——上海電力公司服務的兩個人——孫福裕，吳去非，他們是美國技術學校畢業，另外工業合作社的企劃天才家盧廣綿，也加入亞雷君里，這些人，在現在已經組織了三千英哩的工業合作社戰線。在數百名技術家與組織同志之間，他們占着很重要的戰略地位。

中國工業合作社的「工作」是什麼呢？第一，工作合作社是中國在一切條件下的歷史的結合產物，戰爭使中國重工業受到極大的損失，資本從內地流亡到租界里，運輸斷絕，建設極為困難，可是，我們鑑於基本的條件上，有三四種是有利的，所以我們對於合作社的信念，極為鞏固。

這三四個有利的條件是：其一為日軍戰線，他們自動地封鎖了廣汎的地域，外國商品已經不能運到中國來了。為此，中國的工業一時能夠占國內市場。第二是：中國勞動力由於日軍的侵略，數百萬難民都退到內地，這是一種

無限的力。第三是：中國的天然資產與原料地帶，有以省在最近幾年來，尙不至於被日軍占領。即以「淪陷」者而言，游擊部隊也占有極大的隴間地帶，這樣在日軍駐屯地帶，與鐵路的中間，能够使自給自足的中國工業照舊存在。

政府的計劃，在西北各省集中的建設中國新工業，但由於日機的轟炸，這計劃已經破壞了。中國全土，在日機能够蹂躪的地方的大工場，能够求久無恙的，怕極少數。合作社的計劃却是選擇日本機械化軍隊不能侵進的地點，建設細密的「擬裝」，（迷彩）。以數千小型的「半流動式」的工業爲單位，一見就能知道是工場的煙囪與較大的建築，完全不要，這樣，才能構成了中國長期抗戰的工業基地。

對於勞動階級，非惟應把他們總動員，同時，還應該使這總動員能够有極爲進步的訓練與組織，在民族獨立的解放戰爭里，應該使勞動階級明白應有相當的犧牲，並且使他們自己加入，負擔責任，——使他們明白這種目的。在戰爭中，必須對於勞動階級，使用軍隊的士氣與經濟的民主主義的鬥爭的意識去鼓舞他們。

在論理上，應該要求勞動階級，消費者，與政府攜手——換言之，即爲要求人民，政府，軍隊能够攜手的一種機構組織。工業合作社便是解決這種問題而存在的。政府應該對於中國的勞動階級援助，如救濟基金與政府低利貸款，只要能够防止破壞金融合作社的腐敗的政治支配力，那我們相信在這種援助下，勞動階級會立刻加入非常時期的抗戰戰線上的。西雷君曾經批評過中國勞動階級：「一定能把自己所扮演的戲，演得極爲精彩。」另一方，資階級他們覺悟到應該民主的經營工場，他們一定會熱烈地歡迎收買自己的工場的機會。

在這一次抗戰中，一直到現在，還不曾開始對於民衆要求積極地參加抗戰的運動。事實是在現在，非常迫急地要求某一種民衆參加抗戰的運動。

中國工業合作社的原案，最初分爲中國較大的「經濟防衛地區」以及工業「戰線」。第一單位是使用水力與手

足力，用從「焦土的都市」搬來的輕性機械與器具去開始工作，遇有緊急時候，可以轉與搬運，同時在日軍戰線背後也能活動。爲了使這樣的工場能够永久地存在，必須教導民衆自己的輕工業，便是自己的經濟生命線，另一方不只要求有組織，有訓練的民衆來協力，更需要軍隊的援助與保護。

第二線是主要戰線與後方之間的中間地帶。這一帶建設比較第一線可模稍大，但仍然是半流動性的工場，緊要之際，可以安全的撤退，這樣的工場可以與運輸合作社合作。大體中國在最後一定會受到完全的封鎖，因此，不只需要自給自足的工業發展，同時更需要與抗戰協助的運輸組織，我們主張極爲廣泛的合作社運輸機關——組織駱駝，馬車，騾，馬，搬運工人。這樣第二線的運輸與工業，在戰爭擴大到這一帶之際，使他們協助游擊戰隊。

第三線爲後方地區，在西北，西南，東南各地帶——較爲安全的各省內，必須建設工業合作社，在這一帶，應該開拓鑛山，生產機械與器具，以供第一，二，三線所需。在中央本部指導之下，應該設置買賣與配給的機關，建設訓練學校，合作社醫院，老兵與戰爭孤兒的休養地，醫療所，托兒所等等社會的副產物——亞雷君的想像的產物。

這些紙面上的計劃，最初在漢口，中央要人們毫不感到怎樣重要，但以後漸漸感到都應一一地實現了。懷疑主義與敗北主義者認爲這種計劃完全是痴人說夢，傳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中國人，有許多吐露「陳腐的冗語」：

「中國是家族制度，是個人主義者，這種計劃，怕是辦不到。」

「沒有智力的苦力們，不能去經營工場，因爲一不留神，他們就會把機器與貨給的金錢，席卷而逃。」

「逃難的人們不能工作呀！你不自這道理而麼？他們不願工作，只願從慈善的日軍手里去領米。」

如果亞雷君與他的工業合作計劃，不受英國大使熱心的援助的話，那麼，這個計劃會和普通人們的否定一塊兒葬送的。

亞奇鮑，加，克拉克爵士，是英國外交官陣營里思想極新的人物，他繼任，M，那番布爾，休蓋紳爵士的後任，最近才到中國來的，休蓋紳大使由於被日軍機關鎗射擊受到重傷，不得不退任，其後日軍知道後任的克拉克大使是一位嚴厲的反對和平主義人物，他們大約復後悔射擊了前任大使，克拉克到中國後，對於中國的抗戰，懷着極大的同情。雖然他並不曾受到英國內閣的支援，但在「援助中國」信念之下，他自己在凡有的機會里，實踐英國接華的條約。

亞奇鮑爵士自把工業合作社計劃提呈於蔣委員長，蔣夫人宋美齡，孔祥熙等要人。那時中國內部已經有人提倡，却不會開始進行，由於英國 使的勸導，中央政府才贊同了，蔣委員長的親友——M·H·特爾豆，也用全力去支援，在六月，亞奇鮑爵士受中央政府的委囑，使亞雷君離開上海工部局，介紹他到漢口和蔣委員長夫妻見面。

現在，工業合作社的文獻，無論是英文或中文，增加得特別多。而工業合作社也象徵出許多人們在戰爭中懷着不滅的希望，努力於建設的成績，在不斷的鬥爭里，只要賭生命去努力幹下去的話，則中國 有極大的進步之希望的，由於亞雷君的努力與代我們參加實地的工作，已經證明合作社存在的價值了。這樣亞雷君該被譽為現代社會里的偉大的冒險者之一了吧。羅倫斯（註）把破壞的游擊戰術帶到阿拉比亞，反之，亞雷却把建設的游擊工業技術贈給中國。

（註：羅倫斯於歐洲大戰爭時，在阿拉比亞指揮土人軍，從事游擊作戰。英國人。）

「亞雷君又收養一位孤兒了。」孫中山的未亡人宋慶齡聽到這話，露出微笑來。他曾極熱心地在最初便援助合作社建設運動，並且她還使那富有手腕的兄弟——宋子文也加以贊同與援助，她是由於她的睿智與正確直覺，徹底地理解工業合作社是孫中山總理建國三原則里最重要，同時已經被拋棄了的具體的縮圖。

「這才是真正的「民生」問題的中心呢！爲了使其成功，是必須由生產者統制下的大眾運動去開始進行。」她

說。

她這種興奮的神情，使我也由心里發生共同的情感，我感到我興奮得如同捲進電氣發動機與難民的大群里。六月，我剛到在日軍包圍下的漢口，我們的報又命令我向中國內地去擔任戰爭消息的報告。

(一) 複雜的政界

天視自我民視，
聽自我民聽。

——孟 子

武漢——包括武昌與漢口——是一個雙生兒的都會，在揚子江上游，距上海六百哩。是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二個首都。

在武漢陷落的前三月，我到了這地方，那時，人們都認為此地已等於陷落。克拉加大使某一日對我這樣說過：「如果我們努力使這些人們，把他們認為漢口已等於陷落的說法改為『漢口如果失陷的話』，那麼，這就等於對中國以極大的無形的援助了。因為中國是需要『敢鬥的精神』呀！

也許是一種幸運，我到了漢口，馬上搬進海軍Y，C，A，書記所住的小洋房里，外國新聞記者都住在這裏。不久，亞雷君被蔣委員（譯音）邀請商討建設新工業，也來到漢口住在我們這裏。每天夜明前，少年報販盡力喊叫的尖銳聲音，把我們擾醒。

「武漢日報！武漢日報！」

這種喊聲，很使我們感到煩惱，但這位少年報販却是一位很好的少年人。他那種凜然的喊叫聲，好像是向這一個古老的都市的市民全體，呼喚他們：「快醒起來吧！」那是一種銳利而又富於勇敢的喊聲，亞雷君說：「這種喊聲好像迎年的鐘聲。」每天都使他感覺到有一種新的希望在呼喚着他。

但在「武漢日報」的喊喚音過去之後，另有一種象徵漢口運命的半啞的喚叫，常常繼續達數小時之久，我們並

不覺得他叫喚的是什麼，大聲地是在叫：「我的爸爸！我的媽媽！都死去！」他是一個乞丐，在他那乞食的喊叫聲里，充分地帶着二十世紀的宿命與憤懣的情緒。

「完蛋——完蛋啦！」他好像是這樣的豫言着。

這是武漢的現狀——到了這時候，××的支配階級遂在拚命地尋找妥協之道，而對於內部爆發的熱情與勇氣，以自信，不絕地加以鎮壓的武漢的現狀。

只有在濟東亞的戰爭里，是充滿了極不合於情理的矛盾的。中國是爲了追求獨立而抗戰的一個殖民地國，在中國的抗戰過程中，列強各國互相角逐着，充分地把握列強各國的貪慾，僞善，無秩序的事實暴露出來。而××本身一方恐成爲現代的國家，另一方却帶着半封建的性格。不斷地在排斥着那一種使自己能變爲現代國家的內部的力量與活動。

德國對華政策便是一例。一九三七年時代，德意志在中國軍內的軍事勢力是壓倒一切的。不只軍事而已，在工業，貿易，政治，文化各方面，也漸漸地拾起頭來。德國對中國貿易，除了英美兩國外，凌駕一切，甚至比較與日本的貿易還更大，比在日本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九三七年，中國始進行復興計劃，在這復興計劃上，德國所占有的使命比較任何一國都重要而且更大。在中國陸軍軍官里，對於希特拉的崇拜，印象極深。在軍事內部的組織中，有若干地方是彷彿「拿其方法」的。蔣委員長對於××也相當讚美，這也許具有相互作用的原因吧，可是不久，當日本侵略中國，大了侵略範圍的時候，在德、意、日三國的「防共協定」上，却劃着希特拉的簽字了。

在中國對日實行英勇地抗戰的數年內，德國在中國商業利益，大部分都被中國壓制下去，由於德國和日本成立了貿易與資源的獨占政策，使德國商人和中央政府締結的數百萬圓美金的貿易，完全歸於無效，當然，德國商人們，九十%以上是反對希特拉了。

但另外還有一種貿易，繼續增加數目，這是德國軍火不斷地輸進中國。中國從海外購入的軍火，約二分之一是自德國購到的。並且還有德國軍事顧問。在希特拉公的誹謗中國之後，這些軍事顧問還在蔣委員長身邊，中國將官里崇拜拿其份子的人也仍然存在。其後，日本藉防共協定條約，伊更希特拉與德國軍事顧問從中國撤回，當漢口運命危在旦夕，希特拉下令，命令軍事顧問回國。一九三八年六月，除了餘了七名外，其餘都完全回國。雖然德國軍事顧問和蔣委員長之間，曾訂立過契約。最滑稽的是在軍事顧問團里，有一位猶太系的德人軍官，希特拉爲了酬謝他對自己盡忠的功績，在他回國後馬上就把他關進監獄里。

英國對華政策也和德國一樣，完全不能一貫，倫敦的公式言論是——對於日本用武力對立與變更的一切狀態，完全不承認，服從國際聯盟決議，反對使中國地弱以及使中國增加困難的一切行動，並且決定對中國以具體的援助。可是另一方面，英國商人每年輸往日本的商品都在數百萬磅左右。這樣，日本更爲積極地購買戰爭資材，更積極地破壞人類的生命與財產，更積極地奪取了英國在中國貿易的權利，並且更侮辱在中國英國人，而日本對於英國由匯兌平衡資金借款援助中國的貨幣制度，更積極地加以攻擊與破壞，攻擊與破壞的手段的外貨，却源源不絕由英國輸給日本。

美國怎樣呢？官吏與議員，滿口一致痛罵日本，報紙與雜誌千篇一律都是攻擊日本的文章，美國人全體都希望中國的勝利。可是日本却從美國得到飛機使用之汽油，銅，鐵，鋼鐵等，占輸入總額九〇%。鐵與合金占八二%。一九三八年，日本從美國得到七六%的飛機與飛機附屬品，並且XX還把最新式的兵器設計圖與構案賣給日本，並且把機械與優秀的技術家送到日本，致給日本怎樣去建設製造的工場，此外，XX商人們並且把飛機工場與汽車工場——工廠在原本原樣組織建設起來的——賣給日本，XX成爲日本最優良的顧客，日本擴軍所必須的外貨，不斷地由XX輸給日本。

××很徹底地排斥日本，却不斷供給日本以武器，由於歐洲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已經不能與××商人競爭了，於是竟致使××商人供給了日本軍火，占日本額入總數八%（註）在開戰當初，××公佈禁止××輪船往戰爭地區輸運軍火的法律，這樣，交戰國就必須用自己的商船去運輸軍火，日本的商船很多，並且把中國的船隻完全奪了去，把中國沿海各岸完全封鎖，自然，這種法律不利於中國，簡直等於拒絕中國由××購買軍火。中國的××商人，在日軍占領了中國海岸地帶之後，對於在日軍手里完全統制的經濟，是不能援助的了。可是，我們××給予日本的經濟援助，比較給中國的經濟援助，高過十五位——二十倍。而他們却指摘日本是破壞世界和平條約的匪賊。

（註：一九三七年——三九年，××對日輸出為七億五千九百萬圓美金，由日本輸入十億圓，其中含有由日本買來的四億四百萬美金的現金與現銀，自然，依此計算，××得供給日本三億二千七百萬美金的軍火。）

如果我們對於官吏與議員的演說，完全不加以懷疑的話，那麼，一定能想到在孤立派議員里，是有人對於日本侵略中國表示××，或者表示神秘的「中立」態度的。如果有人說：「我們必須對於日本——不，對於兩個交戰國，使他們完全武裝起來。」則立刻會有一群紳士們喊起來：「那豈不等於把我國捲進戰爭漩渦里去了麼？」以實際來說，如果禁止把軍火——在戰爭上，足以致人死活的軍火——輸出去的話，則××商人，在一年之間會損失三千萬——一十萬圓美金的利益的，雖然這數目，還不如我國現在建造中的特等戰艦一隻的製造品之三分之一。而這些戰艦，都是在××已使日本充實了軍備之後，爲了對日作戰而建造的。

意大利對於中國的援助，完全是一種喜劇的。意大利對中國尚不失爲好意，雖然意大利是防共同盟國，並且由日本受到相當的「外交的援助日本」的代價，實際意大利對日本的援助遠不如英美兩國。在上海，有一位日本將校在宴會席上，他沉醉在「日本與意大利的友好關係」里，宴會完的時候，他對意大利將校說：「意大利人與日本

人，是在中國存在的最後的外國人。」這句話雖然奇妙，實際却極爲真實，而意大利自己也最爲理解，因此，只要能發財，意大利對於日本與中國，都不妨背信。

在日軍下，意大利利用自己的特權與地位，接受中國人財產，插上意大利國旗，說是保護「中國人財產」，從中國人手里用半價奪過來。用相同的手段去接受中國輪船，並且越過海岸一帶封鎖線，把古舊腐朽的軍火搬運過來，賣給中國共產黨。有時他們自願擔任重慶政客的上海代表人，把動產或不動產代理賣給日本，自己領取一部報酬——自然這種報酬並不是意大利人全體都能得到，我只記得一位有名的黑衫黨——在他酒醉中，親自對我說了出來的，他是那時的上海工部局參事會議長，協助一位美國人經營的商店，很被人們尊敬。

主張對中國，實行不矛盾的政策的，只是蘇維埃。一九三〇年，日本曾從俄國購買四千萬圓以上的商品，據一位經濟學家的計算，這個數目能趕得上日本從爪哇，法印，英領婆羅洲，菲律賓輸入額。及至一九三二年，日本占領了東北四省後，蘇日貿易便完全停止下來，在這一次戰爭中，蘇聯與日本的貿易，還不如蘇聯與美國交易的千分之一（註），日本只能從樺太輸進一部分汽油——日俄戰役，日本勝利的代價，便是保證由樺太將汽油輸往日本。

（註：一九三九年，對日貿易不足二十萬圓美金。）

同時在列強中只有蘇聯，是忠於嚴守一九三七年國際聯盟的決議：——認爲日本破壞國聯條約，各聯盟國應援助中國的決議。曾經將相當數量的飛機，飛行士，彈藥輸往漢口，並且蘇聯和中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如果其他列強各國也能這樣作下去的話，那麼，在東洋，便可以成立保全中國獨立的反侵略戰線的基礎了。

另一方面，中國國內，是存在着一種獨特的矛盾——這種矛盾好像惟有××不斷的××才能解決。而中央政府是處在一方希望民主主義的國家，另一方却又希望××國家的二重方面里。爲此，便不能決定正確的對外政策，政府

里許多的位居上層的支配階級的人們，只採取了一種奇巧——單純的把美國，法國，英國，蘇聯各國引進民主主義國家的戰線里。連行政院長孔祥熙氏也曾對我說過：

「莫索里尼對弱國的警告：『對於民主主義國家應該注意，希望他們的援助而去拉攏他們，雖然能够拉攏過來，他們却不會幫助什麼。』這句話是對的。」

同時，行政院長對我說：「我們很明白我們這樣作，也許是一種愚昧的行爲。」

××××的支配階級和列強衝鋒的時候，表面上是民主主義國家的態度，而在內部里，却是××國家的手段。一切的人們——官吏，公務員，軍隊，人民之間，存在着很深的隔膜，而在經濟的中樞地帶，對於那數百萬的農民與勞動階級，毫不加以訓練與總動員。一九二七年的記憶——曾經威脅過×××的記憶，使×××懷疑着如里把民眾組織起來，會不會又演成歷史的悲劇呢？——他們很恐怖這個歷史的悲劇。

農村里的農民也一樣沒有加以組織，許多的勞動階級連這一次抗戰的性質都不明白。由於農村不會總動員，民衆與軍隊之間不能徹底的合作。甚至連把重要機械與技術的勞工完全撤退的組織與努力都相當缺乏。四十萬噸的機械之類的東西，都拋棄在揚子江上游沿岸一帶，舉一例來說，大冶——中國鐵與礦業的中心地——積存的銑鐵數量，極爲龐大，搬運半年尚不能運完，可是却不努力設法把它運往內地，以致其後使內地極感缺乏銑鐵。當時如果能把當地的勞工完全動員的話，那麼也許能搬運一部分到內地去。即或不然，也可以把這些銑鐵沉於江心，由於當局並不曾這樣作，以致使這些東西完全落到日軍手里。

數千名只受着輕傷的軍人，由於醫療設備不足，在往後運送的途中死却，有的被撤退的軍隊遺棄在路傍而被日軍殘殺。如果當局組織訓練了擔架夫——由農民組成第一線救護隊的話，那一定會救助了許多的生命了吧。另一方面在農村里，如果組織了民主的防衛隊的話，那一定能擾亂日後占領的日軍的「肅清工作」。這一類的事情，在中央

政府從事抗日血戰的進行中，並不是一種難於實現的事情。

「紅色的漢口」——這一句話說得確很不合於現實，雖然如此，要求變更現實的聲音，在長江的底流里，確實在流動着，有時會達到表面，翻起了漣漪。但却沒有行動的自由。言論自由是比以前好多了，智識階級的人們彼此對於時局的討論，並不受限制，只要沒有組織與行動的話，對於一切的批評是一任其自由的。

政府的本身，對於國民黨與抗日的各黨派之間，保持着均衡的態度，可是這一切的均衡的勢力，都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國民黨自然是一種合法的政黨，雖然現在確已承認了共產黨的存在，但共產黨員並沒有在政府里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在民間的各政黨——曾經長期間被壓迫的民間政治黨派——爲了防止共產黨擴大勢力，又從底下活動起來，頻次的散佈反共宣傳。如社會民主黨，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等等，這些政黨使國民參政會——戰時的中國往日民主主義推進的第一步的國民參政會——政府的同意之下召開了。

一言以蔽之，這些政黨的首領的言論與主張，雖然爭論擁護有見多的黨員，實際黨員全體合計起來，還不足千名左右。在政綱方面，各黨完全清一色的主張：——「後『均分土地』，『政治的民主主義』，『最後的社會主義。』」在理論上，他們的目的和共產黨的目的同樣發着響聲，在實踐上，他們並不是「鬥爭」的政黨，和民衆之間也沒有聯絡，同時也沒有武裝的軍隊，在政府的承認之下，他們才存在到今日。

此外還有第三黨，這一黨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共分裂之際組織，黨的政綱一如名義主——國家的利益而分佈在階級的與黨派的政治上，這種政綱是一種可調協的。只是在原則上，他們主張永久擁護「統一戰線」。這一個政黨的指導者是鄧演達——黃埔軍官學校畢業——陸軍政治部長，已經被××部下所暗殺，福建的叛變之際，這一黨曾經在理論上支持過，及至國民政府遷都到漢口，這一黨已經完全沒落了。

第四種政黨，被批評爲國民黨內部里的另幾種小黨派，也有人認爲是「分裂派」。各黨派都具有獨自的自

亦缺乏以民衆爲基礎的聯絡與擁護，政府過都過漢口之際，這些黨派雖沒有得到合法的地位，但在國民參政會上，他們可以派出代表，敘論自己的意見。

國民救國會的東北政黨以及其他的各式各樣的政黨，也都許可他們參加國民參政會，但其代表是以各黨的「地方」爲標準而選定的。

共產黨七名代表——和分裂派的代表數目一樣——許可參加參政會，二百名參政會的議員與代表，都中國民黨所選定，同時國民黨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委任七十名國民黨員的委員。

勞動階級，農民，兵士，學生，却沒有被選定的代表。連名義上的代表都沒有，由於參政會不會具有使國民黨接受與承認參政會的決議與發言的權力，所以參政會的輿論反響，並不太大——只有共產黨是例外。總之，國民參政會對政府以及政府的支配階級，沒有權限可運用，所以參政會議的效果：只是「一種辯論」——代表者們自己是知道的。

這有一件事情，國民代表議會，最近將要召集，一般人們都相信國民代表議會能夠產生出什麼來的，自從由國民黨選定汪精衛爲國民代表議會副總裁——裁官蔣介石——後，他很堂皇地在會議上聲明他的主張——抗戰到底的主張，並且痛罵了幫助日本的傀儡——但他却作了幫助日本的傀儡王！

這一個國民代表參政會的組織與召集，也許是汪精衛叛變重慶的原因之一，他希望人們幫助他排斥委員長義兄（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博士——他很嫉妬孔的行政院長地位。他把這種希望與要求帶進參政會里，同時，他更希望政學系——國民黨的中心，C·C國的代——支援他。這一種組織對中央政府的官吏的影響很深。（詳細當在第六章第二段以下各文里解釋。

可是汪精衛的計畫並不會成功，蔣委員長由於事前已得到警告，把汪的計劃彈壓下去了，所以關於這問題，不

付甲投票去解決，這樣，便使這位「詩人政治家」(?)跑向法領印度。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中，汪精衛是最後一個政治的收北者。他由於受到意大利領事的援助，每天都和日本方面，用無線電聯絡。若根據汪的部下的推測，如果汪若掌握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支配大權的話，那他會背誦蔣介石與革命軍及共產軍，和日本「和平」的進行停戰交涉的。「不幸」的是他從參政會里倒台。使他不得不和日本正式勾搭，使他不得不接受日本的誘惑而甘心賣國去作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

在政治上，不會使代表人民意志的代表者參加，只能讓最卑賤的人物，爲了滿足利己與虛榮的心理，大膽而又積極地背叛人民全體的意志，這在共和的國家里，該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實了吧。所以汪精衛的背叛很易於成功。同時汪精衛所支配的部下們，存在着極多的追隨他的人物——事實，支那階級的內部，確實有一部分是和日本通謀的人物存在着。在這種背叛祖國的危機與民族的危機之下，和支那階級的政黨對抗的對立政黨之活動，具有怎樣的價值，從這一個事實可以充分的證明了。雖然這種對抗的政黨已經被政治委員會完全拒絕其加入。在漢口時候，政府曾經盡力使對立的各政治階級協合一氣。因此，汪精衛的「降伏」提案，完全被否定了，如果國民黨照汪精衛的提案作下去的話，那麼中國抗戰的在翼階級會和國民黨斷絕關係，獨自繼續抗戰下去的。

在這一參政會里，自始至終，中國內部的辯證法問題在潛藏着，換言之，即爲：——國民黨與×××之間努力在爭求中國的支配權。在中國的統一戰線里，如果抗日的武力一經破裂，則中國內部便會分裂而不能一致了。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並不被×××承認爲「政治的同路人」，甚至把他們一部代表認爲是×××，至於召辦大眾會議，組織極有限度的民衆，也完全不許可，並且處處×××他們。因此，在這一抗戰的過程中，如果×××向日本降伏的話，則×××會代之掌握國家指導的大權，很快的就能使國內的軍事與政治的均衡力發生變化，這很易於推測的。

在這兩兩大政黨相互之間所存在的隔膜，依舊很厚。×××並不把他們主張的土地政策與一黨制度加以聯繫，並且決定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更爲積極地實踐他的主張，反之，×××相信這次對日抗戰，是必須把戰鬥和農民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革命一致，這樣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在他們占領的華北地方，他們實踐他們的主張，許多改革的地方都是×××受到相當衝擊。

，就一戰線的條件之一，是×××放棄了沒收土地的政策，對於沒有土地的農民，把漢奸與沒有地主的土地，一時才配給他們，各地的政府對於利用空地與荒蕪的田地，不論其組織如何，都給予以援助，雖然並不受富農的壓迫，却課以較諸貧農爲高的率稅，貧乏與半貧乏的農民們，都是在紅軍占領下，犧牲了地主與豪紳的存在，由此得到利益，因此，民衆們極爲熱心的支持戰爭。×××以這種經濟的變化爲基礎——關於這種事實。在西北最——用緩和的新式革命手段，從軍事與政治上組織 衆，使 衆與×××聯合，共同抗戰。

這種×××的政策，在日軍戰線後方——×××撤退的地方，極爲發展。自然，×××對此，是表示×××的，×××是代表地主，豪紳的利益的，認爲變更土地制度是不合於法理的。×××的上層階級對於×××站在抗戰的前線地位，非常×××，所以對於×××的游擊應，並不加以×××，最後，×××決定從×××方面收復「失地」——即×××從日軍占領下，收復的「失地」，由×××再收復。自然，這種方法很容易引起×××對×××兩者之間的×××的。

在這種情勢下，蔣委員長的人格所給 各方的影響，是值得研究的。——他以維持國內勢力均衡爲第一個重要任務。所以，下一段里，我們要正確地討論在這種背景下的蔣委員長，由此我們能理解中國在抗戰過程中政治的複雜原因了。

(二) 蔣委員長

只要侵略者還不會吃到決定的敗仗，中國的抗戰便不會停止的。

——蔣委員長

每一年到安息日，我們是必須把我們的肉體完全檢查一次的。這是據說人類里的細胞，每隔七年就會完全變化一次。戰爭會使人們肉體受到極大的衝擊，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刺激，這是無庸贅言的了。人們只要被一個炸彈所打中，（即或不會死亡）那他以後的生理上的變化，會異於以前的。馬克斯曾經說過：「時間在以後會縮短的——少能縮短二十年，這樣的日子不久就會來到的。」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日月，便是時間縮短日月。自然，在年日月的縮短與炸彈的襲擊之下，蔣委員長的的精神與肉體也會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化。

蔣委員長的身傍，匯集着許多有爲的人物，特別是手腕敏捷的董綱光，擔任戰時的宣傳部副部長之職。和外國記者接見，大半都由他擔任。當我在武昌的時候，董氏陪我渡江去會見蔣委員長，那時我已感到他很能幹，其後在重慶，他很沉靜地發揮他的天才，這使我受到一個很深的好印象。董氏是在美國的美索利州受過很深的訓練的一位幹練有爲的記者，他對於美索利州所流行的標語：「一切都要坦白」，非常欽佩。他並不是想從紐約領受什麼罐頭一類的禮品，只是他能對於一切不利的情勢以及其背後所存在的事實，豫先都努力準備使別人理解。就由於他具有這樣的敏捷手腕，使外國人對於中國懷着一種很新的尊敬心情。這不僅是我一人而已，我相信我能够代表我的朋友們共同的心理，如果在他的身邊，能够匯集一些和他一樣優秀的人物的話，那他更能發揮出他的天才了。

我曾經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見過，她叫我把她和我會見談話的內容在美國發表，——不幸的是我並不會按照她

的音思作下去。蔣委員長却不曾這樣向我要求過。當他和我握手的時候，我看見他那薄薄的眼唇帶着微笑。但一刹那便消失了。許多人們都說蔣委員長在對日抗戰以來，非常衰老起來，可是他卻在他那和以前一樣的嚴峻的表情之下露出的銳利的眼光上面，看出他卻以前毫不曾變化的——仍然銳無比。只是他比較以前缺乏一些緊張，心情是平靜，而又充滿了自信的喜悅。他那種像救世基督的異於普通的心理與自信，以及他所主動的一切，分明是較諸以前更爲深沉了。當我問他如果漢口淪陷，其後的展望如何之際，他說：

「我所去的地方就是中國政府，軍，政，經的抗戰的中心地方，這一次的抗戰，在結果上，並不決定在幾個都市的陷落上，而是決定在怎樣指導民衆去抗戰上。」

他這種說法並不是隨便的說法，而是他自己 自信的象徵，他好像相信：不論日本怎樣蹂躪中國，只要不能把蔣介石從精神與肉體以及政治上捉到的話，就等於日本不能完全征服中國。

蔣委員長是中國陸軍，空軍與殘餘的海軍的總司令官，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的統率者，這種把廣汎的指揮與行政大權集中在一人手裏的實例，在日本是決無所有的。其後他命令孔祥熙去擔任行政院長，使汪精衛代理參政會議長，他自己又擔任四行聯合辦事處主席（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國立銀行的統制機關。）與四川省主席，他又是軍人，又是銀行家，政治家，黨主席，官僚。在擁有四萬萬民衆的國家，蔣主席竟致擔任這許多的地位，也許有人以爲他是天才者，不然就是過於誇張，事實蔣委員長是兼具各種才能的人，正像中國的本身一樣，他這種一貫的矛盾——有許多的矛盾都在這次抗戰的過程中解決了——是由於中國的歷史環境所使然，若不理解這點，便不會明白蔣委員長身兼數職的原因了。

蔣委員長的人格與指揮的能力的特徵，該是這幾點：——富有強韌性，決斷力，野心，精神，進取心。權力愛。他這幾點特徵，比一切人種的普通人，都較爲高出一部分。他不是知性人，而是行動人，在別人管弄理論的時候

，他却按照自己的本能去行動，他自己承認他是經驗主義者。

在他的著作里，曾經有這樣兩句話：「若無行動就不能得到智識。」「失敗是由於不曾實行所致。」大約這是他的政治生活上的革命的思想，同時也是他之所以完全能成功的原因。對於一切問題，在判斷上，不論是哪一種，好的就說好，壞的就說壞，同時立即移諸於實行，若能這樣，則中國一定能得到勝利的。

委員長對於古世的英雄，是極崇拜的——這一點是解勸他的最重要的一個樞紐。他對於「精神的價值」比誰都關心都注意，他認為革命與其是從民衆的物質改革，無寧應從民衆的品性上去改革，所以他長期的主動新生活運動，對於紅色的農民，他不主張由生活的基本條件的改善轉化他們，而試以中國古代的孔子的論理——禮，義，廉，恥，去教化他們。

「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墮落，而不是餓死。」他常引用孔子的論語。他用這句話去闡明「廉」的理念，他認為「身分較低的」和「身份較高的」，不能「一樣的享受」。——這是「廉」，換言之，即為民衆的儀禮。（註）

（註：董顯光著：「蔣介石」，一九三七年，上海出版，六三七頁。

蔣委員長的信念——認為道德力是些剋服一切障礙的。在西安事變，他當被幽禁之際，他決心用「品性與精神力以及正義之道，去和那些叛徒作戰。」關於這件事，在他的日記里——日記也是釋放後所寫的——曾詳詳記他的決心，他的西安事變記，至今尚不失却價值。當他提到他對於古典的封建時代的英雄，孫中山博士的勇敢生涯，基督的殉教，他的母親給予他的教訓之際，他說：

「我無偽的崇拜 些英雄們，我決定步他們的後塵。」

這種正義的信仰，使這位「道德的騎士」，就是這 抗戰的逆境里，也感到無上的安慰。當我詢問他：「中國在最後是會勝利的，其間的基本理由是什麼？」之際，他很寧靜——也很滿意地說：

「在精神上，日本已經敗北了，在軍事行動上，如果缺乏或重要的精神基礎，則戰爭不會勝利的，日本由於精神的思維錯誤了，所以他們這次的侵畧中國，一定會失敗的。」在歐洲各國的獨裁者口中，是不能露出這種說法的。

同時，蔣委員長是正與惡之間，唯一的調停人物，他自己常是站在「善」這一方面。其他便是站在「惡」的方面。曾經犯「罪」的人物若想和蔣委員長妥協的話，就須完全「懺悔」。張學良由於決不懺悔，所以至今仍然在獄中，凡是和委員厚意見相異不合的人，不論是誰，都會被認為是政治的對抗者與對國家不忠實的叛逆，這一點，是×××最大的弱點。這很易於被阿諛的人物所利用。

中國和別國國家一樣，凡是偉大的歷史指導人物，他們都願意周圍的人們對他們說：「是！是！」這是一種傳統的缺陷，現在在委員長四周的「政客」，有一部分和帝制時代的宦官一樣好弄權策，例如，這一種人最拿手的手段之一，是他們注意知道委員長喜讀那一種書籍，（大半是某種古典書籍）知道之後，他們立刻把這一種書籍的內容裝進自己的腦袋里，及至和委員長會見的時候，他們用這種書上的內容與思想敷衍委員長。

蔣委員長認為人們應該和他自己的現實的力極力接近，雖然他相當的嚴峻，但他並不僅用指揮命令去治理部下，而是使用均衡與策畧的手段去治理部下，他對於政治的變化，在心理都有感覺，從他自己的歷史來說，他是一個偉大的策畧人物，他結集中政府的各黨各派開對政府的忠誠，然後他執掌一切權力，他很充分理解中國的「以夷征夷」的政策。

以歐洲的情形比較，委員長並不是獨裁者，也不是×××的×××——如羅新福，蔡濟爾等人，他的偉大是建設在把一切勢力綜合起來上面，如果萬一他放去的話，中國根本的問題也不會因之發生變化的。所以如果說蔣委員長是「中國的統一者」，那是由於人們把「國」的集團意識與蔣委員長的人格視為一種東西，從極為複雜的情形里所得

到的單純的說法，不過，在情勢緊迫的大時代里，我們都是迴避象徵的生活，所以偉大的指導者的資格，不僅在宗教上，就是在政治也能表現出來的。

這種批評決不是輕視蔣委員長的人格與他所立足的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而是在解釋委員長的某一種程度內的價值，換言之，就是他擔任防衛中國國家主義的功績，並不是普通人物所能做到的，在中國統一的民族抗戰上，他被人們一致推崇「指導者」。萬一人們對他的信仰並搖了的話，那也許在一夜中，就會失却他的所有吧，中國的統一戰線，只靠委員長的人格與能力才能保持堅固，所以委員長具中國統一抗戰上最重要的領袖，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認識清楚。而委員長在這種不斷的時日的試驗下所保持的堅固的自信與態度，才是中國在為獨立而血戰的戰爭里，一個現代的偉大英雄所具有的信心的基礎。

在次一代的歷史上，人們畢竟怎樣批評這一個時代里的人物呢？在解放的戰爭里，蔣委員長個人所存在的各種矛盾，怎樣才能調協一致呢？關於這問題，我們很難於推測，我們必須理解他的全體環境，怎樣，才能判斷他的存在價值而是較諸他的前輩們更爲偉大，不論世界上那一個優秀的指導者，都沒有能趕得上他的，英雄決不是生成的，而是由歷史的極深遠極微妙的綜合里所鍛鍊出來的，在中國，也許是有較之蔣委員長更爲優秀的思想家，軍人，政客，但如果這一類人物所處在的時代與環境不是現在，那他們是不會理解在複雜的中國現實里蔣委員長的天才與偉大了。——這複雜的中國現實，現在在逐次的變化着。

研究蔣委員長的存在價值上，我們能夠從這種研究中，知道抗戰期的中國政治上的特徵。

(二) 政治的遺產戰

何謂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然於中國，毫不需要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之獨裁。

——孫總理

蔣委員長少年生活，與中國國父——蔣委員長的導師——故孫逸仙博士完全不同，孫逸仙在十六歲之際，備不過是生在廣東的一位貧寒少年，蔣委員長却生在中產階級——商人兼地主之家，一八八七年生在寧波附近的一個小村莊——溪口。

委員長的父親，在委員長九親時候便故去了，其後他完全被母親扶育——他的母親是一位熱誠的佛教徒，崇拜祖先，她對於子女的訓練與扶育都很嚴峻，委員長極爲崇敬母親，時常提到慈母的偉大，在委員長和宋美齡——孫總理夫人的妹妹——結婚後便變爲一個基督教徒，可是他的倫理觀仍舊是半封建的，尊敬孔教的精神。

委員長在青年時期便已決心去當軍人，二十歲便進了保定的軍官學校，僅不過幾個月，便到日本去，進了振武軍官學校，一九〇九年畢業，其後曾派於日本第十三野砲隊服務，他所受過的正式軍事教育，還不到三年，留學日本之際，認識了孫逸仙博士，並加入國民黨。及至他回到祖國，正值清朝將行崩潰，他和孫逸仙企圖打倒地方軍閥，可是都不會成功，於是在一九一〇年，他自政界後退，在上海經營商業，及至同盟國蘇聯極力援助國民黨之際，他躍進政界里，在孫逸仙領導下積極地參加革命工作。

委員長就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一事，前文業已提及。是在他受孫總理的命令訪問蘇聯，回來之後才就任校長。訪問蘇聯之際，並不會會見斯大林，却會見了托羅斯基，其後曾經擔任國民黨軍事顧問的布列謝爾將軍，對蔣委

員長的印象最佳。觀察完畢歸國之後，他成爲中國第一位研究觀察蘇聯紅軍組織的國民黨的軍人，所以鮑羅特恩（紅軍中隊軍事顧問之一）選定委員長就任黃埔校長。黃埔軍官學校爲仿模紅軍軍官學校制度而設立的。當時委員長年僅三十五歲，毫無聲譽，其後在黨軍里，他很快的發展起來了，不久便任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官，掃蕩了華南各軍閥，執掌支配華南大部分權限，一九二七年「黨」開始分裂。

關於「黨」的分裂原因——也就是纏繞了十年之久的中國階級鬥爭的原因，有許多的圖書都有很詳細的解說。自然，黨的分裂與衝突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中國社會與經濟的演變。但主要的却是由於把革命的原理解釋爲二種，雙方都互爭革命的指導權所致，當然這是由孫逸仙博士的政治遺產所引起的糾紛。孫總理的政治基礎是三民主義：——人民由三種主義——享受國家的權利，其一爲民族主義，一爲民權主義，三爲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完全恢復中國所有的主權）——外國在中國所享有的治外法權以及政治，經濟，領土上的特別權利（即不平等條約）完全廢棄。民權爲民衆具有選舉政府與官吏的選舉權，換言之，即爲由人民支配政府。民生主義爲使民衆全體都享受平等待遇，分土地，使工業生產手段歸爲社會所共有，廢棄搾取制度。

孫總理所倡的三民主義，在其內容與其成功的手段上，好像居有相當程度的矛盾性質，在某一方面認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完全一樣，另一方面，又不承認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存在。

孫總理也說覺在國民黨內部也產生了內部鬥爭，所以他認爲他的主張是可以變化的。而他的講演——關於三民主義諸問題的講演，都是隨時隨地發表的，他不曾顧及到爲了將來的發展，應該嚴密地立下正確的公式，他確實是爲了調協內部對立的抗爭而解釋的。——這是實在的事情。

他——一黨的指導者，而這一個國民黨包括貧富二個階級，所以他——努力使內部方面，從根本的政治精神上使這二個對立的內部協會起見——如果不能成功的話，則其結果，內部會一定發生分裂的，而他自己，也經過相當程度

的心理變化

孫總理決不會忘却同情於被壓迫階級，並且對於這一階級，他很關心。而在革命的根本上，是把他們完全解放出來，總理夫人曾經這樣說過：（如果我們知道總理夫人始終是尊戴先總理，並且很能記起來先總理的思想與言論的話，那我們該對於這種解釋不能懷疑的。）

「總理企劃的一切，其目的都在想於改善大眾生活，他認為解放的農民與工人，才是建設自由中國的砥柱。同時他很充明白這二種階級的人們才是我們打倒帝國主義，統一中國的偉大門爭上的力與基礎」。（註）

（註）請參看總理未亡人——宋慶齡女士所著：「中國不能屈伏」，——一九三七年，上海出版。

孫總理在逝世前幾年，對於革命的認識與見解，稍有較深的變化，但在中年時代，他仍然相信他的「國際計劃」——即為使中國，發展變為資本主義，必須由英美加以援助，國民黨在掌握中國實權的過程中，也相信民主主義的各列強會援助中國，使中國在歐美的資本之下，變為半×××狀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孫總理已經向英、美、德、法各國三番兩次地請求他們援助，而在凡爾賽和平會議之際，他提出詳細的草案——為使遠東和平，及各列強共同享受遠東一大國際市場的利益，由國際聯盟援助開發中國。

英國的經濟學家J. A. 赫爾遜氏，非常敬佩孫總理這種對中國未來的繁榮的透澈計劃，當時，他曾說過：「歐美各國的資本家，應該批准尋求進取的資本地域，而協力一致地共同進行亞細亞的國際企業——這種國際企業，非僅為全歐洲的資本主義的利益，同時這種利益能延長到次一世紀左右。」（註）

（註：J. A. 赫爾遜 「帝國主義」）

可惜的是歐洲的大政治家們，沒有一個贊成赫爾遜的主張。也許他們並不知道這種主張，結果，孫總理提出的「國際開發中國」的企圖被他們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凡國際會議席上，那些偉大的製造國際和平的人物，並不會

宣讀孫總理的計劃案件，甚至一致認為孫總理是一個「無害於人的狂人」，實際那時列強對中國問題毫不感到重要，他們認為——像他們對日本人所說的——各列強應該再創造一個世界戰爭，各依自己的力量與需要去統制世界。

果使孫總理知道必須藉中國與國民的自力，去爭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於是接受了急進派的言論：必須拋棄依賴歐洲的力量企圖，先打倒國內的封建主義與勢力，完全恢復中國的主權，到這時候，中國才能自由發展，當時惟有蘇聯願意幫助實現這種計劃，所以孫總理才接受了蘇聯的提案。

孫總理也知道在國民黨內部存在着反對農民革命，與外國資本保持關係的各種份子。他也知道進行社會主義會使右翼份子受到極大衝擊的，所以孫總理要求蘇聯代表約瑟菲氏訂立一種緩進政策的文件，一九二三年一月訂立的約費字了，雙方都承認「共產主義與蘇維埃聯邦主義成功的條件，在中國是沒有的，而中國當時的急務是使中國完全統一與民族獨立。」（註）

同時，孫總理却也接受了×××的見解——民族革命乃為民主的農業革命，必須重新分割土地，保護工人與農民的民主權利，若不如是就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並且把×××拉進國民黨里，這種混血的組織，使國民黨得以誕生，使國民黨的軍事革命很快的成功，並且提高了指導的地位。

（註）一九二五年，在同盟會（國民黨前身）會員的條約里曾記入土地分配的基本綱領。

現在，關於土地問題與階級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問題，左右兩翼的意見，完全對立，這自然是理論的問題，但同時却也表示出在不同階級的民族革命上，雙方為得到指導權而進的基礎上的鬥爭，右翼主張對於內地的地主，商人，與對半封建的經濟，逐次加以改革，在「訓政」期里，仍希望資本主義會列強，援助開發中國資源，這樣就等於為維持×××主義順利進行的維持和平的政治，在他們看來，右翼的計劃是企圖把處在半殖民地中國領往現代的獨立國家方向走，所企圖的變革是迅速的革命運動，兩翼之間的理論鬥爭，主要是在孫總理倡導的民主與民生

他的指導權與政綱，並且繼續主張與要求徹底的，民族的民主主義革命。

×××認為蔣委員長是中國抗戰的主軸，而中國在抗戰的變化中，——政府與軍隊以及其他一切的變化，在統一保存中國民族革命的總動員上，在中國抗戰與世界情勢的聯繫關係上，——他們不得不相信蔣委員長在中國民族全體的政治生活上，是具有極大與極新的存在意義，民族總動員越廣汎，則中國抗戰的革命使命也越重大。此外，他們相信委員長若是保持「抗戰主軸」的自己地位，則委員長就必須更往革命方面走，同時，×××相信如果抗戰變為長期的時候，是必須受民衆支援的。

「推動蔣委員長前進」這是×××的口號，可是在漢口時代，×××在「自由中國」的政治以及其他的一切勢力與組織，完全都被擯棄於外，以其說是推進的活動，無寧說是被人推動的在活動着。及到日軍進寇到內地之際，×××才集中精力動員民衆，進行獨自的指導政綱。在下一節關於新×軍里，可以說是左右兩翼對於孫總理的政治遺產，解釋不同而產生的對抗作用。

(四) 紛失的軍隊

政治為革命軍隊的生命，無此，則軍隊等於失去其成長，發展以及其存在。

——項 英

在中國紅軍往西北移動之際，（註）爲了援護退路殘留在江西紅色地帶的中國紅軍，其運命究竟如何？在孤立與封鎖以及二年左右的追擊中，據說已經完全被殲滅了。沒有人明白這一個紅軍後衛部隊的真像，在日本不會大規模的侵略進寇中國之前，這一隊紅軍的運命仍然處在神秘里，及至日軍進攻中國之後，突如其來的，這一個後衛紅

軍出現了，在揚子江下游——日軍戰線背後一帶活躍，同時不絕的擴張而變成抗日的游擊軍的主力，一九三八年四月，指揮××軍的人物親自向我解釋這一次新四軍的「復活」與他們的信念及勇氣。這位指揮人物便是第七次出現的——新×軍副司令官「從墳墓里回來」的項英。

註：一九三八年，在紐約出版的「中國紅軍」一書曾詳加記載，亦為本書著者所著。

普通人物都想研究這一個現在抗戰的異色軍隊，都想明白中國游擊部隊怎樣固執的作着抗日戰鬥。所以我把項英的談話——他是在華南紅色地帶抗戰到最後的人物——引用一部分在這一節里發表，至少能使人明白在中國獨立的戰鬥上，這一種游擊型的戰鬥的價值與效果。

當一九三四年，紅軍從江西往西北移動之際，紅軍編成一部分殿軍，這是極力企圖使第一線上的人員不至於太犧牲。四方已被中央軍包圍起來，殘餘的紅軍即將完全被殲滅，只有三千名正式的紅軍，是「最後掘溝」的主力，另外還有七千名紅軍自衛隊——地方義勇軍與二萬左右的游擊部隊——但不是正式軍隊。這三萬左右的紅軍軍士與青年們，對抗包圍他們的中央軍，中央軍的人數比紅軍多過十倍，軍火多過二十——三十倍（紅軍僅有一萬隻步槍），紅軍也有數十架機關鎗與迫擊砲以及舊式火砲數架，其他的兵士都使用手榴彈，步鎗，大刀，木槍，數千名十一——十五歲左右的少年前衛也參加紅色地帶的最後抵抗，其中也有以肉體當砲火向前突擊的。

擔任指揮這一個後軍的人物，××選定了在普羅利塔利亞革命中純粹的普羅戰士——項英，現在中國紅軍大部分都信仰項英的勇敢與誠實，以實際來說，項英確是一個「苦力典型」的男性，他的嘴唇與鼻子又厚又大，他的牙掉下了好幾個，不整齊地突露着常常露着，苦力一樣的笑容，他那大而又平的前脚，正好去穿農民所穿的草靴，在他那瘦小而緊張的筋骨里，充分地潛藏着原始的力與汗以及曾經作過苦工的精神。

一八九九年，他生於湖北，十歲時候，已經是一個孤兒了，爲了奉養貧乏的母親與妹妹，他當了紡織工廠的學

徒，十六歲以後，便是一個完全的工人了，他曾進過學校，讀過四年書——及至他讀了蘇聯革命的書籍之後，他對於他們這些工人所受到的極爲刻苦的待遇，憤慨起來，在他的心里企圖要求改善待遇，他的行動，極被新組成的紅軍所欽佩，於是把他拉進××里來，由×××的智識份子，教給他革命歷史與運動，他在這樣的指揮之下，從事組織鐵路工人同盟與鐵工工人同盟——這兩個同盟是中國最初成立的同盟組織。

數萬勞工都像項英所希望的象徵，他企圖改變他們的悲慘生活，反之，當時還不會走上政治舞台的×××，却把他們當作力的象徵，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後，項英被選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五年，他擔任各處蜂擁而起的勞動同盟組織書記，在同盟里，擁有五十萬機械工人，手工業工人，這些勞動階級，在蔣委員長從北洋軍閥手里奪取漢口之際，曾經供獻很大的力量，及至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他仍然指揮在漢口與上海地下層活動的同盟團體，由於急進份子多被×××，勞工的士氣喚散了，使他感到必須在江西「勞農」軍隊之下才能組織起勞動階級同盟。

一九三〇年，項英正式加入江西的紅軍政府，進紅軍軍官學校去深造，其後被選爲勞農革命委員會委員長，不久並就任紅色政府各種委員長——調查土地，勞動，紅軍的優秀指導者很多，他也是一個受過充足訓練並具有極多經驗的優秀人物，他所知道的一切軍，政等等智識，都是在紅軍與組織行動里得到的。

一九三四年，他把他所負擔極爲重要的使命完成了。就是紅軍的主力集合在瑞金，準備長征西北之際，一切重要地點，都由紅軍後衛部隊代替防衛，由他指揮繼續和中央軍對抗。在×××的突破包圍的計劃里，是不能缺少奇襲，秘密的後部防衛的，這些任務由他擔任，並且很成功。當中央軍發現紅軍主力軍隊逃亡以後的一月里，這一個薄弱的紅軍後衛部隊，還再三阻止了中央軍的進攻，這樣，紅軍主力突破了中央軍防衛最弱的地方，侵進了河南，然後往西進軍，以致使中央軍的將軍們，不能想出阻止紅軍向西北移動的策略。

可是殘餘在江西的紅軍，確被攻下了江西的中央軍逐次壓迫往福建，浙江，廣東各省邊境，紅軍所有的無電通信部隊，不是被捉，就是被毀，結果使後衛的紅軍變為盲目的軍隊，一九三六年，當我在西北和毛澤東會見，詢問後衛紅軍的運命之際，連毛澤東，周恩來也說並不知道。許多紅軍的人們都以為他們已經完全被殲滅了。

事實却不是那樣啊！

從瑞金撤退之後，項英把後衛的紅軍重編為第七軍，第十軍，第二十二軍「抗日前衛紅軍」與第二十四獨立旅，他自己指揮第二十四旅——這一旅部裝備優秀，包括受過訓練的優秀幹部人員——往江西，福建省境移動，一九三五年年末，第十與第七二軍，大部分在江西東北的戈陽被中央軍包圍，全部都被殲滅，第十軍的指揮官尋淮洲軍長陣亡，第七軍指揮官方志敏被捕處刑。

但到一九三二年日軍第一次侵寇上海之際，×××便揭起反帝國主義與抗日民族主義的旗幟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為止，×××努力向軍隊與民衆作這種宣傳。×××指這階級才得到正確的目的，向軍隊要求貫徹政治思想，×××雖然藉着和紅軍作戰去昂揚軍隊士氣，但後來不得不在秘密里揭起和×××樣的旗幟。

一九三四年，蔣委員長在士官訓練所的講演里，已經解說必須把「掃蕩紅軍」的戰鬪變為準備和日本戰爭了，同時並解釋在第五次剿共戰鬪里，所建設的道路，野壕，防禦，要塞與橋樑等等是準備抗日的防衛建設。那些犧牲的人們，以及消耗的戰費，並不是×××把×××當作犧牲而犧牲的，而是準備「抗日」犧牲的。

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國共兩方的大敵都認為是日本帝國主義，藉此努力去振揚軍隊的士氣，在×翼方面，秘密地把這種精神貫注到軍隊的精神與規律里，並且很注意防備×××的抗日宣傳浸進軍隊里。×翼方面，認為抗日是他們三年間經過一切痛苦的最後目的，雖然在往西北移動之際，離開了和日軍的距離，但他們仍然很認真地認為他們的任務是「攻擊日本帝國主義」，若不這樣，那就會和剿共的××軍的理論：「剿共是準備和日本抗戰的

一部分」一樣，叫人摸不清楚頭腦。

項英率領部下與第七及第十軍的殘餘部隊據守武陵山脈之際，他把軍隊改稱為東南抗日前衛紅軍，雖然名稱變換了，中央軍的追擊並不會緩下去，由一九三五到三六年之間被中央軍十五萬——三十萬包圍起來，東南軍却只有一萬——一萬五千兵力，用各種游擊戰術去補充兵力的損失，並且得到相當數目的步鎗，彈藥，可是到一九三六年中，他們的重要根據地——福建省西部——被破壞了，中央軍又採用封鎖戰術，使紅軍爲了活命，不得不變換戰術

項英曾對我說過：「由於情形不利，我們決定把剩下的兵力散開——由數百人組織小游擊隊，散佈配置在廣汎的地區，這種新組織，使我們必須放棄防守基地的計劃，而我們作戰對象是以能够加以襲擊成功的××軍的小部隊，使用這種戰術，才能維持現在的兵力，雖然由於放棄了作戰基地，以致使物資方面受到極大的變化。

「一九三九年末，我們前面完全是××軍，勢力極爲優秀，我們連休息一刻的功夫都沒有，和中央軍衝突至少在一週間會有一次，我們雖然採用新戰術，希望在有利與相等的條件下去作戰，但這也完全不能辦到，我們必須在深山的森林里睡覺，有二年多，在夜間我不會脫下衣服，穿着靴，就這樣睡下去，部下們也都一樣，那時我穿的是棉軍衣，不久便壞了，不但布色淡褪，連里面棉花也都脫落了。

「食物也不充足，如果民衆不幫助我們，那我們也許會餓死，中央軍把我們和本部的聯絡切斷，許多小游擊部隊，把步鎗都隱匿在農民手里，農民們把他們所得到的少量的米，完全送給我們，我們的農民同盟，往往把××軍的消息與動靜報告我們，並且給我們隱匿地方，使我們能秘密行動，農民不喜歡地主們回來，他們認爲我們如果失敗，就等於地主制度的勝利，以後×××就焚燒，破壞幫助我們的村落。

「我們失却和外部的聯絡，我們變成本能的爲了活命而戰鬥的野蠻人，優秀的指揮人物有許多××，病倒，我

們沒有醫藥，也沒有醫院。彈藥缺乏已極，許多的步鎗都沒有用處了。我們沒有修理軍火的工場，我們不能作出彈藥來，可是我們必須把現在所有的彈藥，節制使用，有時農民會在秘密里拿來一點彈藥給我們，但封鎖更嚴厲起來，這種補救也困難起來。

「我們潛伏在無人的森林里，漸漸，我們知道福建與江西的迷路，知道山林里潛藏的地方。我們有時四五天功夫，什麼都吃不到。可是我們却學到野蠻人一樣敏捷與強壯，有的步鎗竟在樹上過着「樹上的生活」，我們的青年部下，他們上下山那種敏捷的樣子，簡直叫人不能相信。中央軍好幾次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却由於熟習地理，由於農民援助，我們會突開包圍網甚至於事先便避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的消息，我們却没聽到。也不會使我們的情形變化的，西安事變後，××軍的精銳又來討伐我們，由一九三六年末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們以為一時××軍會停止討伐我們，事實却不這樣，他們計劃徹底把殘餘的紅軍殲滅，動員三十師團來進行最後的攻擊，二十五萬××軍編成二百里到三百里的包圍網，來攻擊烏陵山脈。

「剿共軍的包圍網漸漸縮短，他們建設許多新的道路，防塞，要塞，他們讓村民後退。……………
(省略五句)我們的步哨與偵探多被捉去，這使我們的游擊隊員恐怖起來，有的逃走了，有的被捉了去。

「快到一九三七年末了，紅軍的主力對我們一點指令都沒有，朱德毛澤東的消息也很迷茫，其後我們的軍使帶來西安事變與內亂業已停止的消息，我們立即向中央軍發表我們的宣言，表示我們贊成統一戰線，要求他們停止攻擊我們，我們很快樂地服從五月十五日共產黨的宣言。(下略一句)

「五月以後，日軍攻擊廣溝橋了，(中略五句)八月日軍攻擊上海戰線，上海陷落後，×××才和我們交涉，他們顧慮××軍調往揚子江戰線後，我們會利用這機會又侵進江西的。他們承認我們還存在，剿共軍司令官熊式輝

將軍派令代表（中略五句），我們軍隊只贖下五千人左右，步槍不過三千隻，這些贖下的兵士都是身歷百戰的老兵，他們是鍛鍊了的戰士，他們是具有鐵的意志的革命家，在這長期間里，我們清掃出意志薄弱與叛逆的人們，這些健存的兵士，每人都可以在戰鬥上，擔任指揮。

「（上略二句）熊式輝將軍派人送信來要求我去會見他，在這次會見里，我們和熊司令與何應欽訂立了協約，其後由南京的共產黨代表我們交涉把我們改編為政府的軍隊，我自己到陝西去了，在那里學了數月智識，受到許多指命，以後我就任新四軍副司令，回來了。」

項英——這一個由現實把握了人生的男性他相信實用的主戰主義，結論，他說：

「延安的人們都認為我是由死里復活的人物，可是他們並不吃驚，我們革命家都有這種復活的習慣。據說朱德，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差不多都死過十二三次，這在我們並不覺得怎樣難堪。在革命的過程里，我們一部分生命是無敵的，無論怎樣傳說我們「死亡」，中國革命仍然是活着的，只是中國不亡，中國革命不會死滅的。」

（五）人民軍隊

惟有武裝的人民，才是保衛人民，由的要害。

——列 寧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軍侵略南京之後，委員長命令改編江西，福建的共產軍為新四軍，在揚子江下游南北兩岸從事游擊作戰，命令葉挺為總司令，項英為副司令。

使葉挺與項英協力，這也有一段微妙歷史。十一年前，葉挺為國民革命軍里的「鐵軍」——舊四路軍第二十四

師的師長，第二十四師內部有許多黃埔軍官學校出身的勇敢與銳利學生，也是國民黨軍進軍的先鋒隊，當他駐防武漢之際，曾受助項英指揮的工人十餘隻手鎗，他們擔任警戒國共分裂前的漢口治安，葉挺指揮部下的廿四師，和朱德、賀龍以及其他××主義軍隊聯合起來，創辦了紅軍，參加南昌暴動，其後他很失意，擔任指揮廣東自治工作。廣東自治企劃失敗之後，他便隱退軍政兩界，以後便不曾參加國內任何一種內亂糾紛，也許由於這種原因。一九三八年，委員長命令他就任新四軍總司令官，換言之，也許是×××想避免承認×××的完全存在，由於葉挺是黃埔出身，又是一位有名的革命軍人，共產黨很歡迎他指揮新四軍，雖然葉挺並不是共產黨員。

葉挺與項英努力編成抗日軍，這消息由浙江，安徽，湖南，福建，湖北的農民們帶到江西以前的紅色地區，於是許多以前的紅軍，帶着理在地下的步鎗來參加，有的帶着一些金錢與食糧獻給新四軍，當作抗日「獻禮」，數百名從監獄與共產黨反省院釋放的紅色軍人，也回到舊指揮官身邊，帶着鏽了的步鎗，手榴彈，斧頭的少年先鋒隊與老農兵自衛隊也參加來了，淪陷區里還記起憶項英名字的許多學生，工人，也參加進來，好像宋江在梁山泊，號召力很大，江湖之士，率多歸依，大有「四海一家」的氣概。

葉挺與項英，是必須在最短的期間里，組成一個強力的能給日軍以極大損失的軍隊——由葉挺與項英存在的同志部下，以及淪陷區的民衆編成，僅僅經過數週訓練與組織，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新四軍進駐到指定地域，當時裝備與士氣，極爲貧乏，步鎗僅有三千枝，此外大多由民衆獻金購買，二萬名新補充兵，僅不過一半有武器，以前的紅軍全體也包括在內。（下略七句）

新四軍奪回江西，安徽二省的三分之一的地址——人口約在一千九百萬——當敵軍攻陷漢口之際，××軍一半已行後退，日軍占領了都市，道路，鐵路，新四軍却常常把它收復，極得民衆的信任。日軍收買數千盜匪與海賊，另一部分匪賊假借新四軍名義掠劫民衆，新四軍必須解除這一種「偽裝的游擊隊」，或者對他們施以政治教育。必

須先肅清敵軍的「征服地」，可是淪陷區的勢力已經操在日軍手里，地方的紳耆，由日軍援助組織偽地方政權，自然不肯援助新四軍，新四軍又必須打倒這種傀儡組織，由於新四軍沒有軍火工場，醫院，軍用品貯藏倉庫，而農村又處在經濟破產中，常常受到極大的困難。

費孝通博士在他的著書中（註），曾詳述新四軍活動的揚子江下游一帶，農業經濟的破產，看了這本書，就能知道新四軍的活動是如何的不易了。在前文里，我已經詳細提過：「南京附近各縣，在日軍的蹂躪以前，就已經處在農村經濟的難境里，地租既貴，雜捐又多，農產物的價格不穩，利息很高的借貸與負債等等，已使農民們不得不把他們所有的土地拋棄了，絲價的大跌落，使農民最後一縷希望完全破壞了，使小地主，農戶，不能不依借債渡日。」（註：一九三九年，在倫敦出版「中國農民生活，揚子江流域農村生活實態研究。」）

費博士在他的著作里說：在這一帶的地主，紳耆，已經變為必須按照政府任命的地方衙門所要求的規定金額去徵收稅捐的稅吏，農戶們自然是必須把地租與應繳的稅金完全繳納（至於賦課是否正確，農民們是一無所知的），同時，地主們又必須另外繳納特殊的稅金。

這樣，收稅官吏具有警察權，很易於把不能納稅的農民們關在獄里，在冬天，不願進獄的農民們，只有借貸——向放閻王賬——的人，而這種人，又大多是地主兼收稅官吏的人們去納稅，償還之際，本利合計起來，借債六個月本利為四〇〇%，一年為七〇〇%，所以這一帶數百萬農民們都變成普羅階級，關於這種問題，空當於下章里再詳加解釋，總而言之，都是由於紳耆兼地主與收稅官吏的制度，所規定的高率稅制所釀成的。

最初新四軍；是想向農民們表示新四軍的軍紀是「革命的軍紀」，項英說過：「軍紀是組織大眾的基礎，在迅速展開的大眾抗日戰鬥上，軍紀與勝利關係很深。無軍紀便不能得到民眾的友誼，無民眾的友誼，軍隊便不能找出地方的指導人物，無指導地方人物，大眾運動便不能成功。」

組織方法與大無畏的精神及戰術——幾種革命的遺產，該算是新四軍所具有的最大的財產了吧。

「革命軍與職員軍隊不一樣，革命軍並不在於發財，掠劫，升官，而是爲社會的原理而戰。在我們，則是爲擁護我們社會與民族的自由而戰，所以我們的軍官與兵士完全平等，因爲都是爲相同的一種主義而戰鬥，也惟有目的一致的人們，才是真正的同志。戰爭只不過是兩種力量的爭鬥而已，我們由於同志之間，愛情都很深遠，這種愛情較諸我們戰鬥的目的還偉大，所以我們的力量能超過敵軍的力量。」

「我們的軍隊雖然分工合作，却無階級之別，我們的生活完全平等，權力也一致。軍官們並不帶階級的襟章，軍官與兵士都沒有薪餉，只領受食糧與極少的生活費，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都停止領受津貼，大家都知道那一些款項都會使用在我們大眾的福利上，我們軍隊不會腐敗，軍官與兵士之間都沒有秘密。」項英曾經這樣說過。

新四軍的強韌，是由於政治教育制度所產生的，項英說：「戰爭爲政治的延長。」軍隊爲武裝的政治戰鬥而組織起來的，同時又是爲達到政治的目的而組織起來的。政治指導是革命的軍隊的精神與思想及生命，行動的中心，新四軍的軍隊里，在軍官之外，有政治軍官制度，階級相同，中隊以及一切軍隊都有政治部組織——擔任軍隊教育工作與向非戰鬥員宣傳工作。軍事與政治工作由兵士們自己討論決定，一切較重的決定與改革，也先請求兵士們理解與承認，政治軍官還向兵士們教給文學智識，和他們研究分析政治問題，此外並組織教育，宣傳，軍事衛生，士衆組織，娛樂等等各部，在政治軍官指揮之下，還組織兵士俱樂部，舉辦各項運動，比賽，研究，政治討論。總之，在中國軍隊組織里，他們是過着空前絕後的新型的軍隊集團生活。

項英認爲如果革命的軍隊不是人民生活里一部分有機的組織的話，那不會成功的：「軍隊爲民衆的武器，所以軍與人民完全爲一家族，悲喜應完全一致。」在中國現代的國民里也許認爲這是一種腐舊的說法？

可是在中國，是必須再三地使用教育與實踐方法，使民衆相信這種說法是對的。所以這句話可以說是國民軍與

人民軍隊里的新名詞，並且這種名詞，使用得極爲恰當，據我所知道的，只有××黨是最先使用人民軍——人民的軍隊——的名義。

新四軍在組織大眾參加戰爭之際，較諸華北的同志們多所艱苦，在南方並沒有像華北那種晉察冀邊區政府那種抗戰的政治組織，×××並不許×××在揚子江三角洲地帶，從事變更政治與經濟的組織，×××收回一個縣城，×××便馬上使×××部政復活，並沒有人民委員會以及代表的政府，×××軍在華北是沒有後方的基地，×××便不許×××組織這樣基地，自然他們是必須建設醫院，學校，工廠，村落，這樣，他們就必須用自己軍隊去保護自己，只有民衆的愛國精神是×××軍的唯一的軍事基地。

在許多的困難情形之下，新四軍却組織了範圍很大的防衛村落軍隊，軍隊到處都有政治隊與宣傳隊，向民衆宣傳：使民衆相信「防護村莊，並不僅是軍隊的任務，同時也是民衆的任務。」活動的劇瀾用通俗的戲劇形式向民衆宣傳，然後使村落的人民完全總動員，以當地的指導人物爲中心，使他們去指揮自衛團，由新四軍把他們訓練，武裝起來，往往從青年群裏選擇出勇敢而怕死的人們，在游擊戰線上，去指揮小型的游擊戰團，而新四軍從這些勇敢的青年中，得到主力的補充兵，當地的指導人物以及從上海跑到這裏的學生，工人，以前的紅軍老兵們，都得先進新四軍的軍政學校，數百名軍官學生，在這裏受着實地的指揮與組織革命的大衆戰爭的技術，期間雖短，訓練却極猛烈。

「村落總動員」的價值很大，人民在軍隊和敵人戰鬥之間，等於自己也在和敵人戰鬥，軍隊戰勝，也就等於自己戰勝。如果兵士負傷，絕不會被棄置在戰場上，而由民衆的義勇隊把他們搬送到醫院裏，或者把他們隱藏在民衆之家裏，而一般家庭，也不再以爲自己的兒子去當軍是一種無聊的工作了，軍人的光榮比諸職業軍人，比諸農民——那些爲了保護自己的村落與中國的大地而鬥爭的農民們爲高。

農村總動員的目的，是在於使村落里的一切男人，女性，少年們，爲防衛他們的鄉村而戰。年青的女人們，可以擔任宣傳員，教師，保姆，年老的女人擔任製造皮靴，軍服，以及在戰線上他們的子弟娛樂品，對於年老的男人，教給他們向侵來的日軍拋擲手榴彈的方法，對於少年們，則組織他們爲耕作隊，去幫助出征的農民耕種，或者訓練他們去當偵探，協助軍隊擔任軍事工作。一切的戰爭消息由鄉村的自衛委員告訴給村民，並且使他們事先便有臨機處變的組織與準備，婦女，兒童們以及貴重品，牛，雞，豬，都可以先隱藏起來，在隱藏的地方，由軍隊保護他們。

由於新四軍和民衆之間，保持極密切的聯絡，使新四軍在醫療設備上得到最大的成功。一九三八年，華南的紅軍準備和日寇作戰重新編制之際，對於醫療設備極爲缺乏，因爲醫生與護士，在內亂中，大多數都被××，一年後在一九三九年，中國紅十字社醫療隊長羅巴特，與林醫學博士訪問他們之際，曾經說過：「從看護病人這一方來看，他們是清潔，有秩序。」承認新四軍的醫療設備是第三戰區里最爲優秀的。到一九四〇年，新四軍漸漸又組織了中國最爲完備的軍事醫療設備——成立二所醫學學校，十處醫院，八個分院，二十個師部都有救急處，二百個旅部附設醫療隊，三百個連隊部附設救急班（註），這些醫療設備，大半都是由這一帶的大地——那生產米與絲以及自衛軍的大地——所供獻的。

（註：一九四〇年，香港出版「新四軍醫療設施概略報告」。）

從華軍全體來說，在開戰初期醫療設施極爲貧弱——貧弱得占世界第一——完全被潰散，毫無能力的人物所污汙了，因爲中國軍隊里，只把款項支給想去組織醫療部的部長，這種制度却只便宜了部長自己，對於受傷的兵士們，沒有一點用處，和「內亂」期一樣，華軍的參謀部，把看護與救助傷兵的事情，完全委給外人經營的傳道醫院，這種辦法，在戰爭初期中，口寇殘虐的殺戮戰場上的傷兵的行動里，漸漸知道是最不適宜的了。所以其後屢加改

善，在福巴特與林醫學博士指導之下，又組織了紅十字社醫療隊，在×××這一方面，由於在「內亂」中，得不到傳道醫院的幫助，所以對於這種問題，比一切軍隊都先實地的謀求解決的方策。

並且這種組織，也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新四軍醫療部的醫士與女護士，和兵士們一樣，完全都是自動報名加入的。葉挺將軍極為贊成組織醫療設施，第二，委任C·C，沈醫學博士擔任部長——沈博士非惟具有充足的科學智識，同時又是一位具有革命的勇敢與熱情，實現的一位中國現代醫學家。第三，參加新四軍的青年男女，都富有愛國精神與救助軍隊的熱情，並且他們決心以自己的成績為模範，顯示於全中國的一切醫療設施以及醫士與護士，他們贊成生活一律平等，這種醫療設施之所以很快的便發展起來的最後的原因是，由於能從協助的當地民眾里，選擇出能擔任醫士與護士的人物——自然，對於他們是必須經過相當期間的教育與訓練的。

最初，沈博士是和五位醫生，一位女護士開始從事這種工作，不久，南京醫院的一位女醫士與南京護士學校出身的六位女護士，參加進來。不久，從東北跑出來的二位醫士也進來，五位富於看護經驗的女護士——並且是醫學研究所的優秀醫學家——也參加來了，加進的人們漸漸增加，在一九三八年六月新四軍第一次和日寇血戰之際，醫療部人員已有六十人以上，醫療本部的醫院，最初是建設在深山的要塞里，並且把X光線放射機械，研究室，手術室的設施也搬運來，同時在本部附近，設立了移動醫院——備有七十架床，專為受傷較輕的兵士預備的，此外並企劃在前線附近與敵軍後部，在軍隊的保護之下，設置醫院與移動醫院，這些都是中國最新的軍隊醫療設施，別的地方，醫院都距前線較遠，傷兵們必須自己匍伏地在醫院里爬行。

林醫士對我說過：中國登記的醫士，在一萬人中只有二千名是合格的醫士，如果這二千名醫士都到這個軍隊里服務的話，那麼，一千名兵士只能有一位醫士醫治他們。所以，新四軍自己並又建設了醫士養成學校，努力培養醫士人材，學生們都是自願參加的，對於他們，教給怎樣去醫治輕傷的兵士，教給他們對於負傷較重的兵士，應該怎

樣準備把他們搬運到醫院那里，每半年，這個學校便造就了百名左右的這種醫士助手人材，而他們也有在藥袋之外，帶着鎗，和兵士們一同抗戰，在前線上，對於負傷的兵士們，他們講求應急的醫治，或者把倒下的兵士們搬運到安全地帶，這種設備，也是中國軍隊醫療上，最新的辦法。

但爲了使民衆們徹底地了解「人民的軍隊」的意義，不只使兵士們能享受這種充足的，醫療設施的恩惠，同時使民衆也能一樣享受到。這是破天荒的一種政策，醫士與護士們，不論男女，不只爲軍隊服務，並在軍醫指揮下，擔任公共衛生工作，軍隊是依靠民衆而組織的，自然民衆的健康問題是很重要的，他們規定了個人與公共衛生與預防傳染病的簡單規程，對於病人也加以醫治，在新四軍醫院與移動式治療所成立的最初一年內，已經治療了五萬三千名民衆病人，並且大半是免費治療的。

「對於戰線附近的病人，把他們搬運到後方醫院里去，免費使他們進院醫治，對於後方醫院附近的病人，如果是有財產的話，也使他們進院醫治，每天每人收費若干，反之，沒有錢財的人們，完全免費。」（註）

（註：與前書同）

這是從一九四〇年香港出版的「新四軍醫療設施概略報告」書里引用的一段文字，由此可以推測出詳細的情形來了。

在中國，這種辦法——由軍隊設備醫療設施，使那些無知而營養不足的民衆也都能享受到醫治的福惠——樹立了軍隊醫療民衆的記錄，絕不遜色於任何國家。這些從事醫療工作的男女青年們，他們是把生命與健康供獻到這種偉大的工作上，他們所得到的報酬，只不過是民衆與兵士們對他們感謝而已，他們沒有金錢購買外科使用的醫具，他們在軍隊的小工場里去製造鉗子，鋏，和外科使用的小刀。他們也沒有資金去建築時代的房子，他們只有把寺廟與民宅改爲醫院，許多重要用品，都斷絕了來源，他們在自己成立的工場里去製造代用品，同時他們也成立了製藥

工廠。

新四軍很努力改善他們範圍下的民衆生活，在可能範圍內，軍隊駐防的地方，極力避免由民衆負擔供給軍隊食糧，同時由軍隊里的補助人員去耕作一切的荒地，使荒蕪的土地變爲生產的土地。在農民們的農具與種子，被奪去的地方，或者被稅金，與高利借款所破壞的地方，把這樣地方的土地恢復到生產的土地，並不是一件容易作的事，並且，軍隊與民衆所使用的物品——如農具，布，洋火，紙，印刷用品，建築材料等，都很缺乏。

爲了打破這種狀態，新四軍組織了合作社，由淪陷區秘密地把輕性機械與機器輸運過來——自然經過很大的困難。於是，新四軍自己建設了軍火機械工廠與移動式的兵器廠，能够製造地雷，鎗彈，手榴彈，迫擊砲，刺刀，大刀。合作社設立了印刷工廠。新四軍教給農民手紡織績，由當地生產的棉花，大麻，苧麻，織成粗布。不久，新四軍向中國工業合作社要求把流浪到這地帶的難民，組織起來，使難民完全從事生產工作。（註）

（註：××××拒絕援助游擊地區的工業合作社資金，但在一部華僑與一部美國人援助之下，爲新四軍努力組織「國際工業合作中心地」。）

不過，軍隊的存在價值是在於獲得軍事的结果上，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軍事報告中，（註）已經證明了正式作戰與運動戰的差別，歐羅巴的速決電擊戰與東亞的長期抗戰（開始雖晚，却是長期戰）的差別。

值得吃驚的事情，第一是，在十三個月里，新四軍在戰線上，和敵軍戰鬥了五百三十次，每一次的戰鬥，沒有參加的兵士在百人以上的，並且每一次的戰鬥，都沒有太重大的必然性，可是，在不斷的戰鬥之下，其結果是對於游擊隊的，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一九三八年，平均起來說，新四軍和日寇戰鬥每天都有，在一九三九年中，每天兩次和日寇血戰。

註：一九三九年，八月號「八路軍軍政雜誌」里「抗戰二年」。

其次，給日寇的打擊雖小，却是不斷的，葉挺將軍曾經推定在一禮拜或每一月里，每天平均都能殺傷日軍三十人左右。第三是，使敵方交通路線受到極大的損害——比敵軍所受到損害爲大。第四是，最爲重要的，新四軍在大衆組織的援助下，防堵了敵軍爲獲得軍事勝利而努力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活動的力量。最後是，新四軍的主力在迅速的運動性下移動變化着，這使日寇不得不防衛戰略的地點，因而使敵軍把大批的軍隊都用在防衛上。

在新四軍不曾推進到揚子江下游地區以前，日寇僅以三個聯隊的兵力，便支配了這地帶的毫無組織與武裝的民衆，但到一九四〇年，便把註屯兵增加到三個師團，在新四軍未進駐以前，這一帶都由傀儡政府與偽警察維持治安，到一九四〇年時候，這種偽警與偽政府，只能在日寇的大刀保護下活動，一九四〇年以前，日本人的小集團可以自由地出入鄉村，到一九四〇年，連走到南京近郊，也都需要嚴密的護衛，僅以南京而言，那時便已擁有七千名的防衛部隊。

在這里，我引用一段新四軍的「勝利編纂」里的文字，這段文字帶着生動的感力與姿態，但爲了方便起見，從幾個項目里，只抽出幾個事實來：

- (1) 第二十旅一大隊，偵探敵軍中，在丹陽攻擊日寇，殺死日寇十二名，虜獲步鎗六枝。
- (2) 第二十旅支部一部，在金壇四方，破壞了八基羅公道與道上的橋，把電話線，電燈線搬走。
- (3) 第二十旅便衣隊，在天王寺附近潛伏，攻擊破壞了敵大汽車，殺傷十二名敵軍，虜獲十二枝步鎗。
- (4) 土民軍小部隊，待伏敵軍，敵軍爲一百五十名，戰鬥四小時，我主力趕到，敵軍不得不退却，是得殺死敵軍五十五名，虜獲五十五枝步鎗。

不過，這種武力攻擊的範圍很受限制，原因是由於軍事委員會給新四軍的援助極少，而又不絕的妨碍新四軍建設自給的經濟地盤，一九三九年，葉挺將軍對我說過：新四軍人數已達四萬，但步鎗却缺乏二萬枝，新四軍一半是用手

榴彈與步鎗武裝起來的，這一部分的新四軍的工作，和帶鎗的兵士一同參加戰鬥，對於戰鬥中戰死以及負傷的兵們，努力注意使它不至於失落到敵軍手里，到一九四〇年九月，新四軍的裝備，步鎗增加到三萬五千枝，機關鎗增加四百六十架，這些軍火，主要是從日寇手里奪來的——這是一種在戰爭時期里，極緩慢却又極具有價值的增加軍火的辦法。到這時期，新四軍的兵力，大體能趕得上中央軍五師團，但××委員會每月只支給補助費十三萬元。數目如此之微，兵員却如此之大，可知新四軍的存在與成長，都依靠於民衆的援助。假如無黨無派的中國紅十字社醫療隊與中國保衛隊，不贈給或援助新四軍以大批藥品與醫療器具以及若干技術指導的話，則新四軍的負擔，將更巨大沉重了吧。

我們提及西北的八路軍之際，是必須涉及到新四軍，把兩者的戰術與戰略相對的比較一下，就會詳細知道兩者之間所收到的軍事成績了，如果新四軍能够活用重要的中央軍的軍事基地的資源，如果能把組織的數千名民衆更行武裝起，撥給資金，把勢力擴大到別的地帶的話，則他們將能更收獲一些偉大的勝利吧。

(六) 戰時的香港

日本若不代替東洋人，把英國的鐵的面皮剝破，則東亞和平，將永不能實現的。

——安藤提督

一九三八年十月末尾，漢口失陷了——由於廣東失陷，影響到漢口失陷，日期稍爲快一點，但反正如一般人所預想的失陷了，現在已無需再回想造成這一個不幸的悲劇的原因，因爲有好幾位優秀的觀察者，已經提到了。（註）中國這一方面，在漢口陷落前，認爲漢口是不會陷落的，這其間所包括的極爲深奧的意義是：——據日本知道

使日寇占領了那一個中國都市，也不能發現出戰。完畢的「決定點」來。

（註：弗蘭，利圭。「特殊戰」，1，普修溫著：「人民之戰」一九三九年，倫敦版）

漢口陷落的狼狽情形，等於中國在其他各處所演出的敗戰悲劇的再演。在拋棄之前，由於沒有把工場，技術工人組織起來的組織，以致不能把工廠與工人撤退到內地，其次便是，敵軍可以利用這兩個都市——廣東與漢口——當作敵方的軍事基地，中國軍在撤退之前，並沒有努力阻礙使這兩個都市被日寇利用，漢口與武昌並不會實行「焦土戰術」，只不過焚燒了一部分而已，在這種優柔寡斷的態度下，以致使遺棄的資源與工廠，被日寇利用為向中國內地進攻的工具，在其日，中國當局曾痛感到這種失算。

漢口陷落後月餘，我在珠江——廣東貿易的出口——江口的高台——英國領土的岩上，設立了通信本部，這是一個充滿了琉璃色的殖民地，好像維脫利亞的風景，完全是一個奇異的超現實的世界。每回當我從內地回到這里，每回我都受到一種刺激。自然多半是一些毫無對比價值的事情，例如，歐美人，在某一旅館里，午飯前，爲了刺激食欲，在一小時內所喝的酒精性飲料，其代價可以救活漢口路上將要餓死的數百名中國難民的生命。

如果把每天晚上，在繁華的廣東飯店里，中國富人們所浪費的金錢，用在軍隊里的話，則數千名被傷寒與馬熱病倒的中國兵士們，可以用這筆款購買到能够使他們健康完全恢復的藥品。

距今一世紀前，外國鬼子與他的商品——那時主要的是鴉片——被中國從海岸排斥出去，以致引起一次戰爭，中國是敗了，中國把香港當作「戰勝紀念品」贈給英國。在一世紀後的今日——一九四〇年，在香港與對岸大陸的一條租界地——九龍兩地，英國的投資約達一億磅以上，可以說這是英國在中國沿岸最後一處安全的地帶，在平日就很有利於英國，在這一次戰爭中，簡直達到沸點了，在廣東陷落前，中國的軍用品大半都由香港輸進來，黃金水一樣地往香港流進，廣東陷落以後，仍然從法印與沿海岸較小的港灣與中國內地交易，這使香港更熱鬧起來，可

是只一方，很「公正」的，把很多的軍用品，由香港輸送給日本。

住在香港的英國商人，他們對於中國抗戰，和達爾文街的路人一樣，完全站在傍觀地位。雖然爲了生活，他們必須依靠於香港的中國人。對中國貿易上面，但無論怎樣，使人感到他們是「穿錯了靴。」日寇占領的並不是香港，而是中國大陸，他們也有憤慨中國的長期抗戰，因爲中國長期抗戰會妨礙他們恢復貿易，他們認爲中國若能立刻在日寇面前投降，則香港貿易會立刻恢復起來的。其中，許多人都夢想日本和他的以前同盟國——英吉利——恢復魯交，兩國一同「開發」中國，使他們發財致富，他們是睡在這種「發昏章第十一」的「政治迷夢」里，他們絲毫不會知道在過去的十幾年內，中日兩國是怎樣的互相摩擦與刺激。

自然，從鮑爾溫內閣與張伯倫內閣，英國對華政策完全站在一條線上，張伯倫首相不明白侵略國的利害是一致的，同時不相信歐洲與亞洲的樞軸國、會實現出樞軸聯盟。有一位英國銀行家，地位很大，並且和張伯倫首相的見解不同，當他乘飛機由倫敦飛返香港之際，曾經從內心露出他的嘆息，他曾對我說過，一九三九年春季，曾在張伯倫內閣時代當過閣員的蕭沙蒙卿曾談及香港，這位銀行家曾經用最大的努力，使蕭沙蒙卿注意穩定與擴張中國財政問題，以此爲防衛英國的政策。

「我曾經爲使對方徹底理解我的見解起見，我引用一個比較簡單的事例來作譬喻，這事例就是如果日本打敗了中國的話，歐洲方面一旦發生戰爭之際，英國，法國，荷蘭各國，由於距離東亞較遠，完全不能干涉與顧及了，那時，防衛香港，防護新嘉坡，云云完全不能辦得到，另一個問題是，如果以借款形式，向中國投資一千萬磅的話，那會比用一億磅的經費去增強新嘉坡艦隊還有力。

「蕭沙蒙卿以爲我所主張的「中國是英國的外廓防禦線」是一種奇異的說法，他說東亞的戰爭，結果日本一定會獲利的，爲此，英國應在可能範圍內，保持紳士的溫和態度，應合情勢保護自己的權益。此外他說：中國距英國

這，我們只同情中國，同情以外，不能再幫助中國什麼，日本的侵略與中國的抗戰完全是一種罪惡的事實。這種事情也是很自然的，大約你也許明白這種道理吧，就是——強者正在勇敢的往前走。」

自然，在英國人中，也有另一種進步的人物，他們很正確的明白中國抗戰的意義與世界戰爭，具有很深的關係，他們從各方面——醫療，救濟，來援助中國，此外，香港政府救濟數千數萬的香港中國難民，比上海救濟更為周到與充足，香港總督蕭芬，歐斯德——一位善良的英國人，曾經和他的部下某人，警告過英國政府，說是日本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漸漸已經露骨的現出侵略英國的面目來了。可是英國政府對於這種警告，毫不曾放在心里，可惜我不曾會見過這一位献身於民主，自由，具有人類愛的「香港的牧師」——總督。但他擔任十個人的工作，以香港為自己的立場組織援助中國的團體，可是，英國的「優秀人物們」認為援助中國是等於破壞英國，這種思想曾經長期的支配英國的政治，另一種比較積極一些，關心中國的英人們，他們又被視為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一黨。

另一方面，香港的英國人，他們只看見了香港的中國人，而不會看見中國實際情形，他們把中國人的愛國心看得太低，這一點也不怪他們，當日寇炸彈與砲彈落到中國，許多富足的中國人，地主，商人，官吏的妻妾，帶着不正當的財產都跑進香港來，他們相信，他們的財產會受「英國的獅子」保護，他們願意坐守在香港，夢想着：等到戰爭結束，再把資金拿出來，投資在「重建」中國經濟上，這樣又可以致富了。

按照銀行家的計算，遊避到香港的中國資本，在六億元以上，另一方面，逃避在上海的遊資，約在二十億元，視察美國的銀行使節團里一位中國人，曾對我說過，在一九四〇年，中國現金約九千萬美元逃避到美國，中國却不能沒收這些資金，因為這些資金都是由外國銀行——半殖民地的中國政府，沒有權力管理外國銀行——逃避到國外去的，但如果政府的大官要人與他們的妻妾以及另一部分人們，在外國匯兌上不投機的話，則中央政府也許能夠想出具有效力的對策來的吧。

香港的中國人一共一百五十萬，分爲兩種，一種是生活此地，經過三四代的演變，自以爲是「香港人」，另一種是一時暫住的難民，移民以及香港政府命令撤出香港的人們，生在殖民地的中國人，大半都不曾到中國住過，他們的英文與英語比華文華語還流俐，他們以英國人的習慣爲習慣。

一部富足的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他們中心於英國並且供獻很多，由英國給他們叙勳，或者授與勳章，這一類人集合在一塊，形成了農村的貴族階級，以這一個階級爲中心，附帶着好幾個團體，他們努力彷彿中流的英人階級的生活，其中有的在以前經營鴉片買賣，現在已經開着大商店，有的變成了銀行資本家，有的經營「灣仔」（註）買賣，這一類的子女們，都進英國大學預科學校，他們努力於划船比賽，開同窗會，玩避暑勾當，他們都歸屬於英國的王冠之下，並且都覺得很滿足。

日本人極爲嫉妬英國的這種殖民地政策，他們很明白從朝鮮，東北，中國的日本的附屬民家里不能產生出這樣的「忠心」人物，但只要能從英國各大銀行里，把逃避的資金等等完全搶到自己的手裏的話，則日本可以馬上暴富。可是，日本帝國主義有一個缺點，就是日本金融資本尙未成熟，不能使中國社會的一切階級有所信靠的擔保，英國的帝國主義是與殖民地的布爾喬亞階級提携着，英國的法律與命令完全具有効力，爲此，英國不論在印度，香港，以及其他各殖民地，都能使各處的布爾喬亞完全信任。日本却不然，日本必須在征服的同時，就需要得到報酬，也就必須毫無分別的把征服地的一切階級的財富，完全掠奪過來。結果，不能把買辦與地主的階級財富，完全和戰勝品分別起來，又不能從土地與改革稅制上去獲得大眾的援助，日本帝國內的一切投資，都是短期的投資，大多數都是在生產前，就必須收回來的投資。

日本若想從中國的資產階級里得到圓滿的合作，只有一條辦法，就是掃除西歐帝國主義在東亞的勢力，也只有這種方法，能够緩和日本對於中國的壓迫，日本必須在東亞，創造出拿其斯壓迫猶太人那種事實，這種事實已經被

介國指摘出來，日本最先攻擊英國在東亞的勢力，那是由於日本認爲英國的力量非常弱小。

日本斥英計劃，漸漸都由事實上實現了，香港與倫敦對於日本，自此時起始，也充分的認識了，英國也明白爲了自己的將來，爲了自由，獨立，民主的中國打算，必須和中國聯合起來。但這種理解，是在中國經過二年日本的急降下轟炸與無盡的屠殺——這種行爲現在已經擴張到歐羅巴了——才被英國人發現的。

在香港，有一次，我和三位醫士一塊到外邊去吃飯——他們是從迢迢的歐洲而來，自願在中國軍醫療部服務的人們——他們是優秀的外科醫士，並不是政治家，他們生長在歐洲——他們是革命家，國際主義者，如果他們住在本國，那他們即便不是被國家徵用爲和法西斯戰爭的戰士，那他們一定會參加到慈善的團體里去，他們相信爲爭自由與人類愛情，而到中國來參加國際鬥爭，他們自己都具有充足的信念。

其中有一位，曾經參加過二十年來一切的革命，而這些革命都失敗了——例如：匈牙利，奧斯托利亞，德國，西班牙革命，他都參加過，他說：

「不論那一次，我都站在失敗這一方面，無限的失敗，真太單調呀！」他露着半是滑稽，半是虛謙的樣子看着我：

「我想問你一句話，並不太複雜，希望你能忠實的用一段言語來回答我，就是：這一次我能否站在勝利國這一方面？」

我思維了一會就答道：「在這一次戰爭里，雖說是中國在一切戰鬥上是敗北了，但中國始終是站在勝利這一方面，你希望我能忠實地回答你，這就是回答——敗北的會勝利，而勝利的會敗北。」

我認爲這一句話是一句金句，敗北的會收拾勝者，勝利的却會哭泣。

不過，這畢竟是可能麼？是事實麼？我始終覺得可疑，如果歷史能翻轉一下的話，那麼這種事實會出現的。我

覺得我是被香港的生活，把我的心理弄得懷疑主義者。·我應該再往中國內地去接觸中國的現實。

(一) 日光與炸彈

人類是創造戰爭的重要因素，即使到了在四十八小時內，把擁有百萬人口的都市炸燬的時代，這種定理也不能否定的。

——荷希，米亞將軍

桂林號航空機，自從在廣東附近被日機擊墜後，中國航空公司便把香港起飛的時間改為在夜間，每週約有一兩次，在夜中二時——三時之間，秘密的起飛，黎明時候便飛抵重慶，是搭乘美國飛行士操駕的達克拉斯號飛機，自香港起程，由上海溯揚子江，在黎明時候，飛抵揚子江上游一五〇〇哩的重慶。

「四川」是表示着擁有四條河的意思，中國第二個大省，人口最多，我到重慶旅行，這還是第一次，重慶是四千二百年以來的古都所在地，但在中央政府把重慶選為戰時首都，却是世界上選定首都最晚的一個地方，幾條亞細亞洲的大河流，從東部西藏國境流到四川，其中嘉陵江與揚子江在重慶的堅岩下合在一流，戰前當貿易未被封閉之際，河里螺集着帆船與小火輪船，橫過危險的急流與山峽，把豐富的四川平原的物產，由揚子江輸往漢口，上海。

一九三九年初夏，當我訪問到重慶之際，那時的重慶充滿了濕熱，不清潔，混亂。遷都到重慶的中央政府，是趁着在「空襲」的時間外，領導重慶向秩序與建設這兩方走。這一個中世紀的都市，完全是一個無計劃地向四方擴張的都市，平日人口約五十萬——現在已減少到十萬左右，並且還繼續在減少中，照在黃色的揚子江的月色，也失却了光輝，交通機關比農村更為落伍，沒有電車，洋車——由這一條街拉到另一條街，也得費二點鐘功夫。

樓房殘架物一帶，在五，六兩月中，被野蠻的日寇空襲，破壞殆盡，市民死亡約在四千名以上，而在現在，每

當天晴的時候，日機轟炸仍然不絕。日機是選擇「月明之夜」爲「訪問」重慶的時間，只要由漢口基地起飛，溯揚子江飛抵嘉陵江合流的地方的話，戰時首都——重慶——無論如何也失却管制燈火的効用了。

我是和紐約通訊員達弟以及他的夫人培基——她才從上海來，並且立即嘗受到空襲滋味，住在一塊。住所是在市街中心地帶，是一所小房子，房子附近山谷之下有一個別莊——是兵營與軍火倉庫。但我們認爲這是最合適的地方，因爲日寇飛機所拋下的炸彈，很少有打中軍事關係的地方。

雖然極力的在掘着公共防空壕，但仍然不能把剩餘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完全收容起來，總之，防空設施不足。當發出空襲警報之際，政府官吏們事前便得到通知，於是他們坐電車往市外馳去——先是各部長，其次是中級公務員，再其次是小公務員，普通市民是在最後，當市民們看見他們的一排電車往西疾馳之際，便知道又是空襲了，於是他們也蜂擁地往市外避難，洋車，大車，以及發狂似的人們攜帶着一切東西，好像大風似的往市外逃避。

由於達弟有一張待避票，我得到附近一所避難所里的一間屋子——這個避難所是附近住民所共有，厚達三十呎，極爲堅固。——我常常在這里，每回當聽到警報，我們就得在黑暗以及煩人的沉默里，和二百多個中國人，一同避難二三點鐘。有一次，一枚炸彈落到這個避難所，躲避在門口的六個人都被炸死，而我們也陷於不能呼吸的危境里，我們覺得這還不如往外邊走，去親自看一看那一枚炸彈上邊寫着「是贈給你的」，試一試自己的運命，於是，我從甲邊爬出來了。

有一下晚上——「繼續轟炸」終止後的一天晚上，達弟夫婦被鄧穎超與葉劍英請去吃飯，可是不論是誰，都疲倦在睡眠不足的神情里，連說話也都很懶。吃完飯，他們很快的散了，他們想回到自己的防空壕里去，夜半又發出第一次警報，那時我們已死一樣的睡下去了。

「只這一次，不必避難了吧。」我對達弟說。按照我的計算，平均在二千二百二十一枚炸彈中，僅有一枚能打

中人，事實，我的計算完全錯了，我們打算在谷灣上，呼吸着新鮮的空氣，如果炸彈落到附近的話，那時我們再用全速力往避難壕里跑，可是培基不贊成我的說法，沒法子，只有聽她的話，隨她走出街上，在發出第二次警報前，正好我們已經躲進避難所里了。

「女性的敏感」是證實了，避難所里發生了很大的震動，毫無可疑，是數枚炸彈打在附近的地方了，在解除空襲警報後，我們出去看看，我們避難所近邊的大建築物完全被炸彈炸壞，街里的樓房建築地帶，包圍在火窟里，我們急忙往我們的別莊里跑，途中，我們經過一塊石階，已經被未炸的炸彈打壞了——如果這次不避進壕里的話，我是打算坐在這個石階上渡過這一次空襲。

走了數百碼，進了達弟院里，網球場有一部份被打成粉屑，屋子也完全破壞了，炸彈正打在厨房里，由廚房轉進寫字室，這樣的損害，却是美國所製造的機械，（十分中有八九分）以及由美國供給日本的揮發油操縱的日本飛機所償給我們的，想到日本是由美國的廢鐵與鋼鐵製造的炸彈來打我們的美國人中國住宅。對於故國的美國人，我們真覺到有一種痛快而親密的感覺。

培基女士認為不該完全絕望，於是她在黑暗中到處發掘起來，不久便掘出幾個玻璃器具，並且藏着食糧的穴藏，毫未受到損失，這使我們暫時感到極大喜悅。不久，久美國報社的記者都來了，使我們不得不把穴藏的食品與飲料完全給他們吃，日機轟炸一直繼續到早晨，這所住宅完全毀壞了，這幾位記者們把紀念品都裝滿了懷里，然後才告辭。

達弟與培基以及我，這三個把破壞的東西收集在一塊的時候，以前賣油的小販按照時刻又來了，他從破牆往里一看，照舊向我們：「今天要油麼？」我們拒絕了，他就背起擔子，既不驚訝，也沒說什麼，蹣跚地走了。也許他對於一二八的得失，已經習慣了。我以為他就是看見我們已經變成死人，他也不曾發生特別感觸的。

幸而我們在航空醫院找到了房子，這醫院好像是專為醫治病人而建設的，毫無防空設備，但現在已經變為迎賓館了，我們想大睡一覺，可是不能入睡，工人在樓下用炸藥去開鑿壕，在一定的時間內，裝填的炸藥就炸裂起來，這使我們感到一種家庭的情緒，這種工作一直幹到夜半，我們才想睡覺，「日匪」又空襲來了。

完全像作夢里一樣，我們到比利時大使館去，代理大使M，迭山氏領我們到他的防空壕里去避難——他的防空壕建設在河岸的自己的房屋之下，並不很深，要是大型炸彈打中的話，很容易便毀壞的。

我們聽到發動機那種純重的旋轉聲音，我們才跑進防空壕里去，便聽到空氣在震動着那種使人心臟俱寒的炸彈，在未落到地上，在空中響着的嘶——嘶——的聲音，我們聽到好幾個炸彈炸裂的聲音，我們受到很大的衝擊——好像把我們都打倒似的衝擊，在防空壕里聽到炸彈的嘶——嘶——的叫聲，反比在壕外聽見的更使人感到恐怖，因為若在外邊，能夠判斷出危險與否，反之，在地下便不能看見，只能耽心的在苦待着。使人相信自己像是裝在罐頭里。

一串炸彈落到河沿上，有兩三棵炸裂性很大的炸彈打在大使館門前石階下，我們從防空壕走出來去視察這一次空襲的結果，迭山的房子，完全碎成瓦礫。四周附近區域的房屋，也都被炸毀，幾輛電車被炸得東倒西歪，變成廢鐵，空氣充滿了熱與塵土，月光映照着好幾位年青的兵士，由於受到炸彈的衝擊死亡的屍體，使人看見感到無限的悲惜與痛恨，而他們在死亡的一刹那，他們的骨與血，好像完全從肉體被壓了出去似的，已經是只見人形，而失却人類的肉體的完整了。

「喂呀！喂呀！」我聽到迭山氏的喊聲，迭山氏拿着木棒指揮着大使館的衛兵，他向衛兵們說話，他說話的話，衛兵們並不懂得，正在這時候，石階之下，有一隊騎兵來到，迭山氏發狂似的一邊說着連騎兵們都不懂得的話，一邊拉着兵士們往瓦礫堆里跑，我跟他後邊走過垃圾堆成的小山，月光在照射着，火藥味與死體的臭味，使人嗅覺

生變化，委員長統帥的衛兵司令奧爾塞透尼斯大尉，不知道從那兒來到這裏，他站在瓦礫中的穴窖里，努力用木棒去撥開幾個岩石。

「好幾個人，埋在這里啊！」他喊着。迭山領着騎兵們來了，大家一齊把木頭，岩石撥開，我看不見什麼，迭尼斯却說他聽到地底下有人的叫聲，經過幾分鐘後，終於發現了一個人的背部，這個人的頭部夾在一塊板石當中，還得更細心往下掘五分鐘功夫，才能把他的身體掘出來。這個犧牲的人是一位少年，他的意識還清明，他說那邊還有人埋着。原來是一顆五百磅重的炸彈，正打中這個防空壕上，如果迭尼斯不曾聽到他們在地里的呻吟聲音的話，那他們只有埋葬在那里了，救護的人夫們也來了，他們努力往下發掘。

然而，最不幸的悲劇，是在此後，在距離市內較遠的郊外地方所發生的，有一群人走過墓地之際，一隊日寇飛機低空的飛來，民衆們很怕機關鎗掃射他們，都跑進埋有死人的空墓里去避難。大約日機上的炸彈並沒有完全拋下，毫無價值與目的的，把墓地當作地下炸彈的目標，結果，避難在墓地的人們，都死亡在墓地上。

達弟君很幸運，不論是那一次空襲，都在千鈞一髮里得到救星，我好像聖經「約翰書」里的主角一樣，竟把不幸帶給他。到重慶的第二天，便遇見一件奇怪的事情，使我完全相信我是一位專門把不幸帶給他的一個人，事情是這樣，某一天午後，我出門去了，我把一條才換下的洋服短褲放在沙發上，在沙發與窗戶中間有一個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個玻璃瓶，午後的日光射在玻璃瓶上，由玻璃瓶集中了光線的中心，正照對在我的短褲上，短褲燃燒起來了，在這時候，才到重慶的一位外國友人，訪問我來，進到屋里一看，短褲與沙發已經燃燒起來，幾乎波及到小桌上，由這位友人把火撲滅，如果再晚幾分鐘的話，那我們必須都跑到街上去，因為這一所木製的洋房，會僅在十分鐘間里，便燒壞的。幸而逢凶化吉，以後，一直到這一次被炸彈打中，完全毀壞為止，這所洋樓總沒有什麼事故發生。以實際說起，重慶並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完全是一個被消耗的地方，也不是完全都在千鈞一髮下，得到救

星，住在重慶的市民，都完全超越了日寇的一切空襲所帶來的噩運，市民全體的士氣與鬥魂，隨着時間的延長，都昂奮振作起來，這一個中國戰時的首都，受到日寇飛機數十次的侵襲，受到數萬磅高等炸彈與燒夷彈的洗劫，可是，却不會使重慶市民發生出精神上的頹廢情緒。

日寇在一九三九年五月，開始第一次空襲重慶。那時重慶特有的冬天的霧與雲已經消失，約能够看到市內各處情形。並且那時還是中國前途希望最薄弱的時候。——那時，重慶毫無防空設備，只有幾架高射砲而已。

那時從國際方面的情形來看，中國的前途，也很暗淡，美國並不會停止輸給日寇軍用品。

由英國駐東京大使羅巴，克雷基與日本交涉的極東會議，據說張伯倫首相也答應了，重慶又計劃轉移中央政府，許多人們的生命都在不安起來，軟弱的人們中，瀰漫了「和平交涉」的空氣，公務員中，有許多被誤會是與汪精衛串通消息。

整整三天，重慶是處在日寇空軍絕於世界的——並且毫無悲憫的強烈轟炸之下，這是四川省所嘗受到的最初的轟炸，許多重慶市民還不知道炸彈的威力，並且輕視空襲的危險，竟致仰天眺望着，及至全市十二分之一的地面，整整被燒夷彈燃燒起火之際，許多的市民，不是死在街上，便死在火窟里。炸彈大半都在繁華的商業地區炸裂，商人與士人們都跑進附近的商店與大樓里去避難，而這些商店與大樓，完全像甜瓜一樣都被炸彈打壞，五十萬市民逃走了，商業停止了，全市各機關都破壞了——中央政府開始計劃把政府往西方遷移，正在計劃期中，日寇飛機忽然停止侵襲重慶，因為日寇以為「已把重慶完全摧毀了，」正像日寇嘗占領南京城後，便認為「已經把華軍完全殲滅了」一樣。

就在這期間里——日寇忽然停止空襲重慶的期間內，重慶重新組織了防空設備，在山岩下，穿鑿了數百處新的避難所與防空壕，組織了救助隊，掃除隊，在人口稠密地帶開築了防火道路，政府與官廳以及總司令部都搬到郊外

，散佈在廣闊的雲帶，當飛機行到北方，經過兩當日頭，回到重慶一看，這時，重慶已經變成世界無比的安全的戰時首都了。高出河床的峭岩上，到處都建設着防護的炸彈所不能打到那樣深的避難所。俗語說過——悲劇在最初才能發生。不過，中國民族的特性是：若不處在最為危殆的憂患中，他們是不肯渡橋的。另一方中國人和英國人完全相同，他們，很早的便計劃了應付危險的手段，只是却很少於實行。現在情形就不一樣了，日寇空軍的炸彈，就是能把重慶市內的一切房屋完全摧毀，也不能把中國政治中心地的重慶毀壞的。

不過，當我看見了這種空襲之後，我覺到「空襲電擊戰」的戰術，並不一定是架空與宣傳的，我相信使用這種方法，在某種條件下，總能使政治中心的都市，完全陷於精神的麻木情形中。但這些條件都很苛刻，第一是，目標的都市必須是防空應對與防空施設，都沒有什麼効力，市民心里完全絕望的都市。第二是必須用高等炸彈與燒夷彈一同往都市拋下，使市民由恐懼而失望，由失望而恐懼，精神完全頹廢，爭先逃走。第三，侵襲的飛機，應在都市天空，繼續把航行時間延長，以此使市民肉體疲倦，心理消沈，不至地防碍市民的睡眠，飲食，娛樂。使交通，工業，都市各機關一切停頓起來。

不絕的以恐嚇脅迫，這是征服士氣最重要的因素。只是實踐這種目的，並無需大批飛機。每隔一小時或二小時，只需幾架飛機飛翔在都市上空就可以了。若再在夜間或白日，加上轟炸隊去轟炸的話，就能達到絕頂。這樣的空襲戰術，只要繼續實行到二星期左右，就會把一個防備脆弱的都市毀滅，把市民的戰爭勇氣完全消滅。

不過，這種戰術是必須使用極大的「費用」。所謂「費用」，是必須選擇目的的都市與戰線距離較近的地方——換言之，就是更能由落下軍軍隊與事先便已潛進內部的第五部隊把都市占領，然後大批軍隊能够一鼓作氣衝進來。只有在這種地方，空軍侵襲的戰術才能完全成功。

然而這種目標的都市，在中國是沒有的，非惟重慶距離戰線較遠，即其他被日寇空軍襲擊的都市，也不會具有

這種條件。自開戰到一九四〇年八月，日寇用空軍侵襲中國，其次數達一萬一千次，其中有六千次日寇空襲目的的是鉅。戰線極遠的大後方——這些地方都缺乏軍事目標，日寇只是轟炸普通市民而已。中國民衆受到的生靈與物質的損失雖然不輕，但由於日寇空襲戰略的條件並不完全充足，以致得到相反的効力——像澳洲土人使用的武器一樣，在拋去之後，那種武器會轉過來投到自己身上。反使中國民衆抗戰的意識更爲熾烈燃燒起來，民衆的團結鞏固起來，最後一致覺悟到民衆是必須努力援助國家的長期抗戰政策。

三年左右，日寇使用飛機毫無區別的轟炸非軍事地帶，殺傷無辜的民衆，死亡却不過二十萬人左右，反之，在受過日機轟炸過的一切都市的數百萬民衆的心里，却產生了極強烈的憤怒與憎恨的情感，這種日日的情感，只有親自嘗到轟炸的慘禍的人們——爲了躲避日機的轟炸，匍伏在防空壕里的人們，倒在大地，把鼻子壓在泥土里的人們，或者看見婦女們尋找自己的兒子的頭腦，或者聞到被劫火燒死的學生的屍體臭味的人們，才能明白自己的心裏怎樣湧着仇恨着侵略者的情感。——這可以說是日寇贈給中國統一的偉大禮物了吧。

在日機轟炸下，中國民衆已經決心把破壞的，要再建設起來了，他們懷着怎樣的希望，用什麼工具，實踐他們的決心與計劃呢？請看下一節吧。

(二) 自由中國的基礎

日本使中國往新的中國，將來的中國走，——其方向是往西走。

W, H, T 那爾

這一次亞細亞的烽火，「把中國智識份子驅逐到西部去，4. 可以說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在抗戰的中國後方地

——未淪陷的地方，痛切的需要技術人材之際，便產生了這種智識人的「移動」，中國而從這一次抗戰的政策上來說，政府是努力開發西部中國，却忽視了東部中國的存在價值。事實從各方面來看，都以為「東部中國已經淪陷了，無需用金錢等物去接濟。」

但如果這句話是實在的話：——「假定歷史是急激的飛躍的，英雄們順着方向前進的，那時就能產生很小的却毫無破壞的作用的變化來。」那麼，中國往西部回歸，該胚胎着很重要的意義，而留存在歷史上了。歐亞兩洲在過去都會產生很多的災禍，現在回想起來，那些災禍都是刺激以後發展的主因，這一次抗戰也與此相似，很顯然已經催促中國社會，產生了新的「脈動」，東部中國的淪陷，西部中國的開發與往現代方面行進，可以說這是在中國最近十餘年間里，最偉大的革命的變化了。

為什麼中國在現在才開始開發中國自己的西部？原因很多，並且也很複雜，在這里，略舉其二三個理由。

第一，現在一般稱呼的「中國」其大部份，是最奮的中國，人種學與中國文化人研究漢民族的起原，都以為中國文明的故鄉是在西北中國——大約是渭水上流地帶，其後為漢水與黃河流域，而產生中國的搖籃地帶，是甘肅，陝西，寧夏，河南等地——這些地方的土地，在以前，並不像現在這樣乾燥。以河川，運河，灌溉為基礎經營着農業經濟，一方向東部中國的平原地帶遷移，往黃河，揚子江流域擴張，一直擴大到豐饒的——雖然多山岳的東南地方。

由海陸和西歐接觸以後，中國現代的貿易與工業，便集中於東部海岸一帶，鐵路與其他交通機關，也以東部中國為中心，中國勞動階級由一向隸屬地主階級而向東部工業中心地域移動，最初，這種移動極其謹慎，以後漸漸地連地主階級也從內地往海岸遷移，他們想把資本運用在開港事業上，但那時，純粹開港的企業家們，完全是各外國的帝國主義的企業家們，而中國內地——西部中國仍然保持着往昔的姿式，並不接近那使東部中國面貌一變的工業

文明，並且違反中央集權勢力，因此，若想把自由中國的生命由都市往內地，由太平洋往中央亞細亞領回去的話，就必須接受一個規模極大的戰爭的打擊。

在日寇尚未用軍事侵略中國以前，西部中國在中國人眼裏還是一個「未知的國土」，即便受過相當教育的中國人士，也以爲西部中國像是亞非利亞洲一樣僻處迢遠，數年前，我曾和羅克博士的探險隊旅行過雲南與緬甸，穿過雲南，由雲南前往緬甸去還需要六週間——四十二日——的旅程，當時雲南省內還沒有汽車道路，我覺得那一次旅行很有價值，因爲我看見了宏壯的未來的中國的邊疆，而在那一次旅行的行程中，不曾碰見任何一個中國人，甚至當我回到海岸地帶的時候，還不曾遇見一個曾經訪問過他的母國的邊疆——壯麗的邊疆的中國智識份子

但西部中國一帶的傳說與傳統以及歷史，也是中國人全體的遺產之一，中國的小學生們也都知道西部中國是他們的神話的故鄉。他們從中國的古典書籍——山海經，知道西部有無頭的男人，胸露孔的男人，巨人與侏儒，有生着羽翼的牡牛，長着人頭的怪蛇……總之，「西北之海」的流砂與荒野的神話，使人們不會忘却的。二千年前中國人就喜歡這種傳說，司馬遷的著書也曾把西部中國情形告訴了中國人，而中國的兒童們，由三國誌的故事，很容易便知道了十七世紀時候，在中國內亂的戰鬥中那一些歷史的河川，山嶽，峽谷，深林。

但一直到現在，中國對於西部中國邊疆一帶所埋藏的資源，還缺乏科學的認識與知識，甚至於不加以關心，外國人知道西部中國的地理較比中國人知道的詳確。及至漢口，廣東失陷之後，有數千名中國人爲了尋求新的故鄉，跋跡穿冬的山河，遷移到西部中國來從事開拓，他們所經過的跋涉，危險，困難，能趕得上十九世紀的美國人民往美國西遷遷移的情形。

「自由中國」一語，在抗戰期間的中國，自然是一句並不十分完整的言語，因爲中國領土，有一部分已經變爲

殖民地，另有一部分完全被敵軍占領，不過這一句話也含着很深的用意，如果我們知道在淪陷區里有幾千平方里是中國游擊軍活動地帶，另外中國還有很大的在軍政支配下的中國地域。那麼，「自由中國」一語，形容得也並不怎樣含糊吧。即便我們忽畧了游擊軍地域，則被封鎖達二千一百五十哩的海岸線內部，那些未被敵軍占領的中國主要地帶，也絕不細微。

從地理上來說，中國——包含着附屬國——領土是四百萬平方哩，比歐羅巴洲合併在一塊遼廣闊。這一塊屬狀的廣大土地，其廣潤有如亞美利加合衆國全領土再加上四分之一的加拿大合併在一塊兒。現在，日本聲稱日本占領的中國領土達百萬平方哩以上——包括東北四省，內蒙古，華北等地，進軍到中國領土達六十五萬平方里其廣大之比例，有如南部亞美利加洲各州——但得除去特基沙斯州。但實際却不然，且寇只不過占領了其中的極小部份而已，「自由中國」的領土（不包括西藏，外蒙古以及游擊軍占領地區）在一九四〇年，廣達二百二十萬平方里——比法蘭西大九倍。

中國人把「自由中國」分爲東南，西南，西北，東南中國爲浙江，福建，廣東各省南方沿海岸各省，以江西爲中心，比美國克羅拉特州大二倍。西南地區爲廣西，雲南，貴州，湖南，四川，西康各省，此西南中國邊疆，接近法印，緬甸，印度，西藏，形成中國全體的邊疆，西南地帶，廣達七十三萬平方哩——比日本本土大五倍，西北中國爲陝西，甘肅，青海各省，廣達六十二萬平方哩。

此外，中國還可再加上西部新疆的中央亞細亞領土，——即中國領土，土爾基斯丹，則中國東部地區領土之廣闊，比拿其以前的德國大約四倍。

住在「自由中國」的中國人口能有多少，誰也不得而知，但若按照不十分完整的統計數字來說的話，則住在日本勢力所不及的「自由中國」的人口，爲二億五千萬名以上，僅以西南地區的人口來說，約爲日本入口的二倍，四

川住民爲五千萬——七千萬，四川人口比日本人全體人口還多，不過，在「自由中國」的各省以及四川省里，還沒有像日本大阪市那樣的現代工業地域。

鐵與煤，在這處女地帶的西部中國的埋藏資源，除了東北以外，該占中國資源的第一位了。西南的煤礦埋藏量，據推測達百三十億噸，四川，西康的鐵礦埋藏量，已調查正確的爲四千萬噸（註）其大部分爲菱鐵礦，鑛質不分好，但雲南還產錫——這在東亞最爲貴重的鑛產，另外還產銅，鉛，水銀，鉛，亞鉛，金，稀金等鑛產。

（註：Wang Shao-hsin 於一九四〇年四月號「新經濟」發表，根據國立地理協會以及其他機關調查之報告，推定中國埋藏鐵礦爲十五億噸（既知量），但非正式發表，四川埋藏量爲一億四千五百萬噸，「自由中國」地區之埋藏量爲二億五千噸。）

在東南，西南地域，埋藏着許多寶貴的鑛物資源，江西的稀金資源極大，加上湖南與廣東的產量，占全世界稀金出產二分之一。而江西並埋藏銅，砒素，煤，水銀，鐵礦等，廣東出產的輕鎳在世界市場上，價值很大，總之，在現在工業上所必需的重要鑛產，中國到處都有出產。

西藏毗近爲西康，西康地下埋藏着煤，鐵，以外還有鉛，銅，亞鉛，金，石膏，輕金，這一類鑛物資源，西北也埋藏很多，據說青海埋藏的金鑛極爲豐富，而特爾基斯丹採金量也漸漸增加，由政府的金鑛採掘的金額，在一九三九年推定爲七十五萬元，特爾基斯丹雖爲沙漠地帶，但地下埋藏很多的煤，鉛，揮發油，硫磺寶石等鑛物。

不過，埋藏的數量，還沒有確實的測定，技術家與地理學家調查意見也不一樣，並且許多地方的調查，僅不過是表面的。例如甘肅發現了火油，政府便鑿起油井，實行範圍較小的採掘，國際聯盟的顧問 A. 斯丹巴博士，在數年前發表了意見：「如果採掘甘肅火油，其質與量將來一定能冠於世界。」但，外國的火油公司的意見却和他相反，隣省陝西，住民發掘含有火油的泥土，用原始的榨油方法精製成火油，裝進革袋里背到街上去賣。共產黨邊區

政府的地理學家，曾經廣泛地進行調查，他們發表陝西油田有四十處，並且都很豐富，但一直到現在，還不曾使用民族資金或外國資金去開掘。

中國缺乏現代的交通手段與工業，因此，雖然國內地下埋藏許多優秀的礦物資源，還不能進行開採，西北與特爾基斯丹尤甚。西南中國的交通機關，發展較快，在政府的「中國工業化」計劃中，四川占有很大的便利，四川雖缺乏重要的礦產，但四川人口，在「自由中國」各省里最多，非惟農業豐饒，並且是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地域，又是建新的公路的集中點，而由水路運輸的費用更較為低廉。

中央政府已經完全支配了四川，銀行家在四川易於受到保護，而個人的資本也較為安穩，政府以四川龐大的口以及豐富的農產與貴重的岩鹽為歲入主要項目，而四川的桐油、植物油、豚毛、皮革等等輸出品，占自由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物品，一九三九年，中國輸出海外的豚毛為二千八百萬元，輸出的桐油為七千三百萬元，桐油由政府統制，輸出美國最多，占對美輸出金額三分之一，由這筆款項，充作重慶由美國購買汽車與機械的用款——一直到英，法把緬甸國境與印度，中國國境封鎖為止。

在中國英勇地對日抗戰之前，西南中國大半是處在自治以及半獨立狀態之下，但現在已經變為中國抗戰的重要基地了。西北各地，實際上也曾獨立過。西南中國的有原始居民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人種分為二十三種，經過數世紀，都住在中國國境內，但決不被中國吸收或同化，在西北廣漠地帶住有一千萬回教徒，還有遊牧的蒙古人，西藏人，土爾其人，現在漸漸與機械時代接觸了，他們只為自己的小數民族的權利打算，並不以為自己是中國人，並且反對中央政府，直接支配他們。

寧夏與甘肅省內幾個地方，是從以前獨立的蒙古王族所轄的地方，其後脫離了。青海與西康，曾經獨立而成為後藏（西藏以前分為前藏，後藏），雲南保持以前獨立的傳統精神，其種族與土地，也是自治的，中央政府必須對

於國內與國境地帶的原住民族注意。務必不至產生出民族與宗教的糾紛。因為他們土地的權利，比中國人更具有悠久的歷史性，如果在「自由中國」里發生了小數民族的反抗鬥爭的時候，那就等於國共又發生內亂，對於中國前途的影響很大。前藏，布丹，內巴爾，亞沙姆，緬甸，法印，暹羅等屬地，以前隸屬於中國，而現在都處在國境地帶，中國與這些領土應該怎樣接近，聯絡，這是一件極有趣味，同時又極為重要的一個問題。日本與歐羅巴的帝國主義國家，封鎖了緬甸國境與法印國境，中國對於這個問題，關懷很重，如果英國不為中國開放的話，中國是否應自己去打開呢？——使用什麼手段去打開呢？是使用帝國主義的手段呢？或使用革命的手段呢？

如果「自由中國」一語，並不值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實際的話，則中國是必須建設一個比較抗戰前更強而有力的合理國家，很多的人們都認為這一次戰爭，把中國從數世紀的孤立中打開，能夠創造成爲亞細亞洲的一等強國——毫無遜於世界任何一個生產國家或消費國家的一等強國。在下一段里解釋一下中國現在的困難問題，樂天主義的人們也應該注意這一些問題才對。不過，在今日，西藏的遊牧民族，也能在一星期內，搭乘飛機飛到香港的今日，若說是「自由中國」是絕對不能實現的話，那誰也不敢斷定的吧。

(三) 貧乏的生產手段

我國爲農業立國，故日本不能使我國屈服

「我國爲農業立國，故日本不能使我國屈服。」這句話我聽過很多，同時又是中國名士們常吐露的口頭禪。正由於中國是農業國，而不是工業國家，以至於使日本很容易便能蹂躪了中國，這確是一件不幸的事實。

朝鮮、東北四省，印度與英領，法領，荷蘭領的一切殖民地，以及在革命前的蘇維埃，都是農業國土，和現在的中國毫無完全相同，這在中國是得不到什麼利益的，非惟如此，反倒引誘起日本侵略中國一舉來。在中國這方面，最得力的是由於空間的廣大，但這不能與遲滯發展的中國工業混合起來說，並且由於中國現在仍然是農業國，所謂「空間」這一種財產，只將由中國利用其一部分，假如中國這種廣大的「空間」財產，能夠完全使用在中國工業經濟的發展上的話，日本將不敢肆行侵畀中國了。

這樣的說法，絕不是一種詭辯的說法，而是具有相當證據的，這證據就是：——現在中國正在努力進行收復失地的一切戰鬥的準備，不論是那一個國家，爲了想在現代戰上，獲得最後的勝利，都把最大的努力用在戰鬥上了。以美國爲例，如果我國——亞美利加合衆國——被敵國侵畀，以致使威爾斯丹，與巴夫菲線以及其他鐵路（美西比河與羅基山脈西部的工業地帶，海軍，商船，公路，車輛也都喪失殆盡。（火油與輸入品也在內），只能依賴加拿大聯結北西各州的一條道路的話，則美國怕不能支持下去了吧。中國情形，正與此相似，抗戰三年了，中國工業百分之九十九，都由於華北各都市以及上海，杭州，無錫，南京，漢口，廣東各市的失陷而半身不隨地麻痺起來，這是實際的情形。

在「自由中國」最感到困難的，是一切都依靠着運輸，這和一切未開發的國家的情形是一樣，在一九四〇年，自由中國全領域的三分之二的地域，所有的公路還不足五萬哩。但在美國，在這相同的面積上的公路——鋪裝了的公路爲五十三萬哩，而自由中國各省的公路，總數的五分之一，是在開始抗戰後才建設的，現在繼續增加着，平均每日能增加七哩左右。重要的是由重慶到特爾基斯丹的三千哩的公路與西部中國聯接緬甸，印度之間——由重慶到拉希的一千六百里的公路。

自從各重要港口失陷之後，中國的軍用以及工業用品，九十%以上都是由這兩條公路，與由法印到廣西的一條

公路，由河內經過疊疊的山嶽到雲南的滇越鐵路而輸送進來的。此外，中國內地的鐵路，若干處還在中國手里——河南的鄭州到陝西的寶雞的隴海線，由湖南衡陽到廣東水口的粵漢線，由江西南昌郊外到浙江省西部的浙贛線。此外還有新設的鐵路，由衡陽到廣西省會桂林，並且延長到貴州省會貴陽。

在同一面積上的鐵路，美國能有十六萬哩，中國則不足八百哩——日本佔領了東北四省與華北後，兩地的鐵路約八千哩，都落到日寇手里。並且這八百哩鐵路，有的還不曾按上鐵軌，在西南中國，現已建設新鐵路線，計劃由揚子江流域連接雲南，緬甸，印度洋，工程進行很快，可是由於英國在遠東採用讓步政策，封鎖了緬甸國境，以致不能將建設鐵路材料輸送過來，因此，建設工程不得不暫行停頓下去。

航空路線，不只香港一處，從印度支那也能運送旅客到中國來，國內也開辦了航空路線，由重慶到各省省會，僅在數小時內，便可達到。一九四〇年又開辦了中蘇航空路線，運送旅客及郵件，先到特爾基斯丹的哈密，由哈密往莫斯科飛運，緬甸航路聯絡到姆比利爾，香港航線與飛越太平洋的克利巴飛機聯絡，僅五天工夫，便能從重慶到「寶島」。坐飛機旅行，在公務員與外國人看來，確是很方便的事情——因為中國內地法幣極賤，飛機票價，如用外國貨幣換算之際，特別低廉。——可是那些沒有地位的以及不能買到飛機票的中國人，他們只能靠着另幾種交通工具，飛機在他們認為什麼也不值得。

普通的中國人，在現在能够坐大汽車旅行了。不過，汽車與大汽車，約九〇%都由政府統制經營，車輛總數，還不到二萬輛左右，（美國登記的汽車為三千萬輛），並且從一九四〇年七月起，在緬甸公路上運載貨物的大汽車——約為二千輛，都移轉到西北的「紅色路線」上了。（由於滇緬公路封鎖。）

中國使用的大汽車都是美國製品，並且都是新式的，運送的貨物，以六種公用物品為先——軍用品，軍除，醫療用品，政府統制管理的貿易品，火油與揮發油，以及工業必需的物品——其後始為其他各種商品，再其後，才

是旅客，公共搭乘的大汽車座席與車票，在幾天以前便被爭購一空，沒有一輛是自己使用的汽車。

中國需要的汽車輛數，該是現在輛數的十倍，這樣才能充分行動在比較以前增加了十倍的公路上。可是現在開駛汽車的揮發油，由於不能輸送進來，如果一輛汽車每天平均行駛一百哩，則開駛一萬輛汽車，一年間需要四千三百萬加侖的揮發油。——等於五億元現金。另外還得準備一億元當作車輪胎以及其他費用，把這一筆款合計算起來，等於中國政府歲出預算的三分之一。由於缺乏油料，汽車輸送工作，大多停頓下去，在內地，燃料比較生命還昂貴，普通的人們如果沒有政府的許可狀，便不能買到汽油——有時往往就是拿着許可狀也不能買到。

補助貧乏的大汽車輸送，另有數千輛騾馬車——用美國製的汽車舊車輪與輪胎，一九四〇年，這種騾馬車一輛的價錢是三千元——車輛與舊輪胎二千五百元，車與騾馬五百元。由於軍隊徵發騾馬，又感到騾馬不足使用，於是洋車也完全動員了。某一次，我曾看見一隊行列很長的商隊，用洋車拉着八分之一噸的棉花，走了五百哩路。數千匹駱駝，驢馬的背上，馱着大量的一切商品，可是人類搬運工具——洋車，比這些動物搬運工具，更為遲頓。

緬甸公路的大汽車，每月運送商品約九千噸，另外用動物運送也有數千噸。滇越鐵路的輸送能力，每月為一萬二千噸，雲南的補助汽車路也能運送二千噸。當南部國境未被封鎖之前，自由中國所有的運輸機關的運輸能力，每月能運送五萬噸物質到內地——衝破海岸一帶的封鎖水城與由戰鬥地域的小道輸送的物質，還不算在其內。（註）如果比較的舉例來說的話，則中國在抗戰前輸送的鋼鐵，每月就超過五千噸，及至各種國境道路被封閉之後，中國就依靠蘇聯的供給路線了。

（註：美國陸軍為供給駐法的一百萬兵士軍用，每月必須輸送七十五噸到法國。）

當政府尚未西遷之前，西部中國完全缺乏生產手段與生產工業，加以從揚子江下流一帶僅把一部工場遷移過來，於是工業發展的速度與輸送工業機械的運輸能力發生的關聯便密切起來了，這已不是整理舊工業的問題，而是在

抗戰過程的混沌里，在不妨礙抗戰的工作下，建設完全新型工業的問題了。

中國工業最爲貧弱的是鋼鐵，重慶屬下各省，並不產生高級鋼鐵，也不產生合於建築與機械使用的優秀鋼鐵，西南也絕無可使用的鋼鐵，而又不能購進，如果輸進外國的原鐵，則僅運費一項便需一筆巨款，並且也不能够用。因此，中國必須自己增產鋼鐵的生產量來解決這個問題。一九四〇年，中國自己產鐵增加到五萬噸，但自由中國每一日產鐵量數，全部不過是六十噸，並且並不全都適宜軍需使用，反之，日本產鐵的數量，每天爲二萬噸，試一比較，相差得實在不輕。

政府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是：開掘西部中國一帶的原鐵資源，使用小型的貝希馬式煉鐵方法，設立煉鐵爐，此後還需要不斷的努力與適宜現有的方法，原來中國生產鋼鐵最困難的原故，在於中國想建設規模宏大的現代製鐵工場，實際中國應該計劃合於中國現實性的，並且適宜國內的體力的中庸性的產鐵辦法。

自由中國雖然得到了能够適合戰時工業所需的鋼鐵生產量，但在將來，如果西康與雲南的鐵礦素質並不良好的話，還不能說是中國鋼鐵業便有希望，因爲中國埋藏在地下的鐵礦，在十二億噸（註）中，七〇％是在東北，已往日本奪去，一九三一年，中國凡是能生產八十％以上的原鐵的礦山，都陷進日寇手里，除了湯揚子江運送到重慶的規模很小的設備之外，其餘抗戰以前的中國所有的煉鐵爐，也完全被日寇占去，規範最大的煉鐵爐——北京附近的龍煙煉鐵廠，也掉在日寇手里，這鐵廠每日能生產三百噸鋼鐵。不過，若是使用游擊戰術的話，很容易便能妨礙日寇使用龍煙的設備與使用察哈爾——（礦石生產地）的礦山的。

（註：可參考上節註文。）

中國工業從海岸地帶，往西部中國「長征」，已經有很多的著作報告過這一個事情了。我覺得大多數的著作里，有許多誤解的地方。由於政府不曾詳細計劃從將能失陷的都市，把工廠轉移，不曾有現實的可能，國內發動起來

進行這件工作，以致使一部分真能明白「必須把規模很大的都市工廠，迅速的轉化為範圍較小的民衆的農村工業」的人們的努力，變成畫餅。一部分官吏的腐敗，無能，愚昧，也是一種原因，同時，中國資本具有一種特別的買辦的性格，而中央政府也不願沒收一切工業以及一切資本，致使中國民族的資本家很少自願往西遷移，只不過有一小部分人們，他們關心，他們想把資本運用在政府開辦新工業基地的事業上，反之，像我已經說過的：數百萬資金，都逃避到海外及租界里去了。

在這里我舉出一例來：——關於中國資本家們是怎樣毫不關心戰時中國內地的企業。（如果能的話，我願著一書，詳細地暴露這些事實。）一位住在香港的中國富豪，——他的家族很大支脈很多。他是國民黨的高級公務員，他的夫人最近有一次曾經要求在政府工業方面工作的一位工業專家——他的工作很重要——辭却他的職務，她想在「上海」建設數處織布工場，請求他去管理。她以為不久就會「和平」，以為把資本運用在列強各國保護的租界里是最安全的事情，以為開辦這種工場的利益很大。——她舉出許多的理由，這位工業專家却拒絕了她的「好意」。可是最滑稽的是，當時這位夫人的丈夫，在內地擔任建設某一種重要工業的責任者。她却不想把她的資本運用在中國軍戰線後方，她不只這樣的計劃着而已，並且現在已經實踐了，像這一類的事實，我知道得很多，如果可能，我倒願意在這里多舉出幾個來。

——結果，移轉到內地去的個人的工場，只不過三百五十四家，這些工廠，如和歐洲工場比較，則只是些規模很小的工場而已，把這些工場合併在一塊的話，機械的總數不過是六萬三千噸，算是等於美國一個大型的鋼鐵工廠。這三百五十多個小工場，也有的是製造機械，雪氣器具，織布，化學的工場，但大半是輕工業工場，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實際在工作着的工場，只不過約二百多家，並且大半又都在四川一省里，十五家工場，在經濟部長翁文灑手里的國家資源委員會管理。

其他的工業，大多都由政府統制，獨占。只有中國工業合作社是例外，在人事與組織上，合作社的性格和其他努力建設的工業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因為合作社不能把中國的布爾喬亞拉到內地里來。政府把煤，鐵，鑛山都直接的收為國有，在甘肅並且經營四處油井，生產漸漸增加起來，四川的煉銅所也是政府所有，在雲南附近，還經營一個煉銅工廠。此外，政府還有新建設的製鉛，亞鉛，錫，機械，無線電，電氣器具，酒精與植物性榨油的各種工廠。此外，還有政府與銀行家以及商民資本合辦的製紙工廠，曹達工場，這些都是冒險的建設，還有一處煉油工場，每天能製出一千加侖揮發油與燃料油，此外還有許多重輕工業的工場都在建設中，不過，必須從各方面克服一切的障礙，這樣才能達到「自給自足」的地步。

建設這些工場，四分之三都是由於軍事方面所要求而計劃的，各工場製造的鋼鐵，銅，都被軍用消費了。另一方面，却產生了日常消費用品缺乏的現象，這一點，雖然不像複雜的消費者不斷的要求消費品的國家那樣可惜，但實際在中國，確已達到某種程度的高潮點了。這自然是一件重要的事實。一九四〇年中，棉布的價格便騰漲到四〇%以上，普通一張手紙也得化二元錢，工業生產品的價格較之農產物品的價格，失却了均衡，亞雷君和贊成設立中國工業合作社的人們的預言，漸漸都變成事實。因為中國的戰時經濟，必須把中國的勞動力——在可能範圍內，完全總動員，以自己國內的資源物品，供國內市場所需，這樣才能維持得住戰時的中國經濟。

雖然重工業將來的希望薄弱，我却從技術方面的人們——特別是技師們方面，發現了他們對於恢復中國工業能力的決心與信心的精神。這一點，和二三者政治方面的敗北主義思想的人們對比一下，確也很不凡。有一次我往西那中國旅行，途中會見一位年青的中國技師，正趕上他才從香港乘飛機飛回——自抗戰以來，他第一次訪問香港——他說：「香港街上的商店，到那都陳列那麼許多的東西，你真叫我艷羨，我買東西竟致買了兩天。」

「那麼，你都買了什麼呢？」我問他。

他從手提包裹取出一個盒子，在我面前啓開：「這是我買的最好的東西。」他笑着露出他的牙齒。盒子里裝着的是一套假牙。

「你自己使用嘛？」

「不！」他認真的答道：「現在我倒不使用這種東西，但幾年之後，也許必須使用，此外如果戰爭不能結束，那我不會再到香港去的。」

這種無限的忍耐精神，已經擴張到軍隊里了，由於抗戰，中國的工業基地狹隘起來，以致軍隊的戰鬥力極受限制，讓我在下一段里使報告中國軍隊的組織吧。實在，中國的工業命運，是依靠軍隊能力而成長，這正和中國軍隊的命運，由軍隊所要求的工業能力而決定是一樣。

(四) 中國軍的主力

余之軍隊，雖能使之屈伏，然不能使其崩潰。

——蔣委員長

在計劃上，行動上，指揮上，中國軍隊雖然有很多缺點，但如果想要判斷中國軍隊，大約馬上會想起中國軍隊最驚人，最重要的一件很簡單的事實來，這事實是：——落伍，貧弱，無力，東京認為「並不是一個國家，而僅是地理上的一個表現」的中國，在西歐人的眼里，也很輕蔑的預言過：在日本機械化兵力之前，僅能抵抗六個月而已，可是，結果又怎樣呢？抗戰四年了，仍然在繼續和日寇血戰中。奧大利亞、捷克、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法蘭西，羅馬尼亞：已經屈伏在敗北的命運里了，而中國仍然還在抗戰。這種事實，是中國人悲慘里的光榮

，雖然西歐各國對於中國命運的預言是否定的——中國自己也有——但中國自己也有一部人也這樣的否定——但中國的統一，是能夠忍受一切危機與打擊中而產生的。在「幾千，幾萬的困難」里，這一次英勇抗戰的新根據地，在數百次的交戰里，在好幾次防衛戰身的要地的大戰鬥里，中國軍都以極巧妙的戰術，使敵軍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一舉把中國軍主力完全殲滅的目的，在和日寇血戰的大小戰鬥里，中國軍並不會遭到像法國軍那種不幸——在一週內，強大的法國軍便被襲擊得完全崩潰。這一條「龍」在一九三七年里，曾經好幾次被打傷了，每次却都忍耐着所受的痛苦，繼續的戰鬥着，終於又飛躍了起來，並且每次當把創傷治好之後，每次都使「日匪」感到這一條「龍」並不能一拳便把它打敗的，中國的工業是絲與竹所構成，發弱的工業，可是，中國軍卻不能在軍事上被敵國擊破，反之，却已經緩慢地，實際地進步起來了。一位優秀的亞美利堅軍事評論家，他曾親自看見過中國軍英勇戰鬥的一切事實，他說：自從抗戰開始以後，中國軍便受到最良好的訓練與良好的武裝以及優秀的指揮。一位蘇聯評論家，視察了悠長的中國前線，回到重慶以後，他所說的意見也完全一樣。這兩個軍事評論家，他們只知道西歐風情的「決戰」戰術，因此，他們自己告白了。他們並不瞭解這一種毫無正式軍事情緒的「決戰」戰略的戰鬥是怎麼一種戰鬥。實際情形正是這樣，中國軍的指揮者，把「決戰」分散起來，認為只要儘日竄得不到「決戰的勝利」，便是中國一部分的勝利。蔣委員長某時曾對我解說過：「日寇最初想在三月內使征服屈伏我國，日寇的目的在於在短期內便得到勝利，而中國却在事實上，使他們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僅這一節，便是我國得到的勝利的一部分。」委員長認為中國的長期抗戰，便等於使日本「儒著」他們的失敗，最後的「總計」，便變成日本的完全敗北。

中國軍的指揮官們計劃的重要的戰畧，像「南盡」一盞模糊的總為中心，省畧了細部，但因此反而強烈有力。——這種戰畧解釋起來，會有不同的意見，但這却没有關係，他們保持着毫不動搖的信念。這種戰畧理論——即「三階段長期戰」的理論，最初由共產黨的指揮者毛澤東氏構成了規式，簡單來說，三階段即為：

一，日本的攻勢期。在這期間，中國在空間是後退，在時間却是前進期。

二，日本的攻勢到西部中國的山嶽地帶，達至最高潮，其後日本戰爭的精力逐漸減少，此時期內，中國仍然繼續總動員，日本停止前進。

三，日本內部與國際間的矛盾達到極端，在此時期內，中國總動員却達到沸點，同時實行總反攻，得到勝利。在這種理論上，空間的測定比時間的測定較為明確，因此，怎樣才能在某一種戰鬥的過程里去決定其階段的分別呢？關於這一點，意見很少一致。當歐洲發生戰爭之際，許多的中國人都相信已經到了「總反攻時期」了。那時我正住在延安，我知道毛澤東的見解與此不同。他認為抗戰只才達到第一階段——「對峙」階段的門口，而蔣委員長的意思也與毛澤東氏相同。他們都相信在總動員還不會完全成功之前，反攻的期間尚為遙遠，這只要把中日兩方直接參加到戰鬥內的兵員數目比較一下，就能明白了。

中國實在數目上比日軍為多，這是事實，不少的中國人都以此為光榮，並且受到較高的估價，在戰爭勃發的時候，中國的常備兵力為二、三萬左右，受過訓練的補充兵力，完全有限，特別是軍官這一方面，在數目上很貧弱，另外還不曾組織學生出身的補充軍，新軍官在開始戰爭後，必須受過訓練，而中央規定的徵兵與訓練制度，進行極為遲緩，在開始抗戰之際，軍隊的指揮官們都用自己的手段與方法去網羅補充兵員，常常有的完全由民間——即地方的義勇兵——去補充。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的人口資源有一點減少，中國總人口的一半，是住在日寇佔有的各省市，這些人口只能由游擊部隊加以動員，在西部中國，能够採用的強健民衆里，約有數百萬是運送，建設鐵路，鑛業農業所必需的，行政院秘書蔣廷黻曾對我說過：和日本軍作戰的中國軍，為二百萬人，此外，後線的人們，都在自由中國的民間與保安隊里工作。

自開戰以來，中國軍在戰場死亡的數目，畢竟有多少呢？誰也不能正確的知道，中國政府和日本一樣，都不發表損失的統計數目。一九四〇年二月，中國軍司令部曾發表過，戰場死亡的中國軍人爲三十六萬二千，傷的爲一百八萬七千名，可是又發表說僅在一九三九年，傷兵六十七萬五千名，受過治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蔣委員長在他的講演中，承認自七七事變以來，中國軍死傷者爲三十萬名，也許這數目發表得還有限吧。假如其後中國軍的損失，平均起來不過以上的數目的話，則這三年間的抗戰中，中國軍的損傷總數，推定該是二一六萬名。外國軍事評論家在一九四〇年曾推算過中國軍損傷爲二百萬至四百萬名。而最可參加戰鬥的軍隊，其損傷確已達百分之，在一九四〇年里，大約二百萬中國軍失却影子，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陳誠將軍說過：——前線的軍隊數目爲二百五十萬名，並且他主張過把一百五十萬體格強壯的男子，施以軍事訓練，如果僅把這數目的一半，當作補充兵而能夠實際的使用的話，則能使前線的軍隊，交換三次，也許有人疑問爲什麼不能把兵力馬上增加到一千萬名呢？這就應該顧及到軍需物品，軍火，運送能力方面了，在現代的戰鬥上，只有規模偉大的工業的力量，才能維持一百萬中央軍的生命力與戰鬥力，而中國工業的貧弱程度，我早就知道了。一九三九年，自由中國只有二處重要的兵器工廠，其中最大的是重慶郊外第二十二兵器廠，每月能製造二百架機關鎗，十二萬顆迫擊砲彈，數目很小的手鎗與步槍。還不能製造出大砲。其他二處兵器場，僅能製造若干各種軍火而已。此外各省立兵器廠，能够製造步鎗彈與步鎗等等，但每天所製出的步鎗鎗彈，其總數還不到數百萬粒吧。這僅能補充二千哩的戰線上所消費的鎗彈而已，爲了武裝較大的兵隊，中國是必須講求一種政策——是馬上便建設許多分散的製造普通軍火的工廠呢？或者使輸進的軍火數量增加起來呢？如果「游擊兵器場」能够組織建設起來的話，則中國也許能把敵軍占領區域的五百萬戰士門充實的武裝起來，可是軍事委員會在許多明顯的理由下，決定以輸進兵器去補充。

由於歐洲發生第二次歐戰，以致使重慶重要的軍火資源——德國，完全被隔斷了。德國雖已和日本訂立了防共

條約，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拿其斯德意志還供給中國軍火，達中國輸進軍火總數六〇%，這倒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輸進的軍火，其半數以上，是由中國傳統的好友又國不絕的供給，對照一下，實堪發噱。蘇聯援華的軍火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日本強迫法國封閉雲南國境以前，大半都由緬甸或印度支那輸進中國，及至英國答應了日本的要求，封閉了緬甸公路之際，中國只餘下一條自由輸送軍火的道路——由蘇聯領特爾其斯丹到中國這一條沙漠道路。

中國購買外國商品的主要借款，是在莫斯科訂立的那一筆借款，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借給中國的信用借款，增加到七億五千萬盧布（一億五千萬美金），蘇聯援華的借款和美國華盛頓的銀行答應的援華借款，性質不一樣，後者僅是援助中國將原料輸出的財政的援助，並且這是為償還美國軍事商品的代價，而不是聖誕老人的贈品，英國也向中國貸款五百萬磅，而這筆款項，只限於中國在某種最困難的時候，才能使用，絕不像重慶與莫斯科之間那樣馬上就拿出的借款。

不過，特爾其斯丹公路，受着自然的極大的限制，比由黑海到緬甸，由緬甸經過陸地達到雲南這一段的距離雖迢遠，却比由亞爾瑪，亞達蘇領的陸路，較為方便，為了補充揮發油，必須使用十五匹駱駝或騾馬去拉每一輛蘇聯供給西比軍火的載重汽車，因此為了經濟起見，只限輸進飛機使用的炸彈與修理蘇聯空軍的用品。

中國的空軍情形怎樣呢？中國飛行機製造是美國三個公司共同出資辦理的，已在緬甸附近的雲南有，建設了一個工廠，並且已經開始工作了，除了發動機，飛機部分用品，飛機輪之外，其他一切飛機機械，都能製造出來，比較中央政府從外國購買飛機，節省了二〇%的費用。而美國出資的人們還可以得到紅利。當英國把中國的「開着的門戶」封閉，這個工場一時停頓下來。現在在蘇聯管理之下，在新疆省建設了一個裝置飛機的工廠，雲南省的航空學校，由美國教官教授學生，西北方面的二三處航空學校，由蘇聯教官教導。不過，中國的空軍戰士，在漢口會戰

完竣之後，傷亡殆盡，現在還有一部分，只是並不擔任重要任務。

現在，中國的戰鬥機，大多都是蘇聯製品，而中國在空戰上得到的勝利，差不多都是蘇聯空軍戰士的力量，一九三九年，蘇聯空軍戰士，在西部中國的成都駐留的人數約一五〇名，成都建設的收容飛機倉庫，能容納六〇〇架飛機，另外還有一五〇架飛機，停在甘肅省的蘭州附近，這些空軍的能力，足以匹敵日本飛行隊五大隊，其目的在於使日本充足的領略蘇聯對於日本的「毫無誠意」的情感。

歐洲發生戰爭之後，蘇聯空軍在中國的活躍，顯出稍為遲鈍的樣子，但中國的抗戰，如果到了決戰的階段的時候，蘇聯會更徹底地幫助中國的。蘇聯的軍人——空軍在內——從軍在中國的約五百名左右，半數在中國各地的軍官學校里執教，教給學生們純粹的戰爭技術與戰術，中國各地軍官學校的學生，共約九萬餘名，此外，蘇聯軍事顧問有的還在中國前線軍隊里活動，蘇聯從事中國的總司令官法爾根哈善將軍，在蔣委員長面前，並無一點勢力，蔣委員長只希望他們擔任軍事指揮工作，對於戰略上面，不希望他們插嘴，而在政治方面的指揮上，自然也完全由蔣委員長自己的政治部擔任。

在中國自然認為蘇聯供給的軍需物品，在中國抗戰的命運上，是很重要的，並且，直接就影響到中國的生存與滅亡。不過，蘇聯供給的軍需數目有限，並不會使中國以此便能組織起「總反攻」的基礎，中國必須盡全力弄到手里的軍需物品是——準備充足的運輸機關與燃料，大砲與砲彈，多額的步兵與多數的步鎗——如果蘇聯能把中國空軍強健地組織起來的話。中國並不需要太多的戰車，甚至於中國沒有飛機也能「總反攻」起來的，最重要的只是運輸能力問題，設如中國的運輸能力，只能運輸大砲零件的話，那就不能實行「總反攻」了，中國需要的是貯蓄多量的軍用物品，僅這一個問題，中國還應長期的努力，這樣才能積蓄起來能够擊退日寇所必需的軍火的「量」數，而現在的中國，與這「量」的距離，却很遙遠呢！

世界各國，常常宣傳着中國預備了「機械化兵團」這種宣傳。一半是傳說性的，其實，中國只編成了二師師部而已。（實際等於日本的一聯隊）這二師師部戰車師部里，包括汽車及自轉車偵探隊，化學戰隊，數千輛戰車部隊（汽車牽動大砲），這二師機械化軍隊，是由德國軍事顧問們組織訓練出來的，那時中國局的樂天主義者們，仍然期待外國援助中國。中國想建設起來強而有力的機械化軍隊，是準備在戰爭一經轉移到反攻的時候，使用機械化軍隊去衝破，奪回戰略的要地，這種計劃，和當初中國想用由外國製造的飛機組織中國空軍一樣，完全都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夢想。日寇經過很長的期間，努力把這二師中國的機械化軍隊，從西南中國的隱匿地方引誘出來，終於在九三九年，當日寇佔領了兩寧之後，中國軍想奪回廣西首都，便用一師的機械化師部來擔任反攻的前鋒，結果是敗退了，損失了一半。

沒有汽車工業與汽油資源以及重兵器工業，又沒有相當的海軍去防護輸送軍火的航路，這樣的國家却計劃建設機械化軍隊，這確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不過，中國的將領們和世界各國的將領們也一樣，他們都從戰爭的失敗里得到了教訓。到現在，他們也開始認識了這問題：——把建設機械化軍隊的款項，（在有限的輸入總噸數中，用在機械化軍火上面的款項，占了極大的比率）用在購買工作機械方面，從母鎖線的空隙與未被封閉的地方，把這些機械輸送進來，這是否較諸建設機械化軍隊更有效果呢？如果能把工作機械輸送到內地的話，則能建設中國最缺乏的——也最重要，最基本的生產手段與生產工業來，也能把中國工業，正確地組織起來使中國工業變為戰時民族工業。

漢口陷落以後，蔣委員長也認識了：——中國總反攻的基礎，從中國優越的人口資源與將其完全組織起來的能率上，才能夠看出來。這種事實較諸冒險的組織機械化軍隊更為重要，設如日寇把占領地區不克成功，從蔣委員長手里搶去了這一種計劃，則委員長分明還可以後退，甚至退到西藏邊境里也毫無礙於中國的抗戰，所以，一九三九

年，在有名的南嶽會議上，委員長在他那等於革命的宣言里，便表明他的新計劃了。他說：

「人民比軍隊重要，游擊戰比軍地戰重要，軍火的政治教育比軍事教育重要，宣傳比鎗彈重要。」

其後，蔣委員長設立了游擊戰訓練學校——模範延安共產黨軍官學校的辦法，這個學校教給正式的軍人，怎樣去實行「運動戰」，聘請葉劍英氏擔任學校臨時的顧問一職，葉氏是有名的共產黨的戰術家，又是以前的紅軍參謀里重要的人物，在一九四〇年，陳誠將軍發表約百萬軍隊（其中包括前線軍隊）已開進淪陷區，葉劍英推測其數目約為五十萬，他告訴我，這些軍隊，大部分集中在揚子江北岸，湖北，河南，安徽，山東南部，河北。

不過，這些新編的游擊軍隊，由於二三種原因，很受着牽掣。第一是，在中國軍主力撤退以前，毫未準備「運動戰」所必需的獨立的軍事與政治及經濟的基礎。游擊軍隊的政治指導，完全尙未成熟，他們對於藉人民的幫助去建設這樣的根據地，都覺得不慣，因此，游擊軍往往在瞬息里便被掃除了。另一方面，短期的訓練，也不能得到充足的結果，試想在一夜之間，就把一個以前毫不慣於與農民協力的舊式軍官改造成能够得到民衆的信任與保護的民主主義者，這是可能麼？現在就有一個弱點——當於後文里更詳加解說——就是軍隊里的政治團體的活動目的，並不在於從日寇手里把「淪陷地區」收回，而在於從××黨手里把××從日寇手里奪回的一淪陷區一再奪回來。

軍隊若以游擊戰為基礎去戰鬥的話，必須積極地去得到人民的支援，不然也就必須積極地與人民對立，設如把地方所有的資源一切總動員，而不會得到民衆的援助的話，那當然就必須強迫地去要求人民的協助，這樣的游擊軍隊豈不等於土匪組織了麼？果爾如此的話，非惟這種軍隊毫無防衛的價值，並且也就等於敵軍的同盟軍了，新游擊司令官，充分地知道游擊隊完全是依靠民衆的援助的，一切都模倣共產黨的計劃，可是若不把民衆總動員，只使用那些古舊的游擊戰術去戰鬥的話，也不會成功的。

把新編的游擊軍的性格，徹底地加以改善的，完全是白崇禧將軍的力量，白將軍現在擔任軍事訓練組織部長，

副參謀長。他是聰明能幹的一位司令官，其才能較諸世界任何軍隊的優秀人物都毫無遜色。白將軍與李宗仁將軍——九二七年，李將軍背叛革命，不服南京國民黨的命令，一直到中國抗戰開始，——使廣西自治的軍事防衛，完全成功，南京的批評家，常常嘲笑他們二人是「反動派的軍閥」，及至經到試煉階段，委員長掌握民族抗日鬥爭的指揮大權，廣西的軍隊便馬上變成抗戰的強而有力的堡壘，在戰爭里，他們有許多功勞卓越的成績，連日寇侵進他們故鄉的南部之際，他們在華中却極英雄的屢次挫折日寇攻擊的銳鋒。

福諾，弗痕吟真將軍曾經在某時，驚嘆地說：

「我認爲白崇禧是中國第一位將軍人材，因爲他才必就知道天下一切事情，但他却能很坦白地承認。」

當白崇禧在參謀本部服務的時候（最初沒人能接受他的建議。）在改革軍隊的能力上，他盡了很大的力量，這在民族統一方面，確有相當影響，他反對黃埔出身的新軍官們由反共而養成的內亂心理，他想把軍隊能够勇敢的原因——也就是革命精神——普及到新軍官的心里，他雖是純粹的國民黨員，但他在廣西却想出與紅軍使用的方法相同的方法，在中央軍指揮官里，他知道中國在抗戰上想得到勝利，必須鼓吹革命精神與組織大家，這二者是有勝利價值的，有人批評他關心與共產黨的鬥爭，較比關心與日寇的戰爭更濃厚，他並不怕，他很坦白地承認。並且，他對蔣委員長，也毫不躊躇便把自己不滿的地方表示出來。

「共產黨能有方法去戰爭，不能說國民黨就沒有方法，國民黨並不愁於沒有像共產黨那種使戰爭勝利的方法，而憂於在自己的地域里怎樣得到勝利，共產黨現在正與日寇作戰，並且都很努力，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我們並不該反對他們，應該幫助他們。」

「僅以彈壓辦法，並不能撲滅共產黨，只要我們的指揮權力，比他們強而有力，比他們進步，則國民黨便能對抗共產黨的勢力，如果國民黨指導人民往進步方面前進，則國民黨便能得到國家的生命。除此之外，不論怎樣去

彈壓共產黨，也不會保持黨的生命之存在的，所謂一種「黨」，在生長之後，若不進步，便必須死亡，現在國民黨進步的方向，是爲了使此戰必勝而採用必須的一切手段，如果在國黨指導之下得到最後的勝利的話，則國民黨自此之後將更強盛起來的。」這是他所說的話。（註）

（註：這里引用的兩段是否確實白將軍的談話，尙未判明，但他曾經回冬遍詢問他的人：「我不能馬上便承認這話是否爲我所說，請你等候到我能够坦白承認的那一天。」）

黨與軍兩方面的人們，很不滿他這種意見，但實際追擊他的人們範圍很大，有許多富於革命色彩的青年，都被他強迫編進軍隊里，如果國黨再發生內亂，那他也許以出入意料的方法攻擊反對份子。

軍隊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像現在這樣密切與進步，今後軍隊將必須完全和人民合作與依靠人民的援助，這樣，軍隊的指揮階級與權力，也許能真實地反映出純粹的民主主義色彩來的吧？

但這也許是樂觀過度的見解，以事實來說，不論國民軍具有如何的缺點（共產軍也包含在內），總是一個偉大的成功的軍隊，在這軍隊里內有着五分之一的人數最重要的希望與驕傲，並且還是國黨政治命運上的鎖鑰。另外還有一件更大的事情是：——被壓在鐵蹄下的中國數百萬民衆，他們的解放希望，惟有等待國軍隊的勝利之日：——這只不過是亞細亞洲各民族的希望之一而已，更重要的是：設如中國在以後也是有敗無一的話，則那些曾經認爲一時的屈伏的亞洲各民族：——台灣人，朝鮮人，東北人，蒙古人等等，就必須承認他們永久的屈伏着了。並不只此，如果中國有一天是屈伏了的話，則那些現在站在從歐戰帝國主義手里解放的革命關頭上的亞洲各民族——印度支那人，菲律賓人，馬來人，爪哇人，暹羅人，緬甸人，印度人——這些民族還能有從代替歐西君臨一切的東洋新本帝國主義的退嬰的隸屬下拯救出來的一天麼？

在次一段里，我想介紹幾個應把自己當作犧牲，爲亞細亞諸民族努力的日本人。

(五) 日人裏的中國同盟者

在日寇受到最初一次極大的打擊之後，日本將能捲起革命的。

——毛澤東

日本人里也有中國的同盟者，作家鹿地亘氏和他的夫人——池田雪子，便是一例，自一九三七年以後，他們盡力——可能範圍內的力量——爲使日本嚐到敗戰的滋味，努力的活動着，日本的憲兵發出以極大的賞格想要得到他們的腦袋。他們也曾經數次出入生地從逮捕與死亡里逃了出來。

我第一次到漢口的時候，正趕上是在日寇飛機殘虐地轟炸中國陸軍政治部的一部分房屋之後，我見了鹿地氏與雪子女士，那時，他們在武昌的中國陸軍政治部工作，日機轟炸政治部之際，一千名訓練中的新軍官爲逃避到附近的丘陵里去，死亡約有十數名，鹿地與雪子也逃進丘陵山里的避難所，一顆炸彈在附近炸開了，他們完全被活埋。在土石里，及至同事們把他們掘出來的時候，才知道那枚炸彈的碎片，從他們頭上——距離他們頭部僅數英寸穿過去，打在屋頂上。

第二天，他們搬到衙里——人口稠密的地方。其後，另一隊日本航空隊來襲擊武昌，這一隊飛機飛得非常低，轟炸機在鹿地與雪子住的屋上旋回飛行，然後把炸彈擲下，許多的中國人都犧牲在這枚炸彈上，只這兩個日本人沒受到損傷，經過相當的調查，逮捕了幾個漢奸，他們是用大的鏡子向日本飛機傳送信號。自從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鹿地氏不再把住所讓別人知道。——除了自己與衛兵們之外。有時他們和我一塊在海軍的Y，M，C，A，吃巧克力與火腿麵包。Y，M，C，A是我逗留旅行在漢口，過着舒服的日子時住過。

自從中日開始戰爭後，鹿地氏從日本被放逐出來，到中國的左翼作家——老舍、郭沫若、茅盾、沈從文的宣傳部工作，這一個宣傳部里，有數十名中國人都是日本受過教育，他們的宣傳對象，並不僅是中國，東北四省，朝鮮，並對於日本內部的文官與武官們也大施其宣傳戰鬥，鹿地氏便是宣傳部的「日本心理顧問」，由中國航空隊轟炸日本時候所使用的宣言，到中國兵士在戰場上向日本軍散佈的傳單完全都由他擔任，他們和別的在中國軍隊里服務的許多的日本人一樣，他也是共產黨員，從他的談話里可以知道日本怎樣壓迫共產主義。鹿地氏的母親是富農農戶，領了十二個農人，並且是薩藩的侍士，幼年時候，鹿地氏曾當海軍軍官，由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書，這期間，他的思想便變化了。（中間日譯本被刪除四行）那時，大學裏自由的，美濃部博士發表了否認天皇神聖的學說，而教授們與學生們常常公開地爭論着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

帝大畢業後，他曾在富有自由主義情緒的雜誌社與報社工作過，由此他開始加入急進派的政治運動中，一九二七年，日本和中國完全一樣，這一年是社會鬥爭的一年，貧農要求重新分配封鎖的土地，自動地組織起反對地主的鬥爭陣營，指揮農民運動的人們，份子很雜，那時是操在賀川氏手里，賀川氏是一位基督教的改良主義者，鹿地氏建設了一個自治學校，目的是為使貧農與子弟能受到相當教育，學校發展很快，接着他加入進德會，在新潟從事組織的活動。

新潟是大地主的城堡，日本貧農小作（租地耕種）條件最壞的地方，數百萬農民的生活程度與狀況，僅能強差人意，每年都發生大飢饉，有實業許可的買賣婦女的商人，認為新潟縣是產生婦女商品最好的資源。每年都能從貧農家里賺到數千名年青的女人去當妓女，戲子，軍用產業所需要的女工，按照鹿地氏所說的話，新潟是產生日本革命的農民的地方，這些農民對於天皇，完全不感到愛情，警察也不能喚起他們對天皇的敬虔與順從的心理，數千農民都參加到農民組合聯盟里，他們的煽動，擴大到許多地方。

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四省後，軍國主義的權力與地盤鞏固起來了，同時，勞働階級里的急進主義的人們也增加起來。此時鹿地氏又加進反帝國主義同盟，擔任勞働聯盟指導工作，並編輯某種雜誌——發行三萬冊以上，讀者都是智識階級人們。可是日本的法西斯團體取櫻會——計劃指導產生九一八事變的機關——在軍部與警察絕對支持之下，大行檢舉勞働團體，在一九三三年里，鹿地氏曾受到三次拘禁，因為日本有名的小說家小林多喜二氏——被東京警察虐殺之後，警察們從他的遺物里；找到一張鹿地氏的名片，小笠氏是鹿地的親戚。

「東京共有八十處監獄，每個監獄都能夠把人關在里面，二三月內也不調查與審問。警察並不舉出我犯了什麼罪，只把我從這個監獄再往另一個監獄里送，監獄里的房子很小，並且骯髒，平均每個房子都裝進二十多人——大半又都是病人，我在每一個監獄里都受過苦刑，警察把我綁着，從床上吊起來，一直到失却意識為止，然後把我放下，等到神志清楚，他們又把我吊起來。」鹿地氏曾對我說過。

他又告訴我由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他有數十名朋友，在監獄里受着殘虐的苦刑拷問，以至完全死亡。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並不會使他的信念發生動搖，警察拷問他也拷問厭了，又把他放了出來，而他一經出獄，仍舊繼續地從事寫著與組織勞働工作，其後經過二年，由於許多的人們都被拘——有的叛變了，以致使革命運動很萎靡地衰弱了，連革命運動的最高機關，都有警察的走狗，法西斯，憲兵們的影子，他又被捕了，在東京監獄里被監禁了半年之後，忽地把他放了出來，但他也知道了這是警察們想利用他去當「警察的偵信鳩」，好由他的行跡去發現他的友人們的住所。在這幾月里，他是一個人，在再拘捕的恐怖里過着時光，終於一個流浪的劇團里的友人替他想出一條計策，使他加進這劇團去當「侍士」的角色，一邊等待「逃走」的機會，這樣，隨着劇團，他來到上海，上海發生這一次的戰爭時候，他又開始從事革命的工作了，在香港，他從準備把他架綁去的日本入手里——千鈞一髮的危險里逃了出來，又經過好幾次難關，終於安全地來到中國內地。

鹿地氏的夫人——雪子女士（二十七歲）也經過相仿的慘苦生活。她在學校讀書時代，便參加了贊田氏改革基督教運動，她曾和石本男爵的夫人一塊工作過，由於她積極的從事反帝國主義工作，她被捕進監獄裏的次數鹿地氏還多，並且受過相當的拷問，有一次，她的兩隻手指，都被警察官拷問得流了血，她是一位很善而柔弱的女人，因此，在監獄裏病了好幾個禮拜，雖然這樣受着苦刑，她並不「轉變」，在她未到中國亡命之前，在日本，她不斷地從事日本婦女勞動者的地下活動，她到中國來，和鹿地氏並不一樣。

在中國，還有一位聲名很大的日本急進主義者青山和夫——他幫助組織為中國而戰的若干朝鮮人部隊，他是一位孤兒，曾作某姓的「養子」，在那里，五歲時候便開始擔任勞作了，數年之間，他都作着男僕，到十六歲的時候，他進工廠去工作，這個人露着牙，戴着四分之一吋厚的近視眼鏡，可是我很喜歡他，我知道他具有稀有的品性，勇氣，大膽，以及對於日本人民的信任。

我會見他的時候，他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那時他的地位才是日本革命運動的指導者，在此以前，他很滿足他自己是在「勞動運動的卒伍里」他說過：

「我的腦筋不好，如果我們的優秀人材都被殺了的話，大約就不會再有像我這樣的指揮人物了。」

他服從命令，組織了許多團體，日本重工業的工人們，都擁護他，在戰爭未開始之前，他帶着特別任務到上海來了，戰爭才一開始，他便加進中國軍隊里工作，最初是在南京，在宣傳部工作，以後在漢口，擔任中國的朝鮮人義勇軍的政治指揮工作。

日本人與朝鮮人在中國軍隊里工作，這使中國軍得到不少方便與利益，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里，有朝鮮黨員，他們有的在八路軍的學校里求學，有的在前線和日寇血戰，其中有一個朝鮮人，是十八集團軍副司令——彭德懷將軍的副參謀長，現在也很活躍。別的朝鮮人都在「對敵工作部」Front Work Department 擔任顧問

工作，不是共產黨員的朝鮮革命家，也都各有工作，最近朝鮮人革命各黨派都統一了，而在重慶也成立了朝鮮臨時革命政府，他們的活動與工作，較諸以前，集中起來。

一九三八年，在金若山指揮之下，在中國組織了一旅朝鮮軍旅團——由朝鮮人與日本人聯合組織起來，在這一個毫無前例的軍事的將校們，都是以前在中國中央軍官學校受過訓練的人們，約七十餘名，另外還有一部朝鮮人，參加中國空軍隊里，有數名朝鮮的飛行士與旅團里的軍官，到蘇聯去受訓練，金若山司令官是朝鮮的老革命家，在過去二十年間，他參加過一切重要的反日工作，在中國抗戰之前，他在朝鮮與東北四省，和中國抗日游擊軍一同抗戰，達數年之久，在某一時期，他成了朝鮮民族革命黨的領袖。

大約日本憲兵隊用很大的賞格去購買金九（若山別名）的首級吧。在一九三二年，日軍在上海舉行的「上海戰勝慶祝會」席上，金若山扮裝作攝影師，穩靜的走到閱兵台前拋出一棵水筒炸彈便跑了，這一棵炸彈，打死日本軍總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打傷了日本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另外，還有六個日本名士們，不是死亡，便是受傷。現在，金若山在中國軍戰線後方活動着。

在他們沒有像現在受着訓練與統一之前，他們這些朝鮮人的民族主義者們使用的和敵人的戰鬥的方法就是「暗殺」，而他們確已暗殺了許多許多日本大官要人與將校，朝鮮的無政府主義之輩，除了亞拉利亞的鑛工們之外，大約都熟習這種方法——從隣手把幾棵劇烈的炸彈拋出去。朝鮮人也組織了軍紀很好的革命軍，在一九二七年，投到國民革命軍北伐一役里的朝鮮人。約有數百名，他們期待並且相信中國國民黨軍能够把他們的祖國——朝鮮，從日本手里解放出來的。

他曾肯定的對我說：如果中國政府能允許的話，則很容易就能把朝鮮人與日本人弄成一兩師國軍。他們主張逃到中國的政治的亡命，都應援助中國而奮戰，經過東北而來到中國內地的，約有數百名左右。不過，重慶對於他們

這些另一民族的同盟之友，有時待之很好，有時却很惡運，上約政府是怕他們弄到自己的軍中弄到獨立革命軍的携合作吧。現在，朝鮮人編成的旅團，主要的工作是擔任宣傳工作，並且很有效果，例如在敵軍內部的朝鮮人，很富於革命的色彩，而在徵集朝鮮人當兵之際，許多的朝鮮人不是反抗，便是把日本人軍官殺死等等，都是他們宣傳的結果。總之，由於在中國軍戰線後方，存在着朝鮮革命黨，以致使日本徵募朝鮮人去當兵，受到極大的妨礙與破壞，最近日本政府爲了要獲得朝鮮人對皇國的忠誠，在吞併朝鮮三十年的現在，日本政府允許朝鮮人換用日本姓名，結果却使日本政府大吃一驚，因爲換用日本人姓名的朝鮮人，不過總數的百分之二而已。

爲了使兵士戰鬥精神不至渙散，日本軍當局使用凡有的預防方法去防止，因此，從俘虜收容所逃回來的日本兵士，不受日軍當局所歡喜，因爲他們認爲日本兵士從中國的俘虜所安全的逃回來，會影響日本兵士的士氣，而日本軍當局公開地相信被中國軍捉去的日本兵士們，沒有一個能還生存的。

青山氏以爲日本當局對於反對戰爭的宣傳家們，是處以極嚴的死刑刑罰，可是日本人的革命家，却在東北，蒙古的日本軍里，積極的活動着。因爲在「大陸」活動較諸在日本內地活動，効力較大，在日本國內動員的訓練的日軍聯隊，和在中間的日本戰鬥軍隊毫無關係，日本軍部組織「派遣師團」之際，是把來自不同的各地方的兵士們，混合編在一起，這樣，在訓練營里，聯隊內部便毫無政治團體的存在了。此外，軍營里不但有政治警察，並且還有憲兵們監視，他們的工作是專門檢查企圖破壞的分子的活動。

青山氏主張應和日本軍里的革命分子秘密接近，他說，日軍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那樣，許多下級軍官——特別是少尉級以下的軍官以及預備軍官，完全都是反對法西斯，反對戰爭，而所謂法西斯組織，仍然是半秘密的，只不過軍部里一小部分而已，一切殘忍的事情，都以這一軍部的法西斯爲中心而說出來的。按青山氏的說法：這一個軍部法西斯團體，爲了使兵士們不至於在倦怠期中，被「危險思想」侵進來，爲了使兵士們處在一活潑，興奮狀態

「幸福」里，他們認為是必須使用殘忍的行爲的。青山說日本軍官——少校以及高級軍官們里，——特別是在「滿洲航空部隊」里有共產黨員與反法西斯份子存在的，他們的人數雖少，但最後能影響到幾千數百的兵士們。

這些中國盟友的日本人，他們擔任的最重要的工作，大約是教導中國軍隊里的日本俘虜吧。日本兵士們最初當要被俘之際，他們反抗得很厲害，甚至到身負重傷才被俘擄了的，也有從火車，戰重車跳下來的，也有從擔架上跳起來，想掉進深谷里自殺的，有的他們拿着外科醫療用具，把醫士與護士以及自己殺死的，因為他們相信軍部的宣傳，認為一旦被中國軍俘虜，不是被燒死，便是要割出他們的心臟，鹿地氏告訴中國軍人，對付日本俘虜，應使用紅軍所使用的方法——「教育」俘虜，得到他們的友情，使用「試驗材料」讓他們回答，由中國軍解答。

鹿地氏向中國軍證明能夠把他們同胞——日軍俘虜——「改良」的，但却也受到極多的困難，特別是南京失陷之後，在漢口，他曾和俘虜的日本飛行士們一塊工作過數星期，一點「改變」他們的成績都沒有，日本軍人一經作了俘虜，便自甘暴棄患了懷鄉病，感到孤獨，只想用什麼方法自殺，他們如果逃走，逃回日軍里的話，他們又怕會被處以刑罰的，鹿地氏和雪子用無限的忍耐，教導他們認識中國人觀與戰爭觀，只要能夠使他們從心里把自殺心理消失的話，鹿地氏便會感到極大的滿足了，以外，鹿地氏由社會與心理方面，解釋他們的環境，由此使他們又產生新的希望。

現在許多的中國兵士們都拿着卡片——用日文印刷，有中國軍司令官證明的小卡片。上邊寫着，「中國並不會和日本人民衝突，中國認為日本人民是中國的兄弟，如果投降的話，不論你們是那一種日本人，一定保證會優待你們。」這樣「勸降卡片」，會使日本軍人在戰鬥里將作俘虜之際，心情會穩定的，特別是八路軍，——八路軍對於日本兵士俘虜們的處理，極為寬厚，連日軍方面也都知道，這是實在的事情。

在重慶，當又看見鹿地氏的時候，他已得到相當的成績了，他使約六十個日本軍人——俘虜，轉變為反帝國

主義者，他往各地的俘虜收容所去講演。他組織了日本人反戰同盟，又組織了旅行劇團，出演反戰戲劇。

在重慶的日本人，認為蔣委員長的政治都不會像八路軍那樣，對其轉變了的日本俘虜予以釋放，這是一種失敗的地方。共產黨是把日軍俘虜送往後方，在後方，給他們二月的「再教育」，在這期間，使俘虜和中國學生一同吃飯，一同睡覺，期滿之後，給予他們自由權——投進八路軍呢？或者願意被護送回日本軍隊呢？他們若說願回到日本軍隊的話，立刻把他們送到八路軍的日本軍官那裏，調查他但這樣的事情，若是多了起來，那倒困難了，但大體日本俘虜會自動的「轉向」的。

青山與廣地氏，認為日軍占領了漢口之後，日軍的士氣很快的便降低了，他舉出許多的事實來證明他的說法，例如在一九二八年，俘虜的日本兵士，都是受了傷的，但在現在，如果受到意外的攻擊，他們毫不抵抗的投降了，此外，他指出日本兵士們往往會暴動與反抗起來，而軍紀，士氣頹廢之例，更多至不能指出。他們相信東北，蒙古，華北，華中，華南的日軍各司令官之間的利害衝突，激烈起來了，而對抗的日本陸海兩軍之間，也呈出分裂的徵兆。日本國民對於戰爭的不滿與痛苦，使日本的文官們的反戰情感強烈燃燒起來，可是，無是在中國派遣軍的眼里，或是在日本國民的眼里，看得清清楚楚的是日本陸軍若在戰場上，一旦受到極大的打擊之際，日本軍隊的士氣便會沖失下去，日本國內會發生叛變與革命的，而這種革命若由一部分軍隊也援助的話，便會成功的。

許多的日本人相信日本共產黨若能很快的便得到政治權之際，才能使日本產生一串「奇蹟」的事實來——就是日本共產黨按照他們的政綱，打倒貴族與軍部的國家社會主義，停止侵略中國的戰爭，由社會主義與蘇聯及其他各民主主義國家、和平的國際協力，便能解決日本經濟上的一切問題，在蘇聯援助之下，能夠把日本，朝鮮，東北，蒙古，中國，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社會主義聯邦……

這些日本人，亦他們那種範圍很大的「友愛的夢」未實現之前，他們知道中國還需要出現獨裁的政權，不過，

他們不會忘掉他們應該忍耐下去，他們在中國軍戰線訂後，是最樂觀的人們，他們這種否定他們祖國的軍事的戰爭，他們這種孤獨的崇高的信念，正像基督教徒們在最初所保持的精神一樣。

據現在不久，青山氏那張露着牙與帶着近視眼鏡的面孔，出現在南寧附近的戰線，他在那里幫助廣西的中國軍，他的聲音，在戰場的騷音里，由對攻擊的日軍宣傳所用的擴音器響了起來，中日兩軍砲火都停止了，人人都沉默下去，日本軍的青年兵士們張着嘴巴，傾耳聽着這一個同一國籍的日本人說話：

「停止殺戮兄弟之邦的中國人吧，把鎗口轉向攻擊在這次戰爭中，發了千萬圓財的三井財閥吧，轉向攻擊其他那些趁着日本與中國的戰爭而發財的人們吧！」

日本軍立刻派來了新兵來援助這一些失去了戰爭趣味的日本兵士，他們並不意的攻擊中國放送隊捉去了青山，三井男爵算是報仇了。

在我個人，在和他们相見，聽了他們的談話之際，我以為他們完全和中國人一樣，像青山和鹿地兩個人，能夠在中國軍隊里工作，這是一種很重要的象徵，如果日本全體國民，在他們的「日之女神」的神話里，不被另一種帝國主義的思想所污穢，不禁止接近所謂「危險思想」，並且×，×兩國的偽善者不供給日寇軍火，那麼，日本會很容易的處在文明的和平世界里的，——如果世界能產生這樣的世界的話，則在這種世界居住的人們，一定是厚於禮儀的國民。像鹿地與雪子這種人，他們在戰爭終止之後，大約能够使這兩國人民的友情重新密接起來的吧。

